



读“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科学在网络进入江湖时代

曾富

Recommended: 王德奎 (Wang Dekui), 绵阳日报社, 绵阳, 四川 621000, 中国, y-tx@163.com

Abstract 摘要: 我们是坚决反对论文造假和科研腐败的; 事情如有发生, 应向合法的部门投诉, 等待处理。这事也说明在高工资、高职称、好位子和好环境的专家、教授中, 也有“讲礼”补课的需要。只要做到坚持众所周知的“四项基本原则”, 以及有过打好基础知识经历的人站出来, 以“真诚、真心、真实”的态度对待基础科学前沿理论、原理方面的有所发明发现, 在“互联网社会主义”平台上发表己见, 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4 亿人的国度的中文写作, 还是会有所发现, 不会永久让英文世界一家垄断我们的话语权。[曾富. 读“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科学在网络进入江湖时代. *Academ Arena* 2021;13(3):1-44]. ISSN 1553-992X (print); ISSN 2158-771X (online).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1. doi:[10.7537/marsaaj130321.01](https://doi.org/10.7537/marsaaj130321.01).

Keywords 关键词: 环形水跃、科学三极、互联网、等文化、科学礼

一、从“环形水跃”到新冠防控说起

1、环形水跃之谜

A、环球科学杂志说环形水跃

2020 年《环球科学》杂志 12 月号收到, 读到亚力克西·杜歇纳教授的《环形水跃: 一段跳跃的故事》一文后, 把我们吸引住了——该文最后一节“从水槽到中子星”中说: “可以借助水跃现象的模拟, 来研究超新星的动态”; 以及“水跃已经成为研究几乎无法触及的现象(例如超新星和黑洞)的工具”; “流体力学和引力定律之间存在强大的数学联系”; “一个天才的设想——‘反向环形水跃’”——“黑瞳指的是一个时空曲率极大的区域, 没有任何物质能够从这里逃脱。更准确地说, 水跃或许可以作为‘白洞’的模型, 即时间箭头相反的黑洞”。

水跃实验, 指类似让水龙头开一会儿, 水流抵达水槽底部并扩散开来, 在碰撞点周围形成一道薄薄的水膜。随后由于这种径向扩散, 加上水与水槽表面之间的摩擦, 以及在水跃的内部区域(靠近水流处), 重力波扩散的速度小于流体扩散的速度等因素, 水流的这种状态转变为一道“水墙”, 即由液体构成的环形——这就是环形水跃现象。

杜歇纳教授说, 这个现象尽管不起眼, 西方已经研究了五百多年, 至今仍在继续——即“从水槽到中子星”。读着读着, 使我们想到“水跃模型”也可以帮助理解 2020 年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从 2020 年初武汉出现的“0 号病人”传染, 在万人聚餐后暴发, 这类似“环形水跃现象”。但随后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支持下, 武汉和湖北的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取得伟大胜利, 这类似“反向环形水跃”。中国的经验和治疗的方

法, 向世界公布后, 但美国和印度等世界其他国家, 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仍在蔓延。为啥?

B、中国研究环形水跃吗

2020 年《环球科学》杂志 12 月号之前, 查百度等搜索, 我国也有研究环形水跃的, 但一般都是带技术性的。如说水跃, 是低水头底流消能设施, 可能发生的跃后水流波动前进的水力现象。

由于入流弗劳德数小, 水跃消能效果甚微, 水流冲刷力较强, 使河床及两岸冲刷严重。一般发生在共轭水深比值 $h_2/h_1 \leq 2$ (h_1 、 h_2 分别为跃前、跃后水深) 的情况下。设计消能设施时应采取措施予以防止。水跃现象的特征: 水跃现象可在定常流中出现, 它的特点是: 在很短的距离内, 水深急剧增加, 流速相应减小。水跃区的水流可以分为两部分: 上部不断翻腾旋滚, 因掺入空气而呈白色。下部是主流, 是流速急剧变化的区域。这两部分的交界面上流速梯度很大, 紊动混掺强烈, 液体质点不断地穿越交界面进行交换。在非定常流的涌波中, 也可以形成翻滚前进的水跃。由于水跃内部水体的强烈摩擦混掺而消耗大量机械能, 因此通常把水跃作为消能的有效方式之一。

弗劳德数是流体力学中表征流体惯性力和重力相对大小的一个无量纲参数, 记为 Fr ; 是以英国船舶设计师弗劳德 (W.Froude, 1810-1879) 命名而成。它表示惯性力和重力量级的比, 即: $Fr=U^2/gL$, 式中 U 为物体运动速度, g 为重力加速度; L 为物体的特征长度。这是弗劳德对船舶阻力和摇摆的研究, 提出船模试验的相似准则数, 建立了现代船模试验技术的基础——它用来确定水流动态如急流、缓流的一个量纲为一的数; 当模拟具有自由液面的液

体流动时,是必须考虑的相似准则数---对重力起主要作用的液体,对边界几何相似的两液流,只要弗劳德数相同,流动情况就相似。

水跃是流体力学的一个现象,常在像河道或泄洪道的明渠中出现。当高流速的超临界流进入低流速的亚临界流中,流体的速度突然变慢,流体部分的动能被紊流消散,部分动能则转换为位能,造成液面明显变高,这样的现象即为水跃。消除泄水建筑物下泄急流的多余动能,保证建筑物安全和正常运行,多余动能系指建筑物上游水流动能与下游正常水流动能之差。多余动能是通过水流内部的紊动、掺混、剪切及旋滚,水股的扩散和水股之间的碰撞,水流与固体边界的摩擦与撞击及水流与周围气体的摩擦与掺混等,转换成热能而逸散掉。

常用的消能工有:①通过水跃消除多余动能的水跃消能工,又称底流消能工。②利用泄水建筑物出口的挑流鼻坎将下泄急流抛向空中,然后落入下游河床水垫中来消除多余动能的挑流消能工。③利用泄水建筑物出口的鼻坎将下泄急流的主流挑至水面,通过主流在表面扩散及底部旋滚和表面旋滚来消除多余动能的面流消能工。此外还有为提高消能效率,用于较低流速情况下的辅助消能工以及超空穴消能工、压力消能工、自由跌落式消能工等。消能工的选型与建筑物的形式、枢纽布置、上下游水位、地形、地质、运用要求等因素有关,对大中型和重要工程,还要进行水力模型试验。为了保证建筑物及枢纽正常运行,要求做到消能工本身不受空蚀、磨蚀等损伤,下游岸坡稳定,河床不出现危害性冲刷。

2、反向环形水跃图像比较全球新冠疫情

A、环球科学杂志说反向环形水跃

不起眼的环形水跃现象,已经研究了500多年,至今仍在继续,说明它是属于“科学”,而不是“哲学”。而“科学”追求的是“数学决定论”---即最后有能用数据测量证实的数学计算公式。类似不仅要有从矢量推算的数学公式,而且矢量还要能做“标量”计算。这一点很不容易,例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公式,仅是一个矢量推算的数学公式,要做具体天象的“标量”计算,就是数学专家之类的人,也还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行。所以很多探讨广义相对论引力问题的论文,都类似“科学哲学”或“自然哲学”。

用深圳中航集团高级工程师张帆教授的话说:是“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其实张帆高工和蒋春瑄高工一样,是把“科学”误解为进行到一半的“实验”表现出“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沙寅岳教授则把“科学”说成“大道至简,宇宙的道理很简单”,只有他知道,别人都不懂。他说的例子是:“卢鹤绂1950年提出原子核半径常数是1.23

飞米;一位英国科学家和二位印度科学家在1974年给出原子核半径常数是1.13飞米;我在2002年获得原子核半径常数是1.11飞米---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什么是重要?什么是科学?”好像就是他“先进”。人们看重科学的数学的数值计算,沙寅岳教授真能把“原子核半径常数是1.11飞米”的计算全过程写出来,并在原理的运用上说得通,别的权威的科学家也证实他的计算,当然是了不起的。但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环形水跃的故事》就说的类似此事。

杜歇纳教授说:16世纪,达·芬奇才第一次对水跃进行了描述。在500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一个得到一致认可的模型,能够基于系统参数---流量、流体性质、液柱直径等,预测一些基本性质,例如水跃的半径。1993年丹麦科学家托马斯·玻尔等人借助“贝朗日条件”(“润滑方程”),能够根据流体的流量、黏度和密度等,预测水跃半径。托马斯·玻尔的流体力学模型使用描述内部和外部区域特征的假设预测水跃的位置,证明在某个特定的半径---即我们观察到水跃的地方,这两个区域的方程的数学解,就不再是实数---啥意思?“不再是实数”,如果存在虚数或复数,就类似存在“暗物质和暗能量”,就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一样。当然也能计算,就是把“虚数”舍去。科学对于测量和计算的重要,杜歇纳教授说:2014年巴黎科学家们的实验室,通过精确测量紧邻水跃发生处的液面高度,证明对所有的水跃,与系统性质无关,因为水跃正发生在重力作用开始变得不可忽略的地方,我们会在水跃刚刚发生的地方得到一个“通用”的前面说的弗劳德数。此外结合外部建模还可精确计算水跃的位置。

所以我们说,即使像拓扑数学定义的“球面与环面不同伦”,也还不是张帆高工加封的是“数学决定论”,而要能精确计算和测量。例如环面在水跃半径和系统参数的联系中,也能变球面---如果说流体有黏度,那么另一个物理量表面张力,例如水和空气之间的界面,表层水分子和内部的情况不同,它倾向于最大程度地减小界面的面积。这能联系上解释为啥雨滴接近球形。

正是在这里,科学对如此平凡又简单的问题也存在着争论---杜歇纳教授说:2003年美国的科学家约翰·布什和杰弗里,借助细致的分析证明,在大多数现有的水跃模型中,除直径不到1厘米的小型水跃外,表面张力对水跃半径的影响极小。但到2018年英国科学家巴加特和林登挑战这一结论,他们提出一个新模型,表面张力在水跃的形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为调和了理论和实验。然而在2019年,杜歇纳教授在法国里尔大学和玻尔教授在丹麦科技大学一同提出,美国和英国科学家们的模型,“可

能建立在一个不可能的假设之上，表面张力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看起来我们这个问题还很遥远”。

其实杜歇纳和玻尔的说法，在 2020 年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图像，也类似得到证实。2020 年《环球科学》杂志 12 月号 67 页有两幅图，是杜歇纳教授的文章介绍法国科学家弗格利佐，借助“反向环形水跃”现象的实验模拟来研究超新星动态的说明。

左图是实验示意图：装置包括左右边沿有两个环形容器，它们将水注入中心有排水孔的一个水槽。它最初形成对称的环形水跃，以水槽为参考系构成反向环形水跃，但随后变得不稳定。右图是在超新星数值模拟中也能观察到的这种不稳定。我们要说的是，在 2020 年全年的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的表现中，也能观察到的这种不稳定——全球以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取得伟大胜利为中心，构成反向环形水跃，但全球周围仍呈现不稳定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既然“环形水跃”是 500 年研究的科学，那么未来百年之大变局，能否也作为一种“科学”来研究，让全球左右边沿水跃走出自话自说水跃的困境？

B、水跃与反向水跃共存说科学第三级

世界地理环境所谓存在“三极”：南极、北极和高极——指青藏高原地区。三极地区作为全球生态环境的重要屏障和关键纽带，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脆弱区，三极研究日益成为全球科研的前沿和热点。把全球生态环境存在“三极”现象联系科学的共存现象，也类似 20 世纪以来有“科学三极”一样；而且这还与上面弗格利佐做的“环形水跃与反向环形水跃”模拟实验反映相似。

弗格利佐的左图装置，左右边沿的两个环形容器类似南极、北极两极的磁力线转动循环或方向对立——20 世纪出现以美苏“冷战”对立的“两极”，以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两极”；从而产生科学基础理论前沿知识，出现类似张帆高工说的“哲学贫困”指责的对立，以及出现以英文科技杂志为导向的认可转动循环。

其次，左图装置水槽中心有排水孔的地方类似“高极——青藏高原”，也类似中文科技的不平凡：新中国曾在美苏“冷战”封锁的情况下，自己研究生产出“两弹”及人造卫星；2020 年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只有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首先取得胜利。

1917 年“十月革命”虽然给中国传来马列主义，但到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并没有只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坚持宣传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以食为天”、“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同世界”、“以人民为中心”——“民为贵君为轻”……这与全球环境存在

“三极”的高极——青藏高原就有联系：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的“珠峰映射原理”研究，论证世界人类古文明起源的泛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有“类珠峰辐射”——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这联系解放后 1951 年修筑成渝铁路发现 3 万年前的“资阳人”化石，已涉及新时代关注人类文明于起源世界第三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明“中国梦”等大问题。

2020 年 12 月 12 日在第二届“高极--三极”青年创新论坛上，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赵俊猛教授，从自己 30 多年的青藏高原研究体会出发，强调学科交叉对于地球三极研究的重要性——我国对三极地区的科学考察和研究由来已久，经历了从单一学科研究，到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合作研究的跨越式发展；许多科研成果的获得，都离不开学科交叉。这也说明有联合研究“环形水跃与反向环形水跃共存”类似科学的必要；而且中国的科学问题必须是在中国有实验。

有趣的是，全球生态环境存在“三极”现象，对“三极”不同地区人群的遗传基础也有影响：受到所处环境及人群历史动态的影响，不同人群间的遗传背景往往存在一定差异。如已有的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如 DNA 变异、基因等，在双相情感障碍发生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且现有针对该疾病的遗传学分析。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和日本，取材自我国大陆地区的双相情感障碍遗传学研究极少。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中国科学报》报道，揭示汉族人群双相情感障碍的遗传基础，中科院昆明动物所李明教授团队首次对我国大陆地区汉族人群双相情感障碍遗传基础的大样本展开探索，但都是在英文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发表，和得到同期评论，认为“该研究对于促进对双相情感障碍遗传基础的理解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在我国人群中，开展双相情感障碍的遗传学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李明教授团队的研究，是对我国人群和已发表欧洲人群该疾病的遗传风险，进行的荟萃分析和多基因风险评分分析——李明率团队与全国多家临床和科研机构开展广泛合作，采集了来自多个省市共计 1822 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和 4650 例健康对照的血液样本，对其开展了全基因组关联（GWAS）分析，并随后在 958 个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和 2050 个健康对照中进行了重复验证实验。鉴定到了多个疾病相关变异及一个风险基因 TMEM108，进一步鉴定出多个与双相情感障碍显著相关的基因，同时也证实双相情感障碍在我国人群和欧洲人群中共享许多重要的遗传风险，证实双相情感障碍，与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认知功能等，共享一部分遗

传基础，为理解不同精神疾病特有及共有表型的内在原因提供了基础信息。

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异质性和遗传力较高的复杂精神疾病，患者往往表现出情绪和认知方面的障碍，其正常生活乃至生存都会受到严重影响。然而，当前学术界对双相情感障碍遗传基础与发病机制的认识仍十分有限，使得目前针对该疾病的诊疗都面临一系列难题，如容易误诊，难以根治，药物应答存在显著个体间差异等。

二、环形水跃及反向环形水跃不稳定现象认知

1、环形水跃及反向环形水跃就在身边

A、说深圳中航集团张帆高工之谜

探讨有“科学三极”，国内站在科学第三极的角度，不仅历史、党史和科学创新有丰富的素材，也有人为的难度。读“科学三极论”的文章，深圳中航集团高级工程师张帆教授的文章就说：“总有一种别扭的感觉，不知什么原因？想来想去，终于有所发现。那就是他们的学术是非主流的，他们自己却认为是主流的，甚至比主流还主流……说他们在西方主流科学的前面等了几十年，现在终于与他们会师。可是主流不同他们握手，反说他们是‘江湖科学家’。有一个童话，说是蝙蝠飞到鸟面前说，我会飞，我是鸟。鸟说，你不是鸟，因为你没有羽毛。蝙蝠只好去参加兽类，兽说，你会飞，你不是兽。于是蝙蝠既当不成鸟，又当不成兽，只好在黄昏孤独地起飞”。为啥？

杜歌纳教授介绍弗格利佐教授借助“反向环形水跃”实验，模拟研究超新星动态，在实验装置水槽中心排水孔周围观察到的气泡、小水环等紊乱不稳定，说明研究的超新星动态也能观察到类似的这种不稳定，这是一种类比的科学方法，弗格利佐教授也许只能用射电天文望远镜中的影像，还原为平面图，才能作此说明。张帆教授说“科学第三极”文章类似“蝙蝠”，不是“鸟”，也不是“兽”——“主流不同他们握手，反说他们是‘江湖科学家’”，“他们自己却认为是主流的，甚至比主流还主流”。张帆教授说得“尖锐”，也不知自己属啥？

其实“科学两极”比这更“尖锐”——“科学三极”才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相安无事是统一的；是“武统”和“文统”之后添加“科统”——类似“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证明的“赵正旭难题”——或叫“柯召--魏时珍--赵华明猜想”，或叫“庞加莱猜想外定理”，或叫“柯猜弦论”，或叫“柯统”——“科统”。而“科学两极”，指跟进的是“武统”和“文统”，要么“崇美”、“跪美”；要么是“乌奸”——有人说科幻小说《三体》刘慈欣在写“未来”，其实是用小说写“科学两极”——《三体》第一部开头第8章“寂静的春天”中，写程丽华是文革时某地中级

法院军管会的军代表，她类似解释了“乌奸文化”和其泛滥的原因：

“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我说我们应该并入苏联，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这样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了……幼稚啊，可谁没有幼稚过呢？”。“乌奸文化”是今天国际上由前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争论，造出的专用名词：小说主人公保尔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时代的造化却被演化看成类似中国的“汉奸”。但从保尔到程丽华，并不是真正“列宁主义”的本意。

“科学第三极”是“中坚”、人类“初心”，不是“崇美”、“跪美”、“乌奸”、“汉奸”；不是5000年中原文明扩散，就写完的历史，而暗地勾连类似藕断丝连的“西来说”。因为还有之前与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联系的人类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纵观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看不到一例汉民族对外族的血腥掠夺和镇压；即使偶有对异族、周边国家用兵之举，也不过是迫其称臣纳贡，从无将其灭族灭种的残暴行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文本教授认为，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唯物论、辩证法、社会主义一个都不能少，形成有中国气魄和中国风格并扎根于中国实践的战略理论。也许这是绝大多数人同意的。以前也是这样。但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中美冲突进一步加深，国际反华浪潮依旧汹涌。加之中国面临脱贫攻坚收官战、十四五规划等即将开启，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如何思考国家发展战略？如何以长远眼光谋划国家未来发展？也是环形水跃及反向环形水跃不稳定现象，可以类比研究认知的问题。

2020年《环球科学》杂志12月号在《环形水跃：一段跳跃的故事》文章之后，接着的文章是：68页《瘟疫如何重塑世界》；74页《完美疫苗：永不停歇的追逐科学史》；80页《被误解的“自然魔法”》；86页《耐药菌之战：新型抗生素崛起健康科学》；90页《反疫苗的根源》——这一系列文章似乎都扣紧我们想探讨“未来百年之大变局”的科学，但都类似“科学”史回顾。而其中稍有不同的是《被误解的“自然魔法”》一文，是阐明“科学三极”的东西在早期的关联性、一致性——“近代早期的人，以不同方式看到了一个内在关联的世界，其中一切事物由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一个整体。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是带著历史印记的过往。而科学革命的实质是，一个处处关联的、充满意义的是世界被瓦解，具有宽广视野的自然哲学家被专业化的技术科学家取代”。这也许使我们想到十多年前，读深圳中航集团高级工程师张帆教授十篇“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系列文章的感受。

认识张帆高工也很偶然。那是2007年11月26日-29日在四川省都江堰市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期间，大会第一天下午开会之前，我们到会场免费给每位代表赠送90万字的《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一书，这是才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库房运到都江堰市来的300本书，出版社的赵刚副社长和责任编辑陈敦和主任也参加了会议。会前该书作者给大会的主办人、成都理工大学刘波教授已经约好，为支持开好这次大会，除免费给每位代表送书外，还给大会赞助一万元人民币。所以刘波教授主动提出，用大会的用车顺便从成都出版社运到会场。11月26日中午，书也运到，我们去取书时，大会主办方的另一位合作者，据他自己说是省委机关后勤处的领导，要叫交了送书的运费，才能从车上取下书。

这次大会，每位代表吃、住和收资料费共计480元。我们给那位年青的省委机关后勤处的领导解释：我们来的三位代表都按数交了费，而大会帮助从成都运送书，是说好不收费的---书是免费送，还给大会赞助一万元。但他始终不同意。反映到刘波教授面前，才知那一万元的赞助费，作者之一的代表还没有办理。我们叫他赶快把一万元的赞助费交了，书才拿到会场---这真像是第一个“环形水跃”。

我们在会场亲自送书，说明好这本书是免费送的。但在会后不久，我们在一家互联网论坛上，看到一位姓刘的老同志写的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文章，说发给他的《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一书，收了钱。真是哭笑不得。我们的跟帖叫他举出见证人，他不再发声了。我们却可以举出见证人---书快分发送到最后时，有一位长得高大、帅气约40岁的代表走到我们面前来，说他是深圳代表团的，他想再要两本书，好带回去送给没有来的两位朋友。他听说我们曾在武汉读过大学，他说他是湖北人，在武汉工作，后来跳槽到的深圳，是深圳中航集团的高级工程师，叫张帆。

张帆高工，人很乐观、热情，在会上给我们留下很好印象。2007年11月的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结束后，我们也和张帆高工似乎没有多少联系。但到第二年即2008年的8月，在新浪网，由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主办的“《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专栏”上，出现张帆教授写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的系列文章。现在还能从2009年11月“西陆网--挑战相对论”专栏保留的《纪念百届卢鹤绂论坛报告会专辑论文目次》介绍，其中目次张帆教授写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后注释：“共十篇，本文为第一篇”。

B、科学与哲学情节在互联网平台论坛环形水跃

我们把“张帆高工”称为“张帆教授”，是依据“志杰海明的博客”专栏主编吴水清教授领军的

“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学术委员会”，给一些前卫的会员，评定了的“教授”职称。2005年我们给吴水清教授推荐的四川罗正大先生，后来就被评聘有“教授”职称。吴水清教授的入选标准是很高的：与吴水清教授联系十多年，我们也只有两篇论文入选他主编的杂志：一篇是《解读罗正大的量子外力理论》，登在2006年第3期的《格物》杂志。另一篇是《韦尔费米子和马约拉纳费米子涉引力子》，登在2017年第4期的《北京相对论研究快报》杂志。

“志杰海明的博客”和“西陆网--挑战相对论”专栏，是比较封闭的---当然很多公开的互联网论坛，发文常理是“依法依规”，但发文还要看人。这个“人”是很大、很多，是分时段的版主。

即这个“人”是既定，好像又不定。因为“志杰海明的博客”发文，并不是吴水清教授一个人说了算，背后还有他依靠的“新浪网”管着。2019年5月23日费伦教授去世，5月28日开的追悼会。我们从高也陶教授那里得知消息后，写了一篇《深切悼念上海复旦大学费伦教授逝世》的文章，寄给了几位我们尊敬的老师，其中就包括了吴水清教授。但2019年6月吴水清教授给我们来信很生气，说他把我们的这篇文章在“志杰海明的博客”专栏刚上网，“新浪网”来信说“不准发”，不然连依靠它们的“新浪网”的“志杰海明的博客”专栏也不准办。当然不止“新浪网”一家，“科学网”也有类似现象---因为我们寄给新疆张学文教授的这篇文章，开始张学文教授来信说，他已经在“科学网”他的个人博客专栏，转发了这篇文章。但不久张学文教授又来信问：“科学网”把发这篇文章不知何故删掉了，是何原因？似乎悼念费伦教授有问题。如果是这样，我们也不知情。

但事情的复杂，是“科学网”的武夷山个人博客专栏，这篇文章至今还能看到。反复研究我们寄给武夷山教授的这篇文章，为啥不被“科学网”删掉？也许武夷山教授是把“科学”，看成类似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是一种“礼”。2019年6月11日“科学网”上武夷山教授转发的《深切悼念上海复旦大学费伦教授逝世（经作者同意转发）》一文，已有8039次阅读。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武夷山教授对费伦教授也是有感情的，他在转发这篇文章的前言中加了“博主按”，说明他与费伦教授相识的经过。接着说明他与该文作者并没有见过面，但多年前读过他们关于三旋理论的论文。他据百度搜索作者简介，和在国家图书馆数据库里能查到作者的四本著作简介，予以一并列出。武夷山教授的细心，是说明他做的工作---作者悼念费伦教授的文章“有三万多字，其中有对费教授学术观点的评述，也有他自己的相关认识和议论。我将与费伦教授相关的文字标红，便于读者尽快了解费教授的工作”

---武夷山教授不愧为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他数十年来几乎每周不间断地在中国科技大报大刊，如《中国科学报》、《科技日报》、《世界科学》等发表文章，是一个奇迹。他对转发我们的文章，类似过去的“政审”，加之他的名望，也许才“过关”。

由此想到“科学”及世界各个强国、大国，对“科学三极”类似“环形水跃与反向环形水跃”模拟反映的相似，和差异的不同，来自哪里？2019年6月5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硅谷风险投资人、《全球科技通史》一书作者吴军博士的文章《科学无国界，因为科学是方法而非政治》中说：“中国古代有广义上的科学，比如博物学，但是没有狭义上的实验科学。中国有自成体系的一套文化，这套文化非常管用，用费孝通的讲法是这叫做礼，就是礼数的礼，礼貌的礼。他认为这是过去中国人认识世界，以及认识人和人的关系的一个大道”。

吴军博士说广义上的科学“用费孝通的讲法是这叫做礼”。还在费伦教授逝世时，我们正在北京，看到2019年5月31日《北京青年报》，发表著名青年哲学家周濂教授的文章《与哲学相比》，其中周濂教授说：“哲学没有进步性，它不断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不像自然科学那样有景观性，后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进步……我们有‘君师合一’的传统，既是封建帝王，也是导师。封建时代已过去了，类似的思维方式仍在，所以不同单位涌现出大大小小的人生导师……今天的读书人，应该接受被边缘化的现实”。周濂教授说的，也许就是吴军博士说的“科学是方法而非政治，科学也是一种‘礼’”。

2020年12月20日“科学网”的个人博客专栏，发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王德华教授的博文《与年轻导师交流：遇到“滚刀肉”型的研究生怎么办？》。在回答跟帖啥是“新概念：‘滚刀肉’”问时，王德华教授说：“土话，就是说‘油盐不进，啥都不听’的意思”。在我们老家四川农村上世纪50年代初，也有土话“滚刀肉”王德华教授说的“油盐不进，啥都不听”的意思。但那时主要是不想走集体化道路的人，采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几乎改造好“滚刀肉”；所以后来再也听不到说“滚刀肉”。王德华教授提到“滚刀肉”，感到既新鲜又不觉陌生。当然王德华教授说的现实的“滚刀肉”，是指“有年轻导师遇到了烦恼的事：新招的研究生安排什么工作，都有借口推辞：要么说工作基础不好，要么说自己身体不好，要么说家里有事情……等等向我讨教遇到这样的学生该咋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也没有一个通用的解决办法”。

也许2008年8月深圳中航集团高工张帆教授，在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

客》网”上，发表系列文章《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时，我们和张帆教授都遇到类似的“环形水跃”---我们和张帆教授只在2007年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上认识，他要的3本《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书都给他送了；虽然交谈不多对他的印象也很好，以后没有再交流。但不到一年，他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文章中指名道姓批评我们---如果仅仅是针对《求衡论》书中关于“黎曼切口轨形拓扑25种空间模型”的科学内容或计算有错，我们都还好解释，也非常欢迎。

但张帆教授针对的是要维护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类似背后20世纪科学“君师合一”作法的认识论---《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一书第三章“会聚技术与观控相对界”第五节“观控相对界”114--115页中说：“观控相对界，实际就是信息相对界。因为它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光速有极限，作为信息与物质相对划分的界面。映射数学的唯象公式是：复数=实数+虚数；时空=物质+信息；物质+信息=实数+虚数。物质和信息的本质是什么？从观控相对界看，物质是相对信息而言，类似复数偏重实数的一种现象；信息是相对物质而言，类似复数偏重虚数的一种现象。这类类似偏微分方程求导，也类似泛系方法”。

这是“《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主编吴水清教授领军的“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学术委员会”，给评定了“教授”职称的前卫会员不赞成的---他们死活要强调有类似的“实数超光速”，能造出“实数超光速”的航天器---20世纪的科学“君师合一”作法，就是来自采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拿下树立起“以苏解马”主张的东西方对立。而“进攻性马”，则主张东西方科学合作---华为总裁任正非时代利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不走“以苏解马”老路，采用“进攻性马”新路，不到20年时间自筹资金实现变小公司为世界前列的电商大企业。

我国内部因挑战相对论平台存在科学原理认识之间的长期“以苏解马”和“进攻性马”理论之争，都不是“战狼式”的真实的实验竞争者。有人说人们对“超光速的信息传输”的误导，源于量子纠缠：“量子纠缠非常奇异：A、B两个纠缠粒子，对其中一个粒子的‘测量’便瞬时引起另一个粒子的状态发生变化---这种瞬时的变化被认为是超光速的通信、‘幽灵般地超距效应’。把科学幻想和神话，当成科学知识来传播，是将量子力学妖魔化”。其实这里的“以苏解马”，如果是把“量子”偷换为“人”的概念，本身才是一种妖魔化。

2019年4月8日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院士在《中国科学报》第一版发表的文章中说：“科学‘从0→1→无穷大’，但‘从0→1’无疑最重要、最基本，因为它意味着无中生有、前无古人，也意味着

原始创新。大胆猜想、小心求证、得出结论，是‘从0→1’的三部曲---想都不敢想、猜都不敢猜，从0→1’就无从谈起……上世纪初建立的相对论、量子力学、DNA 双螺旋结构、信息论等四大基础科学理论，支撑了世界经济社会几十年的发展，但之后一直主要还是靠技术上的不断进步来支撑---特别是‘电子信息+’就是金山银山，是未来科技的突破点和增长点”---但由于受“以苏解马”的影响，许多搞“电子信息+”和“量子信息+”的人，连认知“虚数类超光速”的快子，“想都不敢想、猜都不敢猜，从0→1’就无从谈起”。

今天看李言荣院士妙不可言的“0→1”冲破“想都不敢想、猜都不敢猜”的思维，其实是类似自然国学的“有生于无”和量子力学实验的“量子起伏”---原理在于： $1+(-1)=0$ ；这样的运算，在无穷多的自然数、实数、虚数和复数等包容的数对中都存在。其次，“0”可映射在“点内空间”和“空外空间”---即负实数和虚数可以看作“0”，而负实数开平方是正和负的虚数，但负虚数的平方又是正实数。由此有“霍金辐射”原理、“柯召--魏时珍--赵华明猜想”的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的翻转、量子卡西米尔平板效应、彭罗斯的宇宙轮回“奇点”等理论---但2008年的8--9月面对张帆这种“水跃”该咋办呢？

我们理解张帆教授也遇到的类似“水跃”是，深圳中航集团本身是一个搞“技术”的科学单位，中航的科技工程并不涉及高级工程师们去管“哲学”。即使像2020年12月18日中国工程院在京发布的《全球工程前沿2020》的内容，如机械与运载工程、信息与电子工程、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能源与矿业工程、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环境与轻纺工程、农业、医药卫生、工程管理领域，围绕的是关注工程科技的研究动向，也关注工程科技的开发趋势，即遴选的是各年度的工程研究前沿项和工程开发前沿项，而不是针对其中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但也许正是张帆高工感到这类工程科技的研究动向和开发趋势，是按部就班；需要国家支持的是实在经费和相关设备，个人不容易“出名”。像华为工作的“战狼式”，也仅是收入多一些。

张帆高工也许想学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支持的蒋春暄教授。1961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的蒋春暄，分配到现在的北京中航集团，也是高级工程师。但“文革”受“造反有理”熏陶，自1973年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数论，到1992年在《潜科学》杂志发表研究论文，就能自称“费马大定理已被证明”。再到2009年就荣获国外“特勒肖--伽利略科学院2009年度金奖”，颁奖理由是：“开发了有助于解决数论领域知名基础性问题的新型数论工具”、“认为黎曼假设是错误的主张”、“对Iso数论做出了

贡献”、“他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首先证明费马大定理”。对此，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吴水清会长还是清醒的。

因为最近上海复旦大学辜英求教授就认为：“蒋公新引力公式 $F=mc^2/R$ 是宇宙引力能量公式，在实验室不能验证---显然有一个缺失对应关系的问题，一会快子一会慢子地胡扯。R被解释为天体做圆周运动的半径，显然很多天体不是做圆周运动的，还有多体问题，例如太阳系中几大行星与太阳的耦合作用，这个复杂的系统怎么能用这个引力公式描述？再弱智也能看出这个伟大公式行不通---蒋公的论文公式全部没有现实对应关系，也没有明确参数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是一些符号和记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蒋公一心想得诺贝尔奖，蒋公有点走火入魔了”。那么张帆教授如何来求衡学蒋春暄高工和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网站吴水清会长追随科学“君师合一”的清醒呢？两全其美相得益彰勇敢地迎合，是点名批评《求衡论》一书的作者。

科学是讲理，吴军博士说也有讲“礼”。不发生“环形水跃与反向环形水跃”的方法，是包括不放水。于是当时我们没有回应张帆教授《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文章的批评，只是把其中的两篇收录下来，不想一转眼已经十年有余。确实在2009年之后没有再看到张帆高工有类似文章，出现在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和挑战相对论网站。

2、回复《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摘抄第一篇

A、读第一篇《科学就是反主流》的一点说明

我们收录张帆教授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的两篇文章，大约是2008年8月，当时还是在吴水清会长主编的《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站上看到的。大致最迟到2009年11月这个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主办的网站就取消了，转到专办的《志杰海明的博客》网站上。现在能看张帆教授同题目的文章，内容变了。这个变故，也许与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创建人之一、北京相对论研究联盟会长吴水清教授的夫人张志杰女士，2007年12月14日去世有关。

2007年11月26日-29日在都江堰市开的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我们给张帆高工介绍过吴水清教授，并且托人给吴水清教授送过《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一书。2008年2月7日张帆高工还我们专门来信说：“值此新春之际，我也专门给你拜年！并通过你，专门向尊夫人拜年！你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尊夫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成都一晤，得以解我仰慕之情，并得赠大作《求衡论》。当时你希望我带回一本转赠中大朱熹平教授，很抱歉，我一直没有这个机会。不过我转赠给深圳的汪斌和陈昭光教授了---汪斌是原深圳市政协副主席，‘分管’科技的，‘深圳论坛’得以召开，主要得

力于他四处化缘。陈昭光原是清华教授，是《谁引爆了宇宙？》一书的作者。这样，我还是为大作寻了个好人家。初步拜读《求衡论》后，使我特别是你对于孔少峰的奖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吉祥如意，阖家安康！张帆顿首”。但到8月份张帆高工文章的气氛，却此不同。

这里不能不提到尊敬的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张志杰女士，对于《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站的“挑战相对论”，她是主张要温和---是通过众多科学实验室的测试证明解决有关争端，推进相对论的发展，而不是一概打倒相对论发展取得的实验成果。而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副秘书长黄新卫先生，却与张志杰女士不同，主张激进。上海的吕锦华教授，是毕业于南京大学的老物理学家，他曾批评当时落户湖北的“西陆论坛--挑战相对论”网站，有帖子主张组建八个方面军，用暴力杀害的手段去荡平维护相对论者。黄新卫后来与《志杰海明的博客》网分道扬鞭后，就到“西陆论坛--挑战相对论”网去了。

黄新卫先生 1971 年生，与张帆高工同是湖北人。1988 年他考入湖北汽车工业学院，1992 年毕业就职于十堰市东风汽车公司。他上高中时立志要成为物理学家，1988 年获得首届全国中学生力学竞赛湖北省三等奖。上大学后 2001 年正式研究、挑战相对论。2008 年他提出环球光纤问题，对相对论作质疑并提出代替相对论的理论。黄新卫先生是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他全力以赴地参与联谊会一系列重大活动，多次主持全国性联谊会的会议，在会内外广泛结识友朋，宣扬联谊会的宗旨；还在联谊会网站的建设、管理与信息，在《格物》杂志组稿与审稿；在发展会员与交友等诸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因此荣获过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多种奖励。

张帆教授这时先后与吴水清会长与黄新卫秘书长认识，无疑知道走科技的道路不止一条。我们抄录 2008 年 8 月《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上张帆教授的一篇文章是《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之六》，现在《志杰海明的博客》网上能看到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之六”，全标题已改为《科学的荣耀---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之六》，内容已不同，特别是没有指名道姓的批评，想必张帆高工和吴水清会长，是对张大姐曾经的苦心的纪念。

B、《科学就是反主流》原文部分摘抄以供分析

张帆：《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之六》---所谓革命，是指新事物的诞生和旧事物的死亡，在这个生死交替的过程中，新事物逐渐发展壮大，由非主流变成主流，而旧事物则从主流逐渐衰亡，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历史的铁律！

《求衡论》作者认为，专家一定圣明，主流永远正确，这不仅违背历史的基本常识，更说明他对于什么是科学革命毫无所知！

在工业革命之前，使用马力是社会的主流，以“马力”作为功率单位就是这个历史遗迹。然而蒸汽机终于革了马力的命，成了工业革命的主角。特别是当蒸汽机代替了船舰的桨橹和风帆，英国的资本主义更野心勃勃地开始了建立日不落帝国的远航。然而它也逃脱不了从主流逐渐衰亡的命运，这回是内燃机将它赶出历史舞台的。这就是哪有什么不被淘汰的主流？我们挑战某些主流科学，就是为了淘汰它，因为不淘汰它，非主流的科学就不能登上历史舞台，这是按历史规律办事，是“替天行道”。

其实坐上了交椅的科学家排斥和压制异己的事情，科学史上不乏其例。不过当今排斥和压制异己，有着一个新特点，那就是以圈子里来压制圈子外。这个圈子，据说叫做“科学共同体”。《求衡论》作者其实也遭受过排斥和压制，也被打成了“江湖科学家”。所以我不明白，《求衡论》作者何以要独创“科学地球村”，连地球都扯上了，这不比“科学共同体”更霸道？《求衡论》作者还认为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是主流科学的成果。我猜想《求衡论》作者大概是根据“院士”这个头衔，就把袁隆平的成果归于主流的。那就完全错了！

众所周知，袁隆平的革命性恰恰就在于他推翻了主流学说。按照经典遗传学的观点，水稻是自花授粉的，不能杂交。可是袁隆平在田间发现一株优势非常强的水稻，第二年把它种下去，结果子株发生了很大的遗传分离，高矮粗细不同，生长期也不同，呈现出来的完全是杂种的特征，因为只有杂种才会有遗传分离，纯种是不会有有的。袁隆平当时就想到，如果他选的这株水稻是天然杂交稻，就推翻了经典遗传学认为水稻不能杂交的结论。于是他以后许多年的艰苦工作，就是反复验证他的这个想法，终于培养出优良的人工杂交水稻。这就是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

读《求衡论》作者的文章，总有一种别扭的感觉。不知什么原因？想来想去，终于有所发现。那就是他的学术是非主流的，他自己却认为是主流的，甚至比主流还主流，据他的那篇《纪念...50 周年》的宏文所说，他在西方主流科学的前面，等了他们几十年，现在终于与他们会师。可是主流不同他握手，反说他是“江湖科学家”。有一个童话，说是蝙蝠飞到鸟面前说，我会飞，我是鸟。鸟说，你不是鸟，因为你没有羽毛。蝙蝠只好去参加兽类，兽说，你会飞，你不是兽。于是蝙蝠既当不成鸟，又当不成兽，只好在黄昏孤独地起飞。

C、对《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迟人回复“等文化”

张帆高工说主流不同我们握手，我们反说等了

主流科学几十年。这里“等文化”涉及《求衡论》一书出版的两个偶然条件，要说明。

一是2005年4月我们正要退休时，遇到孔少峰先生。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朝鲜族人、抚顺市人大代表、抚顺市东洲区政协副主席，还担任过抚顺市东洲区副区长。改革开放后他大学毕业在东洲区城建局当公务员，由于家庭经济不好，就下海办企业，搞得很不错，业务都发展了北京。后来东洲区领导要他回来搞行政，他也同意了。因为他上中学和大学对我国学术界争论“超光速”很感兴趣，联系小时候对吊钟的兴趣，他计算出钟摆杆长到30千万米，吊钟摆一动就是“超光速”；但搞企业不像搞行政还有学习时间；但有钱可自费订阅《清华大学学报（自）》和《北京大学学报（自）》，但收获不大。

由于很多时候他为工作，在全国奔波，2005年初一次，他在海口机场候机室等候上机时，在书架上偶然看到我们写的《解读〈时间简史〉》一书，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一个找我们写作《求衡论》的念头油然而生。回到抚顺市，他通过政协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到我们单位绵阳日报社，了解到我们4月底将要退休，他不远千里从东北飞到绵阳。我们当时正在上夜班，他都要我们下班就与他讨论“超光速”。说来话长，“数学决定论”的科研，是个专业门类活。大多数的人，业余喜欢的是写小说、散文、诗词、时评、热点等众人关注的消息，这看我国大多数互联网平台内容就是证明。所以“科学”革命不革命，反不反主流，对大多数人，都无从说起——说起此事，很多空余时钓鱼、打麻将、唱歌、跳舞、健身的人说：“只有疯了的人，吃饱了没事干，才去干此瞎折腾”。我们也是小时候帮大人在农村河边放牛，垒河沙玩，看到收缩有界面，又听说古人认为“有生于无”，想到“有的东西才有界，无的东西才无界”，即暗物质多余明物质吧。

到1963年我们在盐亭中学读高中时，偶听川大数学系毕业分配来盐中初中部教书的赵正旭老师，讲“柯召--魏时珍--赵华明猜想”。这属于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其数学定义为“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后来结合我们的三旋理论进行研究，发现这种翻转，属于彭罗斯讲的“零锥”问题，能翻新彭罗斯的宇宙轮回猜想——类似空心圆球膜面加奇点式的翻转反包围，与一般回旋圈周期不同，可以描述新陈代谢、阳泄阴收，视频连线转播等内外翻转整体观。三旋理论类圈体的自旋有三类62种状态+黎曼切口轨形拓扑25种空间模型，可以编码所有的基本粒子。39年后，到2002年在川大李后强教授和四川科技出版社原《大自然探索》编辑室陈敦和主任等的支持下，出版了70万字的《三旋理论初探》一书。

该书出版后，北京的《博览群书》杂志和《四川日报》都作过介绍，被当时还在北京社科院的黎鸣教授知道。2002年8月霍金第二次到我国访问和讲学，引起“霍金热”。北京“草原部落图书创作室”图书策划人，策划出版《解读〈时间简史〉》一书，找到我们；说他在全国一些大学和研究院遍访作者，都没有人愿意，是黎鸣教授推荐了我们。于是我们答应下来，2003年9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书稿。这就是2005年初孔少峰先生在海口机场候机室，看到《解读〈时间简史〉》一书的来历。所以业余搞“数学决定论”的科研，不存在硬要跟主流和非主流“握手”的问题。

听到孔少峰先生要我们跟他合作写《求衡论》一书，计算的是吊钟摆杆长到30千万米，能引起下端摆锤产生的实数“超光速”。我们大学是学机械工程的，不但课堂上学过高等学校教材《材料力学》，而且课外还找了一本大部头的《材料力学》书自学过。单纯从圆周运动公式计算，是有实数“超光速”，但考虑材料应力强度等因素，是不行的。这个说明很容易把他打发走，但孔少峰先生不是“疯了”，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孔少峰说他是山东孔子家族的后代几十世孙，他们一门古代就迁移到朝鲜。我国抗美援朝时期，他父母迁回中国才生了他。从小爱看《十万个为什么》丛书，使他成为科学迷。国家虽然对朝鲜族很照顾，但家里还是没有很多钱。他下海后有了钱，买了很多科技书和杂志，找过很多名牌大学的专家，但他们确实不跟他“握手”。看《解读〈时间简史〉》一书的“作者简介”，绵阳日报社有他类似被讽刺的“江湖科学家”，他这个抚顺市人大代表、抚顺市东洲区政协副主席，也就不怕了。

我们说的四川话，家乡口音很浓，孔少峰先生很多都听不懂。我们专门请了好朋友绵阳市就业局的老科长刘文传先生，一直作陪。刘文传先生在东北当过兵，在部队保送读过大学中文系。几天时间里，我们向孔少峰先生说明，他的吊钟摆锤，摆杆长30千万米的“超光速”模型，类似一种“宇宙弦”模型。从“弦论”来说，是跟西方的“杆线弦”同种类型。他用的“吊钟摆杆”类比法——这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类比推理的运用，并非那些对自然魔法感兴趣的人独有，而属于一个时期几乎每一位严肃的思想家——运用直接观察、类比、权威文本和征象，在古代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到我国的中医药《黄帝内经》主义者，搜集了大量他们认为存在有关联的事物，预料世界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类比关联。发现自然之中存在着一种类比或对称，就意味着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实际关联。两个自然物之间的每一种类比，绝非人类想象力的产物——在当时，类比论证所具有的特殊力量和明证性，

超出了我们今天的习惯看法。

即早期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看到了一个内在的关联的世界，其中的一切事物，由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一个整体——我们前人所做的，是对看起来类似的各种神秘自然现象做出观察，并由此将世界中的各种关联和作用传递推广为一种更普遍的说法——一种自然法则。他们将观察或叙述的事例，归纳成一般原则，然后演绎出其推论和应用。如国学自然和中医药称的“有生于无”、“阴阳五行”、“经络气血”等。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是带着历史印记的过往。我们并不能说他们的方法或结论，是非理性的，或者由此产生的信念和做法是“迷信”。如果允许这样的跳跃，那么在我们理解世界的过程中，最终未被接受的每一种科学理论，都将被判定为非理性和迷信。

所以科学革命不是反主流，科学革命的实质是一个处处关联的、充满意义的世界被瓦解，具有宽广视野的自然哲学家被科学三极专业化技术科学家取代，其中正确的“数学决定论”不是哲学贫困，而是哲学丰富。例如“超光速”计算，分为实数和虚数两类，不是“以苏解马”搞东西方对立的“单边主义”的只讲“实数”。又如西方“弦论”，只讲“杆线弦”，同“以苏解马”一样，也是“单边主义”——即使西方的超弦理论说的“闭弦”，也是“杆线弦”软化。圈起来的。把国学自然和中医药称的“有生于无”、“阴阳五行”、“经络气血”等，看成科学第三极的“过去时”；科学革命则是现代时、“进攻性马”。

如我们参加 2015 年 12 月 13-14 日在北京召开的第 2 届全国自然国学创新论坛大会，中医药专家俞梦孙院士作《动脉血压共振研究》报告，因为类似摸脉——俞梦孙院士一连讲了：动脉血压血供收缩压和舒张压所构成的脏腑血供共振系统，联系血液本身物理性能和血管状态影响的共振效果；动脉血压及其搏动波形起的类似“气”的作用；血液搏动在血管内壁内皮系统表面产生剪切力促进 NO 酶产生；动脉血压及其搏动波形的中医气血理论等，都类似物理学中的弦理论——我们听得就像讲“管线弦”、“套管弦”、“试管弦”等拓扑弦理论的路径积分一样。所以我们对孔少峰政协副主席讲，他的吊钟摆锤摆杆长 30 千万米的“超光速”模型，是可以联系整个宇宙的“实数”和“虚数”的从亚光速、光速到暗物质、暗能量、暗信息的“超光速”的多体的表现，不是“以苏解马”和科学两极“超弦”的“单边主义”。

这里要说明，美国也有类似实数“超光速”的理论和支持实数“超光速”的科学家，代表人物就是桑蒂利教授。他从正规大学毕业，一路“官科”经历，最终失去在“官科”机构的立足之地。据瞿

立建教授介绍，桑蒂利 1935 年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读高中时就想挑战相对论。1958 年获得那不勒斯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在都灵做高中老师。桑蒂利称在 1966 年获得都灵大学核物理博士学位。1967 年桑蒂利赴美国迈阿密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到波士顿大学。1974 年去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三年访问学者，1977 年到哈佛大学工作。

桑蒂利在哈佛期间创建强子力学，后续还发展出强子数学和强子化学，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原子核中不成立、夸克不存在、能量守恒不成立等，被排挤出这所世界名校。1981 年他成立了“基础研究所”，另创一派“学术”。令他感觉遗憾的是，实验物理学家拒绝检验桑蒂利的理论；他投稿出去的论文，一直被拒稿。于是桑蒂利不仅仅用笔做武器，还拿起法律武器，多次提起诉讼审稿人和编辑，并索赔数百万美元。他的诉状动辄长达数百页，充满数学公式、物理名词，还有长长的参考文献列表，他不请律师，亲自上场与被告律师辩论。可惜他没胜诉过。我们知道桑蒂利，是 2007 年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上认识陈一文顾问和蒋春暄教授，知道在教中国人学他。

陈一文顾问会后送给我们的《桑蒂利教授的冷核裂变资料介绍》，以及提出中国的研究机构与大学应翻译出版桑蒂利 2001 年出版的专著《强子化学基础及其对新型能源与燃料的应用》，我们都作过认真的了解。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桑蒂利教授的冷核裂变俗称“磁分子燃气”技术，虽然得到当时美国总统卡特指示能源部的资助，说是能取代化石燃料的真正绿色环保、经济、安全新型可再生能源的政府资助基础研究项目，后来卡特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金。实际类似我国哈尔滨司机的王洪成的“水变油”技术，是一场“乌龙”。

这里也存在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和数学决定论的哲学丰富——桑蒂利教授反夸克、反量子色动力学等数学计算，另创一派“强子学术”，其实仍然是停留在主流核物理化学知识的哲学贫困上。常态下“水变油”是不行的，盐亭县农机工程师马成金的实验有证明。但真空不空，真空的能量暗藏在虚粒子中，而虚粒子可以看成是瞬间生成又立刻湮灭的一对正反粒子。这个正反粒子对，在一定的环境被扰动的真空中，虚粒子转化成实粒子的现象，被称为动态卡西米尔效应。由此建立在量子卡西米尔效应平板模型上的量子色动力学等数学计算原理，朝鲜运用延伸扩展到消除核爆有放射性辐射泄露的生产的核武器上，显著特点是核辐射的放射性小——2016 年 1 月 6 日朝鲜在丰溪里核武试验场进行的第四次核试验，我国环保部在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启动了应对朝鲜核试验辐射，全面开展东北及周边地区辐射环境应急监测。1 月 6 日边境地区 25 个自

动监测站实时空气剂量率监测数据在 65 至 95 纳戈瑞每小时之间,监测结果均在当地本底范围内。2016 年 1 月 6-24 日公开的朝鲜丰溪的氢弹实验,是否已超越五大常务理事国等的研究层次,进入第三个层次的“量子色动化学”解释?

蒋春暄教授 2007 年第二届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上,介绍桑蒂利教授自办《代数·群·几何》刊物,和他协助桑蒂利教授完成 ISO 数学基础。桑蒂利教授也帮助蒋春暄教授在美国出版了《桑蒂利 ISO 数论基础》一书。我们了解过桑蒂利的 iso 数论和蒋春暄的协助:实际桑蒂利和蒋春暄两人,是把负实数(-1)开平方出现虚数算符 i,及其复数运算方式,复制到正实数(1)和正虚数开平方上,改变众所周知的在初等数学正实数(1)和正虚数开平方是得出的实数的情况,为同等可加算符 j 的写法,再和负实数(-1)开平方出现的正虚数混合。这种有算符 j 和 i 的运算,被蒋春暄教授命名为“蒋函数”。

而且这种运算变得复制起来。叫“蒋函数”的原因,也有由于小写字母 i 和 j 相似,而 j 又和蒋春暄姓名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J 相似,是“一举两得”吧。我们认真思考过:把负实数(-1)开平方出现虚数算符 i,和正实数(1)和正虚数开平方是得出实数加算符 j 的写法运算混合,即使这种创新“合理”,也许也仅是彭罗斯说的“宇宙轮回”的纯虚数时间的第三次量子化时空中出现。这种“思维科学”,也许也是“等思维”,而不是量子多体。

“量子多体”类似光线有七色----“多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类似“多体”----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完整统一的,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完整统一的。当然科学前沿的“量子多体”,来源于量子色动力学、量子色动化学等的“深度学习”和“回采”。“量子色动”含有“量子多体”的意思,反之亦然。

而我们说的“等文化”----张帆高工反感说“在西方主流科学的前面等了他们几十年”,这可以改正。而我们向孔少峰先生解释的是,国际主流科学界已在实际天文观测中,得出整个宇宙物质占 27%左右,暗能量占 73%左右。在这 27%的物质中,暗物质占 22%,重子和轻子物质占 4.4%。如果按俞梦孙院士讲中医药涉及动脉血压血供收缩压和舒张压所构成的类似“管线弦”、“套管弦”、“试管弦”的振动,加上他的吊钟摆锤摆杆长 30 千万米的“超光速”类似“宇宙弦”模型,和西方超弦论的“杆线弦”的振动,以此类比,也可以数值计算出把宇

宙类比作容器,只有试管弦、杆线弦、管线弦及套管弦等作搅拌的组合,计算可以正合符现代宇宙学测量获总质量(100%) \cong 重子和轻子(4.4%)+热暗物质(\leq 2%)+冷暗物质(\approx 20%)+暗能量(73%)。

这可见“等文化”在量子信息隐形传输中,实数光速、亚光速和虚数超光速的统一,是超光速存在实数超光速和虚数超光速之争。实数光速如果作为“不变量”,它只能存在于实数类似的时空;它作为实在事物,这是一个可测量计算的唯一标准。但在语言、信息、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等领域,实数超光速可作为谎言、戏说、假设或实验与计算错误等存在。在科学理论中这成两难问题:以牛顿万有引力和麦克斯韦电磁场波计算为例,光速不变,就难以解决“如设绕着星球作圆周运动物体的半径为 1 米,它到星球表面最近距离为 30 万千米,当星球的半径大于 30 万千米时,要速度只有光速大的引力子,传到星球表面的信息才开始让里奇张量引力,产生整个星球体积的同时理想收缩,那么就不能使星球直径另一端的表面也同时开始收缩”。

因此必然有产生一半对一半的实数光速引力子和虚数超光速引力子,并以实数引力子到达时间为准才行。所以彭罗斯用里奇张量解读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是当一个物体有被绕着的物体作圆周运动时,被绕物体整个体积,有同时协变向内产生类似向心力的收缩作用的图像----这里作为隐形量子信息传输,是从量子卡西米尔效应平板间隙内的量子起伏,分离出来补充引力效应的。因为量子起伏也包括暗物质、暗能量粒子的量子起伏,它们不但能执行里奇张量引力和韦尔张量引力的作用,且同时有起调节被绕物体整个体积协变向内,产生类似向心力的收缩作用。

D、“等文化”在科学及社会自然历史中的回顾

促使我们与孔少峰先生合作写书《求衡论》的更大动力,是 1963 年获知的“柯召--魏时珍--赵华明猜想”,已经找到一种类似“管线弦”的证明方法----道理就像《羊过河》寓言中的独木桥的弦图,是拟设独木桥变形为弦线,可类比萨斯坎德的《黑洞战争》一书中的“持球跑进”,即类似空心圆球内表面和外表面连接的“弦线”桥,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把管道及珠子推理到普朗克尺度,只在一条一维的沿着管线内壁移动,内外各自持球跑进的珠子相遇,在转点的普朗克尺度上,由于还可以各占一半合成一个球体,作体旋翻转后,各自再分开,恢复原来各自的形态就能化解矛盾。

特别 2006 年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证明庞加莱猜想传来,我们认为佩雷尔曼只证明了庞加莱猜想正定理,或最多证明了庞加莱猜想逆定理,没有证明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即“柯猜弦论”:求证“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内表面翻转成外

表面”。但在我们 2007 年出版的《求衡论》书中，也没有点出“柯召--魏时珍--赵华明”的名字，直到 2020 年出版的《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书中才不完整地简单提到。是“柯猜弦论”不行吗？“等文化”的背后是什么？

“等文化”不是不争朝夕，而是涉及科学及社会自然历史中的循环。2020 年 12 月 24 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的《2020 年，我们经历了一场“非传统世界大战”》一文中说：

“今年的天灾人祸特别多，但最大的一个事件应该还是新冠疫情，经济学界把它叫做今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作为国际政治、国际战略的研究者，我把它定义为‘人类第一场非传统安全世界大战’。因为新冠疫情是无差别袭击整个人类，人类付出的代价非常大。到目前为止感染数是 7000 多万，死亡数接近 160 万，在疫苗广泛应用之前，很有可能感染数会超过一个亿，死亡数过 200 万。另外世界经济受创严重，这一切其实就是一场战争的影响”。

“柯猜弦论”也许等的就是这场“非传统安全世界大战”，为啥？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5 年按下“暂停键”，已经过 70 年，但它只是一场传统的世界大战---只讲“武统”和“文统”，人类一直没有把“科统-柯统”提上议事日程。“柯猜弦论” 57 年前按下“暂停键”，是社会因素“武统”和“文统”使然。2006 年借百年世界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获解机会，“柯猜弦论”的简单数学证明出书，但还没有足够的例子说服众人。“非传统世界大战”有点像催化剂，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的“科统-柯统”加速了---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封城”、“锁国”隔离，类似的孤岛和岛屿，既有人类社会、物理空间、信息空间所构成的三元空间的转变，也有在类似孤岛和岛屿间架桥梁的“撕破”和“不撕破”两难之间，作选择之困……但疫情催生的大量“云端见”常态化---如网络会议、在线教育、线上会展，大数据智能、群体智能、跨媒体智能、人机混合增强智能和自主智能系统等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都在证明类似“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还可以“不撕破”---类似“柯猜弦论”的预示。

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等文化”---2020 年 12 月 21 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傅高义做客观察者网对话张维为：聊聊邓小平》一文，是观察者网重发 2013 年的此文，以此纪念 2020 年 12 月 20 日去世的傅高义教授。这位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的荣休教授，1930 年生。他历时十年的巨著《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发行后反响巨大，获奖无数。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张维为教授，曾担任过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教授在对话中说的“等”，已得证。

张维为教授说：“邓小平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他的思想和实践改变了中国，现在看来也在改变世界……比如，当时我第一次给邓做翻译是 1985 年 8 月 28 日，是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来访问。第二次穆加贝来华访问，也是我做的翻译。这两次谈话的内容我自己有记录，之后看来真是觉得很精彩。其中在第二次时两人的谈话很有意思，穆加贝非常左，他是游击队出身，他认为中国在搞资本主义，邓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有党的领导，我们的公有制占主体，邓小平甚至讲到了国家机器的重要性---如果有人要把中国转入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用国家机器把国家的方向扭转过来，但穆加贝显然没有听进去。这次会见结束后，邓小平用服务员递上的毛巾擦了一下脸，然后说了一句挺狠的话：‘这个人听不进去，要自己碰’。我现在都认为这是邓小平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好心给人家解释 100 遍、1000 遍也没有用，只能让他自己去碰，碰个头破血流，才能长智慧”。小平同志说话的“等文化”，已应验。

2017 年 11 月 6 日穆加贝解除了长期被视为“接班人”的副总统姆南加瓦的职务，引发 11 月 14 日津巴布韦军方走上街头、占领国家广播公司(ZBC)、扣留总统穆加贝。2017 年 11 月 16 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张维为教授的《邓小平早有预言---这个人（穆加贝）要自己碰！》一文说：“93 岁的穆加贝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津历来友好，但穆加贝对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多有批评。在享有崇高威望的同时，其执行激进偏左的民粹主义政经改革使津国大伤元气，始有今日之乱……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当然他们还在探索中，也许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小平同志高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从啥时产生的？数十年来几乎国内外所有的专家学者，都没有说清楚。也包括写出巨著《邓小平时代》的傅高义教授。

例如，2013 年傅高义教授对话张维为教授《聊聊邓小平》一文中说：“邓小平很可惜的是他不写自传。虽然他不太谈自己的思想，但是儒学肯定有影响，比如他很尊敬自己祖先的牌坊……为什么他不回到故乡，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要表示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中国的孩子、也不是为了自己亲戚，也不想给亲戚提要求的机会……第二，我认为他与他父亲的关系不太融洽。邓蓉也曾说，邓小平几乎没有谈过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父子关系不太理想，但是他父亲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他 15 岁去重庆参加留法预备班，在这些方面按我的理解，儒学对他影响非常深”。傅高义教授的论点是矛盾的：他类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来源，部分联系儒学对小平同志影响深：“他很尊敬自己祖先的牌坊”。但马上又说：“邓小平几乎没有谈过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父子关系不太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等待解释之谜：为啥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赞成：“邓小平没谈过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父子关系不太理想”？而且还把这种说法延伸到伟大导师毛主席头上。这是真实的吗？反过来问：为啥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两位伟人都谈自己的父亲，只有母亲？他们的父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吗？恰恰相反，因为2020年是重庆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2021年是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百周年，上海和重庆同饮一江水；早期马克思主义早在1911年前的湖广和四川的“保路运动”思潮中传播。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两位伟人的父亲，为此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下面是收集到的资料供参考。

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小平同志独立提出来的。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著名武侠小说家、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时，就提到“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最先公开见诸报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闻。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把毛主席列入其中也当之无愧的。而从毛主席到小平同志，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起源，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先生，到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他们的善良、勤劳、勇敢、正直、开拓创业精神，代表的是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更是数亿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从1911年的保路运动，即使到在今天，应该说，也是要保护的这类小康人家——想杀掉他们的，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死心塌地跟随的人；和“以苏解马”中极端或左或右及其死心塌地跟随的人。毛主席和小平同志领导闹革命，不是要革他们的命。

以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先生为例，他生于1870年逝世于1920年。1886年16岁的毛贻昌先生就曾外出当兵。这正是李鸿章筹办海军，丁汝昌从英、法、德等国考察回来，创建北洋舰队的军队转型时期。毛贻昌先生仅当一年多兵就退伍回乡，17岁时就开始务农当家理事，20多岁时家里也还穷困潦倒，加之妻子文素勤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夭折后，1893年、1896年又相继得到毛泽东、毛泽民两个儿子。

人口的增加使得生活压力加重，加之负债，1902年至1904年毛贻昌先生离家又到外面参加湘军打拼。这正是黄兴赴日留学，次年回国在长沙与

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时期。加上20世纪初洋务运动新思潮更浓，毛贻昌参加的是湖南的新军，受其两方面的影响，几年的军旅生涯下来，眼界大开，见识大增，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这次退伍回家是创业，给儿子们也带回了新思想和榜样。如他赎回老人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22亩，每年能收80担稻谷，并开始把目光转向商业领域。毛贻昌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他最早是从做米生意开始的，大米的初加工，慢慢地利润逐渐滚动，产业也渐渐做大。于是又开始涉足猪、牛的买卖；在牛生意方面，他采取的是“双方自愿，双方有利，风险同担”的办法，即他把母牛买回来后“承包”给他人喂养，养户获牛力、牛粪，主户获牛犊，再出售牛犊或者喂养长大后出卖，从中获利；如果中途意外，牛死了，那么就由两家平均分担损失。

毛贻昌先生继续把钱用在生意投资上，并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他还或多或少地雇用长工、短工。1908年毛家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毛贻昌先生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开始发行“毛义顺堂”股票，并较大规模地使用股票，把邻里乡亲的余钱收集起来，以期增值；发给雇用者使用，则作为工资，可以暂时代替银两；发给生意同行，又成为定金，或者物值。

在小小的韶山冲，毛贻昌可算是个小康人家。但自从1915年毛泽东从第四师范合并转到第一师范，读书参加学潮，揭露校长张干；执笔起草《驱张宣言》传遍整个长沙城，惊动省府衙门。以及1915年毛泽东组织一师校学友会，编印反袁传单，在校内外广为散发，直至1916年袁世凯死。而且毛泽东受父亲曾从军熏陶，显示继承的军事“天赋”：1916年积极报名参加一师学生志愿军，任连长，再到1917年毛泽东首次用兵，在南北军阀战争长沙，军阀傅良佐被桂军谭浩明赶走期间，指挥学生兵护校护城，一百破三千，展示不同凡响的军事才能。事后被一师的师生乃至长沙的警察，都说成是“一身是胆”。毛泽东在校外频繁的社会活动影响，也扩大波及到毛家。

自1917年后的几年中，毛贻昌家发生几次被败兵勒索，又遭强盗抢劫，妻子文素勤多年的病痛，日益加剧。毛贻昌先生面对逆境咬紧牙关，继续支撑家业，而且更加关心公益活动。1919年韶山韶河上修筑石拱桥，毛贻昌先生积极参加修桥义务劳动，并慷慨解囊捐献。当年捐献的7个集体和8位个人，共捐银洋108元。一般人家捐一两元，而毛贻昌先生捐了4元，居个人捐款的第三。所以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实际是受到过他父亲的影响很大。毛泽东也心知肚明，清楚他们父子间事业的关系和相互影响。1910年毛贻昌先生为使家业后继有人，曾送毛

泽东去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当时毛泽东求学心切,请亲戚和老师周旋,毛贻昌先生同意毛泽东去湘乡东山小学堂学习。

毛泽东从小听惯父亲摆谈新军和大城市中保路运动新思潮的趣事。因此到1911年初,毛泽东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当年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地的保路运动,能很快感染年轻的毛泽东。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毛泽东也第一次证实父亲曾密告过他有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传言。自此敢大胆在学校大门口张贴设想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来组织新政府的大字报。到1911年12月底,毛泽东干脆也学父亲从戎,成了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直到1912年5月退出。

因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以后毛泽东还称程潜为自己的“老上司”;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是从程颂公新军那里学来的”。

再说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1886-1936),有些人总纠缠他早年参加当地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说邓绍昌曾在广安县协兴场的“袍哥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首领“掌旗大爷”,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等等。错了。小平同志的父亲是革命党人,参加过1911年的保路运动,参加过1920年的重庆共产党。如果他是土豪恶霸,能送才15岁的大儿子小平同志到法国去学马克思主义。1936年1月24日春节后,小平的父亲离家出外办事,一些受张国焘蒙蔽者在其蛊惑下,对小平的父亲下了毒手。这也许与1934-1936年红军在长征中,1935年10月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挥师南下入川;小平同志因拥护毛主席出名,是反对张国焘的。类似1933年6月张国焘在肃反中杀害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主席(1895-1933),也曾参加“重庆组织”,被张国焘所杀。

金一南教授出版的《苦难辉煌》一书,讲述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陕北革命老区后,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等,在陕北革命老区有“肃反”扩大的错误。戴季英等人的幕后是张国焘,与1931年张国焘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曾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主持开展“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也有联系。1933年邝继勋等红军领导,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秘密处死后,川陕根据地和四川省地下党的行动,完全为张国焘掌控,邓绍昌成为受害者可想而知。邓绍昌先生在广安的不平凡,是1907年考入成都法政学校,毕业时在成都找工作,正赶上辛亥革命前的保路运动。

他奔走呼号,积极从事反洋教和在广安建立革

命军。血气方刚的邓绍昌加入革命军,并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率部参加了地方的武装暴动。所以到民国时期,他才能当上广安县的警卫总办,表面成为公家的人,整天在外忙碌。其实刚直不阿的邓绍昌,追随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反对清廷政策政治运动的张澜、吴玉章等领导人,不愿同流合污;终不为旧权力者所容,受到排挤,担任县团练局局长不到两年就被撤换;不得不跑到重庆避难,寻找吴玉章、张澜、杨闇公、王右木等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中国人,指引出路。

因为邓绍昌先生知道他们中一些人,曾在探讨类似如果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无论如何也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因为王右木对他的关心,邓绍昌在重庆期间,证实重庆要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事。于是他毅然把15岁的小平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使小平同志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邓绍昌为人正直,嫉恶如仇,痛感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横行。他常说:“这个社会是不像个样子,是应该革命”。因此他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邓文明”。生于1886年的邓绍昌,与还大他一岁1911年考入成都通省师范学堂的王右木,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相识相交,成为好朋友。

邓绍昌曾就读的成都法政学校的“绅班”,是晚清修律,国内对法律人才的需求日益急切;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提出建立学堂和国民通识教育体系,其中法律学被订为学堂政法科下与政治科并列的一门学科。成都法政学校创始于1903年,初称“课吏馆”,又称仕学馆。1905年四川总督锡良在赴日考察近代教育后,在已开办半年的仕学馆基础上,创办四川成都法政学堂。1906年法政学堂成立,起初颇受日本影响,之后逐渐显向美欧学习的趋势。法政学堂初分“官班”和“绅班”,彼此相互独立。由于官班专为有科举功名和世家阀阅的人而设立,故而具有实质意义的法学教育为绅班,称“官立绅班法政学堂”。法政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几乎都为四川籍。1912年四川法政学堂发展成为四川法政学校。1914年更名为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7年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连同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五大专门学校,组建成为公立四川大学,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即成为公立四川大学的法政学院。1931年公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和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三校合并组建国立四川大学。

小平同志的父亲邓绍昌先生出生在广安牌坊村一个拥有两百挑(五挑为一亩)土地的殷实大户人家,清末毕业于成都法政学校。1911年张澜、吴玉章、蒙公甫、王济钦、何拔儒等在成都、盐亭领导保路运动,邓绍昌也在广安县奔走呼号积极响应,

是广安县保路同志军的首领，也成为张澜、吴玉章等在广安县的依靠对象。1912年四川成立军政府，张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使署设于南充。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蔡锷。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

这时邓绍昌先生已是北京政府领导下的四川省广安县的团练局长。1918年张澜离川留居北京，作为张澜手下的革命党人的邓绍昌受到排挤，团练局局长被撤换。1919年夏邓绍昌得知重庆总商会会长的汪云松等要办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消息，在张澜、吴玉章、王右木等帮助下，毅然把15岁的小平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使小平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在1919年到1920年间，邓绍昌还多次到重庆寻找张澜、吴玉章指引出路。而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前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思想就开始传入中国。在四川的吴玉章、张澜、杨闇公、王右木等曾参加组织过四川保路运动的同志，1920年3月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

1921年8月由苏共和国际共运代表马林指导的“共产党”才在上海正式成立。由马林做工作，“重庆组织”顾全大局主动解散，有的重新加入上海组织。1921年“重庆组织”解散后，张澜先生首次出任南充蚕丝校校长，开创了四川蚕丝中等职业教育的历史。这也影响到邓绍昌从热心革命，转向实业兴国兴家的探索，没有跟随吴玉章、杨闇公、王右木等后来转入“上海组织”再参加共产党。此后邓绍昌在广安协兴场家里，一心经营200多挑田地的祖业，和从事一些酿酒、粉坊和缫丝的生意。再后在协兴场教过书，开过茶馆、饭馆。

邓绍昌在乡里受人尊敬，他精力充沛，乐观豁达，乐于同人交往，为人正直，嫉恶如仇。但在那种旧中国，社会异常复杂，仅从他先后娶了四个妻子可见邓绍昌活在世上之艰难：邓绍昌的第一个妻子原配张氏，嫁到邓家时，邓绍昌才13岁，但不到两年病死无后。第二个妻子淡氏（1884--1926），生三男二女，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淡氏与邓绍昌结婚的时候，淡家比邓家家业要大得多，家大业大是显贵的标志，同时也是子女受教育的条件。淡氏是长女，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家教的良好教育。张氏去世的当年秋十月，邓绍昌与淡姑娘正式完婚。此时邓绍昌才15岁，淡氏却比他年长两岁，她十分能干，知情懂理。尽管邓小平在他生前，从没公开谈过生母点滴故事，但他对影响他一生的生母淡氏，情深意笃，敬仰犹深。母亲是邓小平的第一位老师，他在母亲身上学到了勤奋、正直和向上的生活态度。淡氏贤妻良母的形象，也深深留在邓小平的记忆中。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作革命党人，能掩护他的“袍哥掌旗大爷”、广安县警卫总办、团练局长等曾经的显耀身份，也一度是广安县及其周围地区有影响的人物。1936年邓绍昌去世之迷，有说是他在回家的南充路上，身中黑枪被土匪或仇敌暗杀；也有说是他曾经作革命党人掩护的“袍哥掌旗大爷”、广安县警卫总办、团练局长等显耀身份，遭红、白、黄、黑、蓝各方人物仇恨。广安属南充地区，离张国焘领导的通南巴苏区近。一些受张国焘蒙蔽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对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先生下毒手，而谎称转嫁是“土匪”所为。

如何解决贫农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其实，从最早秦末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最终到明末清初张献忠的农民起义，他们的血都没有白流——只能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早在1646年11月张献忠的陕西农民起义，张献忠兵败盐亭和西充边境的凤凰山而亡。为啥张献忠在盐亭会兵败而亡？与盐亭的古文明遗存以及这种古文明，存在内乱频发，分裂、战争、灾荒、瘟疫不断等，造成类似“湖广填四川”的数千年的兴衰历史的轮回教训，引起当地的警觉和抗争文化等因素，也有关。盐亭的存古学堂，早于1896年冬天湖南湘乡人蒋德均（1851-1939）提出创办类似“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时务学堂”。而且蒋德均曾任四川龙安（今绵阳市安州区）知府时，到过盐亭，了解盐亭的存古学堂的经验。后因他父丧返湘后参与矿务经营，并向湖南士绅新秀谭嗣同、梁启超、张之洞等口传过。而盐亭存古学堂与盐亭陕西会馆的渊源的联系，是1646年张献忠兵败盐亭而亡，大西政权宣告结束，大批陕西籍的老兵及其家眷，有的改姓埋名，有的削发为尼，留在盐亭当地隐居生存下来。盐亭很多山寨传说的“牛儿大炮”和发现金银财宝，就有转战湖广、江西的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大军有关。从1665年（康熙四年）四川巡抚李国英、张德地奏准垦请清廷招民垦荒，大批湖广、江西、福建、陕西、山西等移民移居四川及绵阳、盐亭，各地移民和商旅不忘根本，集资修建本省会馆。

《中国共产党盐亭县历史》一书6-7页中说：1911年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推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盐亭籍的彭健修先生任保路工作团部书记（秘书）。彭健修与乡人蒙裁成（蒙公甫）、王明金（王济钦）等组建成立盐亭保路协会（分会）……盐亭人民在‘保路同志会’的旗帜下，有数百人投入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从1871年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等思想，“口传”盐亭，到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在盐亭的表现，这40年间盐亭已有一大批“历史智能”转型的新人出生和成长起来，并影响到临县地区。

绵阳市交通运输公司原工会的主席陈奎先生，

收集涪城、江油等地的史料，2015年他出版写的《古水井》一书，采用写小说的办法，披露在国外参加当地的共产党和革命战争的先行者，1911年保路运动前后在四川绵阳地区就早有活动的真实故事——提到有我国南方来的马林式的共产党人，隐匿在绵阳地区的寺庙中，指导革命运动和物色人才——石德贵参加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后被追逃，就偶遇到从南方来的这类“先行者”香客的救援和指教。“香客”也许与1914年在印尼组织共产党的荷兰共产党员马林，有相似之处。

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的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和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到2017年11月13日《绵阳日报》刊登的“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的8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蓉主任的发言，她在《不忘初心 高举旗帜 不懈奋斗》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必然”。四川省党史研究室的宋键处长也在《深化王右木和四川党的创建史研究》的文章中说：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这是四川特有的深刻的阶级和社会根源决定的，进而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而对于它的消亡，宋键处长也说：“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四川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革命的洪流中，以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为后人所称赞”。

20世纪初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和成都法政学堂，曾在四川为保路运动、“重庆组织”和“上海组织”，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这与明末清初以来发生的“湖广填四川”的社会大灾难、大变故有关。与全中国其他地区非常不同的地方，是20世纪初前后的四川殷实人家，不管曾经是来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还是生存下来的本地人，他们成家立业的几代人，都经历过灾难后恢复生产力，发展经济的生存压力和坎坷。数十数百年这种家史的传承与熏染，是巴蜀社会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另一个维度。而且是从远古文明到近代，巴蜀几千年从动乱、灾害不断的兴衰轮回中，生存下来的个别大户人家，有的虽避居躲住在大山和偏远之处，但也有类似康有为的《大同书》中说的“入世界之苦”的想法：“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康有为说他的生活以彻头彻尾的乱世为起点，最终理想景象不管现实能实现多少，描绘的也应是和平互惠共享双赢的“大同之世”。其实巴蜀从秦汉以后有这类想法的人，就对汉朝刘向《说苑·指武》篇中的“抗争文化”，注意联系四川自身

作研究。

特别是经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随着资本主义的东印度公司等商业、人员对南亚、东南亚和中国的入侵，再到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华工归国以及东西方官员、教员的交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并不神秘，“革命”和“大同”作为社会和政治的新闻，影响传播已开始巴蜀一些城市和乡村的大户人家，以及开明人士之间有所耳闻。情理之中也能理解类似范仲纯、王右木、邓绍昌等巴蜀殷实人家的有识之士，对历史兴亡轮回重演的敏感和考虑。

马克思主义1899年前在盐亭“口传”最大影响，是震撼世界的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运动。但在盐亭较正面的“口传”，也类似与一位张家的人物关联——1871年清政府驻法国使团英文翻译、23岁的张德彝，目击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气概后，在日记和寄往中国的书信中，评说那些“叛勇”——公社社员“有仰而笑者，虽衣履残破，面带灰尘，其雄伟之气，溢于眉宇”。类似张德彝的这种评说，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敏感时政要闻，在中国的“口传”回荡久远，在盐亭也有回响。这种“回荡”，还直至50年后，是巴蜀能人首先在重庆自主建立共产党。为啥？

盐亭文通镇石牛庙农民范炳南，清末科举秀才，一生不涉仕，在家只对西汉史学家刘向传承的“抗争文化”作推演研究。如刘向的《说苑·指武篇》中“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类“抗争”，既有政治，也有民生的特征。范炳南在调研近代暴力的“抗争”与“文化”的对立，相互关联类似“湖广填四川”的动乱暴力对土著的冲击，以及类似张德彝对巴黎公社起义的评说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一些评说结合在一起的时政要闻口传，感生自持几代殷实满门书香，应为培育子孙后代去对付和解决这种现象。于是范炳南独自拿出资金，长期聘请有关教师在家开办一所私塾，既教本家几个子弟，又供同族及村内儿童免费读书。在盐亭，这样的私塾和存古学堂很多。范炳南的大儿子范仲纯，受他的影响和指派，早在1906年就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1910年学成归国后，范仲纯开始在自家私塾和盐亭县内及成都、重庆等地新潮人士家庭朋友聚会中讲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东西。

2020年12月14日“麻辣社区盐亭论坛网”，发表盐亭县原文化馆馆长王贤君等搜集整理的《盐亭石牛庙的来龙去脉》一文，讲述石牛庙集中了石牛庙人民的财富与智慧，是石牛庙人民的精神文化瑰宝，是盐亭、南部、剑阁、梓潼四县交界处一颗璀璨明珠。从建到拆历时三百年——石牛庙周围居住的人，有的是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大迁徙过来的人。文革期间，石牛庙同戏楼一并被拆除，木料被

运往黑坪区修建医院和区政府，原址成了一片废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牛贩子蒙绍极私人拿钱，遂发愿重建石牛庙。他便与梁长普、梁仕奥等人在石牛庙乡及四乡八邻集资募捐，几年之间一座崭新的庙宇戏楼拔地而起，晨钟暮鼓、赶会唱戏，供人们参禅、休闲、娱乐。

这也可见石牛庙能诞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范仲纯、范蜀林、蒙公甫、蒙文通等的深厚土壤。何天度老先生，是1991年出版的《盐亭县志》的副主编，他写有范蜀林（1893-1949）和范仲纯（1890-11964）的小传。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简称“重庆组织”，研究称“重庆学”）的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负责人，在《重庆报告》说有“重庆组织”有近40个成员和60多个候补成员。但仅在盐亭的，就有“口传”袁诗尧、何拔儒、杜润之、彭健修、岳鹏程、蒙公甫、蒙伯颀、胥竹成、蒙文通、杜佩绅、任望南、袁焕仙、刘仰高、王济钦、张维川、范蜀林、范仲纯等17位盐亭人参加。而“口传”张澜与罗纶年青时，都曾到盐亭存古学堂过。

这一是因，从盐亭陕西会馆到盐亭存古学堂，传播马克思学说，名声远扬。二是因，出生他们的家乡西充县境，与盐亭接壤近有关。有口传毛泽东参加“上海组织”会议，也还含有曾接受“重庆组织”张澜、何拔儒等的委托作代表。原因是1911年保路运动后，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由此张澜利用他的关系、名望、人脉，和掌握的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一是支持吴玉章组织青年留法、留俄勤工俭学等储备人才的运动；二是支持支持北京地区李大钊、陈独秀，和湖南毛泽东等川外同志的革命活动。1918--1919年青年毛泽东带领湖南勤工俭学留法学生到北京，曾持杨怀中先生手书求章士钊予以资助。

在章士钊筹集到两万银元巨款中，就有章士钊的好友张澜用四川带来的资金，资助的500银元。张澜还运用蒲殿俊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以及1916年袁世凯下台议会重组，蒲殿俊当选众议院议员；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组阁，蒲殿俊又任内务部次长，但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等资质；当1919年蒲殿俊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部长之职时，张澜和他商量：要以他们的资金和广泛的名望、人脉，去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宣传新文化。

张澜的用意，就在推荐蒲殿俊先出头，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也正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的协助下，蒲殿俊在北京《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蒲殿俊还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

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所以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人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相约京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英、张太雷、湖南毛泽东等，能获支持和参与。因此有“口传”毛泽东参加“上海组织”，代表的是“重庆组织”。而揭秘此事，这又回到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以及盐亭龙潭300多位何登甲和申秋成带领的共产党游击队，不赞同张国焘“极左、极右”的创建根据地的意见，被杀有关。

而曾参加“重庆组织”的王右木（1887-1924），有说1924年夏赴广州参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返川途中在旷继勋的家乡贵州土城，说是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牺牲。2002年出版的《中共绵阳市志》一书531页，写成“在贵州土城、遵义一带遇害牺牲”。到2019年12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绵阳市地方志办编辑的《绵阳名人》一书132页，又写为1924年“三月下旬，王右木离开成都，先后到上海、广州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年秋，从广州返回四川，在贵州土城失踪”。

王右木返川路线是保密的，“走失”，广州方面有没有责任？——“重庆组织”发起人中，王右木是第一个最早加入“上海组织”的四川负责人；类似张国焘式的人物，对王右木不放心——这也许遭到党内极端左、右翼的不满，是从广州返川在贵州遇害的一个外因。因十月革命是世界潮流，遵照马林和李大钊的解释，1920年8月30日“重庆组织”开会集体决定自行解散。1956年杨尚昆主任从苏俄拿回的，不是《重庆〈报告〉王右木中文稿》和《重庆〈报告〉张圣英俄译稿》这组材料，而是苏俄的综合整理：是把《“适社”〈报告〉廖划平中文稿》和《“适社”〈报告〉杨明斋俄译稿》这组材料，塞进《俄国综合重庆〈报告〉俄文稿》的。1982年底张秀熟主席看到的《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何盛明主任在《四川党史研究》1983年第9期，发表的《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探索意见》等文章中披露说：张秀熟主席在中央1982年末内部出版前，叫《俄文〈报告〉俄国综合稿李玲中译本》“待查，暂不宜发表”。但何盛明主任发表的文章，还是把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硬要换为苏俄为组建“上海组织”而利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参加的“适社”——她还把已经从“重庆组织”转入参加“上海组织”的王佑木和学生、战友袁思尧，以及《人声》报创刊，说成是“连王右木也曾一度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实王右木1921年底，已经加入了《上海组

织》，这是他直接写信给李大钊和陈独秀解决的。

1921年6月莫斯科大剧院召开“三大”时，1920年3月12日“重庆组织”的成立，已经得到印证---因为当杨明斋带张太雷和俞秀松等三人到达莫斯科时，江亢虎和姚作宾以“中国社会党”和“东方无产者”的身份，已取得了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表决权。张太雷本身是北京李大钊组织的成员，也算是“重庆组织”的成员；“重庆组织”的成立报告，在1920年4月初，交给过共产国际，魏金斯基和杨明斋可以作证。所以张太雷心里有底，能有理有据与江亢虎和姚作宾展开斗争。这时，马林1921年6月指导的“上海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张军锋的《开端》一书提到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报告，他作为中共的代表已得到国内中共中央的任命，提到1921年3月又已召开过的“各级组织的代表会议”---所以解答张太雷的“三月会议”之谜，只能是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

早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准备打造成立“天下”型国家的“共产党”，直到1911年爆发“四川保路运动”才第一次在中国实践和尝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群众运动，也为10年后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在1920年3月12日重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拉开序幕。但现在一些媒体和书刊发表文章，炒作张澜领导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是“贪污闹革命”；清朝的改革“红利”被“保路运动贪污犯窃取”；清朝政府的官是好官。这类似当年对付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苏俄远东局派到上海的杨明斋，在不明真相下，听令利用“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秦慧僧、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参加的“适社”，去作干扰的说法一样。这是违背列宁意志的苏俄部分高层及远东书记处和情报局，自1920年起，对“上海组织”和“重庆组织”的不自信。

张澜和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1920年3月12日成立“重庆组织”，第一批主要吸收1911年参加“保路运动”，并经过十年考验，不忘初心的老同志，以及北京、天津等地支持指导重庆建党的老同志---这之前李大钊与张澜和吴玉章为成立“重庆组织”，研讨过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参加起义的“军运”经验---建党的方略，如“建根据地；搞武装斗争；解决饥民、灾民、难民、移民，保家卫国，办经开区、科创园，发展中医”等。

特别是，这也与吴玉章有组织过“保路同志军”的经验教训---“重庆组织”把搞“川陕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作为“保家卫国--依法治国”、“开创经开区--科技园--中医药”等先行的实践纲领，早在成员中秘密灌输有关---如“民团”和“军运”是一个内容的两种说法，对民团的争取和改造是“重

庆组织”成立时就考验主张的形式和客观事实。“陕北根据地”比“井冈山”更稳固，与此也有关。

2011年我们看到《晚霞报》转载的“重庆组织”的消息后，感到何拔儒之所以在1952年代泄“重庆组织”的星点往事，也许是因他认为没有遵守“重庆组织”解散时双方的约定：“重庆组织”成员不得泄“重庆组织”成立之事；“上海组织”也不得因他们参加而有意追杀。但从张国焘1932年进川到1934年盐亭革命老区龙潭“西山坪”事件发生，暴露张国焘管控四川省委，有人在推行张国焘的追杀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编写中共党史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1951年6月胡乔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文中明确指出：“1921年7月1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12名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胡乔木在党内“一支笔”的地位，和在学界的影响，他的这篇文章自然成为后来学界编写中共党史的一个参照和范本。到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正式出版，才对1921年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党组织没有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而是使用了“党的早期组织”的称法，并把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成立的党组织，由过去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改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我们对盐亭县党史无意识的涉及，起始于1962年上盐亭中学高中后，1963年电影《怒潮》在盐亭公开上映，其主题歌特别动情。该片也被认为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影片，在社会上广为传唱，反响强烈。我们是盐中高65级的学生。盐中高65级班的班长，就是后来的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当过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云南省政协主席的杨崇汇同志。

他的叔父杨作青先生，改革开放后是盐亭县医院的院长、盐亭县卫生局的局长。解放前杨作清读盐亭县文同中学，是彭健修的学生。解放初是彭健修引荐杨作清，参加的土改工作队工作。彭健修（1884-1953），盐亭西陵镇人。1909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与朱德是同学。1911年因与张澜、蒲殿俊、罗纶友善，争川汉路潮中，彭健修任罗纶的团部书记。1914年经张澜推荐，彭健修到广安中学当校长兼教史地，小平同志曾是他的学生。1920年经张澜、吴玉章介绍参加“重庆组织”。彭健修1941年解救过中共地下工作者、盐亭中学董军教官田多文。1952年彭健修作为政府各界会人民特邀代表，参加参观三台、蓬溪、射洪的土地改革时，不幸判处死缓。1953年释放归家逝世。改革开放后，杨作清对彭健修的亲笔评价是：“彭先生一生执教，

虽有参政议政的历史，但绝非蒋家鹰犬。他以其高尚人品、进步思想、渊博知识，影响和教育了他的学生，在川北享有盛名”。

我们和杨崇汇的家，当时都属于盐亭县三河乡。杨崇汇是从龙潭初中考入盐中的，他带领全班同学在每晚下自习后，他都要教唱《怒潮》这首主题歌。在他的鼓动下，我们曾在假期收集1925-1935年间，梓江梓溪河畔龙潭革命老区地下党、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故事，准备写一本《梓江怒潮》的盐亭革命史。当时在梓江梓溪河畔玉龙地区乡间，走访一些老人的过程中，申秋成和何登甲的名字如雷贯耳，被说成是当时地下共产党、游击队最得力的领导人。

如玉龙镇申家沟有一位叫申光甫的老人，曾是申秋成在玉龙镇存古寺庙办的完小读书时的同学，说那时申秋成在班里就宣讲革命，是最活跃的人物；以后申秋成又在此教书。可以想象在1911年至1929年间，在盐亭存古学堂中，老师除了讲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盐亭传统的“龙盘虎踞”远古巴蜀盆塞海里的海洋文明，与山寨城邦文明的嫫祖盘古丝绸经济带外，还增添了师生都可以听类似申秋成演讲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内容更多属于类似保路运动以来宣传的团结一切可团结的进步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精神类似的老式欧洲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联系不大，所以社会上反对的声音的并不大。

但1964年传来电影《怒潮》是为彭德怀翻案，被停映，我们也不提“梓江怒潮”的事了，而全心全意为升大学作努力。2011年看到《晚霞报》上报道“重庆组织”的消息后，回忆起解放初何拔儒向抬他进盐亭县城的天垣乡三村贫农协会主席唐开元老人，透露过何拔儒参加“重庆组织”，以及何拔儒到过长沙教过毛泽东的传闻，很想找何拔儒的后人了解真相。绵阳市嫫祖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陈龙先生，同何拔儒和任望南都是盐亭九龙乡人，我们向他讲到想到盐亭九龙乡寻找何拔儒的后人，了解何拔儒挖掘嫫祖传说的故事，同时顺便想证实何拔儒参加过共产党没有？2014年8月初陈龙先生开车带我们一同到盐亭县原九龙乡，寻访到何拔儒四弟的儿子何连光先生。在采访过程中，谈完何拔儒挖掘嫫祖的故事后，我们问到1920年的“重庆组织”的事情，何连光先生明确说：听自己的父亲讲，他的大伯父何拔儒参加过重庆共产党，后来就没有参加活动了。

而且何连光先生提到任望南每次从外地回到九龙，都要来看他大伯父何拔儒，任望南和何拔儒的关系非常密切。想到绵阳日报社原办公室主任任启乔同志向我们说过，他知道解放初镇压反革命中，何拔儒的孙子或儿子中，有被枪决的。我们也向何连光先生征询有否此事，何连光先生连连说没有---

因为这类事情，是该镇压还是不镇压，当事人的后代及亲属也不愿意讲。所以中共盐亭县委副书记何开文等领导也曾叫我们不要管。写“党史”不是我们的专职或任务，他们说21世纪向前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上海组织”也是“重庆组织”的继续，“重庆组织”与“上海组织”的目标共同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到一起了，还有什么大不了想不通的事。所以对“重庆学”作的探索，我们只是业余，前提仍应以今后官方公开的真实事实为准。

但2016年11月5日《绵阳日报》刊登记者彭雪的《追寻盐亭山乡 de 红色记忆》一文，开篇就说：

“1929年中共盐亭特支建立后，袁诗尧领导盐亭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封建、反剥削、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党组织和农民协会普遍建立”。而在正式出版的《中共盐亭县历史》、《中共绵阳市志》等书中，又记载袁诗尧同志是在1928年2月16日已被国民党军阀秘密杀害于成都下莲池。那么《绵阳日报》记者彭雪是笔误还是说错了，都不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中共盐亭县历史”普及以来，县委和政府有关部门也就是这样公开宣传的。为啥？这是王右木和袁思尧的未解之谜，揭开还有待时日。

现在有些媒体发表文章，攻击张澜等领导的是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是“贪污闹革命”---华为任正非总裁把“进攻性马”，总结为“自己图强，也让别人图强”的战略---中国早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就有成立共产党的准备，是自己图强，也让别人图强；别人先要争强，就让它实践---1911年保路运动就让辛亥革命去建立政权；等到1920年3月在重庆才成立中国共产党---“重庆组织”成立背景，是在北京的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支持张澜返回重庆成立“共产党”---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马列主义者先下的这一着好“棋子”，是即使后成立“上海组织”，即使早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下暂停键，搞“武装斗争”与“依法治国发展民生保家卫国”，也是并行不悖的。

所以再看2020年12月21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的《傅高义做客观察者网对话张维为：聊聊邓小平》一文中，张维为教授回答傅高义教授的话说：“您的书中提到，1926-1927年，邓在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现在再回头看，这段时间似乎特别重要，因为当时正好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后期。列宁虽然去世了，但他的新经济政策还没有结束。我替邓小平做翻译时，至少听他三次讲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认为这是苏联经验中为数不多的好东西”。把小平同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归结为1926-1927年小平同志在莫斯科学习，受“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苏联经验中为数不多的好东西的影响。其实这也许仅是小平同志看作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经验的印证。

E、回复《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说“握手文化”

2007年11月我们在成都第二次全国民科大会上认识张帆高工，2008年2月7日春节他还来信问候，印象不错。12年过去，我们已经不知道他针对我们，2008年8月前后在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主办的“《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上，出现张帆教授写的十篇《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的系列文章，他是如何写出来的？

也许他写的第一篇《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后，我们就开始有交流了。因为我们保存的一篇没有上网的《再论决定论的数学与哲学的贫困》的帖子，其中提到《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之六》文章后，

张帆教授说：“乍看《纪念“三旋理论”诞生50周年》，还以为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由于是‘江湖科学家’写的，50年来不能做实验，就只能在人家的实验中去寻找‘三旋’的影子，所以在文章中，尽是一些东扯西拉、牵强附会。不仅如此，还攀龙附凤，什么时髦就攀什么，比如庞加莱猜想热闹，就攀庞加莱猜想……”我们留的批复是：说得“痛快！”

因为这联系他在《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中说的“握手”：读《求衡论》作者的文章，“总有一种别扭的感觉。不知什么原因？想来想去，终于有所发现。那就是他的学术是非主流的，他自己却认为是主流的，甚至比主流还主流，据他的那篇《纪念…50周年》的宏文所说，他在西方主流科学的前面等了他们几十年，现在终于与他们会师。可是主流不同他握手，反说他是‘江湖科学家’”。

这也许是张帆教授看了之前我们在“《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上发的一些帖子，让很多联谊会学术委员感到不快；他要入“主流群”，就要替他们说话。当时上“《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论坛发帖，还只“注册”被同意后，就可以自由上网发文章。现在所有公开的网站，不是“主流群”是注册不了的。即那时这种能自由“注册”、能自由上网的时代，已开始做封群“改革”。张帆教授是应需站出来，发表封群是以“握手”做标准“说法”的人。我们和张帆高工也算老朋友，争执也是世之常情。张帆高工年轻有为、热情，改革开放到深圳创业，颇有成就。但我们还没有预感到后来的“科学在网络进入江湖时代”----类似现在的5G、4G智能手机，可以自由上网发微信，但要加入其中的一个“群聊”圈子才行----“分群”，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也在与时俱进，把打工之外喜欢谈“科学”的人，分为“主流”群，和“非主流”群。但为何“握手”？如何“握手”呢？

由于“文革”前在学校读书，我们深受“反对成名成家”教育的影响。后来投稿写文章不用真名，

想的是因把书本知识学牢外，业余在喜欢看前沿科学杂志的文章多后，人脑是个奇怪的东西，它可以自然产生联系你在读书以及注意观察自然现象时思考的一些数学计算结果，如“三旋理论”就是这样由来出现的。发表是自己给自己总结；或像在河畔钓鱼的人一样，说一声这里能“钓”到鱼----不知何罪之有？现在到纸质杂志或电子杂志发表科技论文，要交发表费，少的几百元，多的几千上万元。他们嘴上说的是：“杂志传媒的目的，主要是信息传播，为科学发展，各方共同协作”。在美国的科技期刊发表论文和要一本纸质杂志，更贵。想讲价，他们说：“编辑及工作人员每天处理很多的事情，纽约这里的人员工作每小时数十美元的工资人工费用，支出费用比较大，很多实在是赞助性的工作。编辑及工作人员每天很忙，很多事情在做，杂志印刷、邮寄等需要准确的信息，比如哪卷？哪期？第几篇文章第几页？把有某篇文章的杂志寄几本就了行的信息，是不够的。编辑的时间很忙也挺贵的，工作很忙”。

杂志编辑部说的，也是道理。但2020年12月28日晚上，我们看央视4频道播送纪念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诞辰200周年，节目说“1845年2月马克思抵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由于马克思把钱都用在了《德法年鉴》的办刊上，一家陷入无法安家的困境。恩格斯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为马克思发起募捐，并把自己《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稿酬100塔勒寄给了马克思”，解决了一时的燃眉之苦。170多年前发表文章还有稿费，社会进步到今年，科学本身的生产却成了“负生产力”。那么国家社会是如何“握手”科学主流和非主流的呢？

2020年12月28日“科学网”俞立平博客专栏发表《为什么不反对“唯项目”？》，浙江工商大学俞立平教授在文章中说：中国科技评价涉及文化、体制、制度等，“教育部、科技部发起破‘五唯’，是值得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论文、帽子、职称、学历、奖项有问题，今天讨论的与‘五唯’无关，是关于科研项目的。项目的问题太敏感，因为说千句道万句，‘五唯’涉及的所有负面问题，都与科研人员相关，可以将棍子打在科研人员身上。唯独项目涉及的负面问题，似乎科研人员不承担主要责任。如果反对唯项目了，那会怎样？第一，项目不是为了科研。如果不区分，根据中国人的思维，会出现很多伪项目，这才是要命的问题。第二，自然科学研究，可根据研究项目的具体情况给予多少不等的经费支持。第三，项目根本不是研究成果，真正的研究成果是论文、专利、成果转化等等。从这个角度，真正要反对的，恐怕是‘唯项目’。第四，项目就意味着经费。项目本身对科研人员已经进行了补偿”。

从俞立平教授的研究来看，“科学主流”是拿到过“项目”的人，“项目就意味着经费。项目本身对科研人员已经进行了补偿”，即类似“握手”有了对象，如说“论文、帽子、职称、学历、奖项”。所以我们说张帆教授讽刺我们“痛快！”——如他说：“主流不同他握手”；以及他说：“只能在人家的实验中去寻找‘三旋’的影子，所以在文章中，尽是一些东扯西拉、牵强附会。不仅如此，还攀龙附凤，什么时髦就攀什么，仿佛天下没有什么事情不在他的‘大一统理论’之中。一艘航行了50年的船，50年来不能修正自己的航向”。张帆教授把我们说成类似“随朝群”，正确——我们没有拿到过科学主流的“项目”，也就没有“科研经费”和指定的具体科研课题任务。自然我们只能50多年来，在人家的实验中去寻找“三旋”的影子。因为我们相信“实验是检验科学的唯一标准”，所以50多年来可以不修正自己的航向。

那么张帆教授和他为研究挑战相对论说话的人，是个啥被“握手”的情况呢？这个群体太复杂，他们也许是“科学主流群，或非主流群”，但共同的特点是没有拿到“经费”，却自我感觉拿到了“项目”——如“研究挑战相对论”——张帆教授等同志哥“握手”这种“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的项目是从哪里来的？是科技部、教育部、科学院等部级单位下达的吗？从何时开始的？2005年6月8日《中国青年报》纪念相对论诞生100周年，发表记者江菲写的《相对论在中国的一段遭遇》一文中说：1952年苏联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运动，指责爱因斯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中国紧跟“老大哥”其后，在1953年1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联日丹诺夫的文章，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认为他是个“反动分子”。1955年4月爱因斯坦辞世，李四光和周培源代表中国科学界发了唁电。但不久苏联的“批判运动”开始发生影响：中国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最初受苏联的影响；但是在苏联已停止批判的上世纪60年代，中国对相对论的批判，却由于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得愈发激烈。

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自然科学界的批判运动被提上了日程。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一个突破口。发起这场革命的理由是：“只有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1968年3月中科院成立了“学习班”，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1969年8月《相对论批判》（讨论稿）问世。1969年秋，时任中科院负责人的刘西尧召开了“学习班”会议，强调推翻相对论的必要性。

1970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到北京大学召开集会，要求全面开展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群众运动；中科院革委会专门成立了“相对论

批判办公室”和刊物编辑部。1970年这场气势汹汹的批判运动的阵地转移到了上海，成为姚文元直接领导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的重要任务。轰轰烈烈的批判相对论运动持续到1976年，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百余篇文章。那个年代尽管面对政治压力，许多“学习班”的最初成员，在批判中期相继转向。

1977年筹备14年之久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终于正式出版。1979年春，为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科学界人士在北京集会。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批判爱因斯坦的闹剧的终结。

另据“中国科学院”网编年史记载，1970年8月17日陈伯达提出“要开个万把人的大会，请中学生也参加，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发出东方无产阶级的声音”。中科院革委会组织“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出版了《相对论问题讨论》。不久，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受到批判，科学院到了1976年就戛然而止了。

清华大学文克玲教授在2015年6月19日“科学网”个人博客专栏，发表《反对相对论的，专家学者大有人》一文中说：“中国是一个奇妙的国家。在国内，科技日报社和北京前沿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前沿科学》杂志，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 and 卢鹤绂格物研究所主办的《格物》杂志，以及一些高校学报和科技刊物，都在刊发批评相对论的文章。在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网站、西陆网挑战相对论栏目、新华网科技探索栏目等网络媒体，人们能看到更多的批评相对论的文章。在国外，批评相对论的杂志也有很多。极端的相对论批评者认为，相对论充满荒谬离奇的错误，所谓的相对论的实验支持都是牵强附会，相对论巧取豪夺了有关实践的荣誉，因此，相对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相对论维护者，为相对论所做的辩护，全都是强词夺理”。

那么我国近70多年来，“握手”这种“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的项目，“握手”出些啥样的人呢？2020年12月28日上海“观察者”网，发表的《“刚刚，我解开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中说：“你我可以鄙弃，唯独不能忽视他们，他们就是——民科。1980年，刘汉青考上了哈工大，读的是当时火热的材料学。大三时，选择了去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他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挂科、留级、肄业、不工作，蜗居在家闭门造车，靠父母干农活养自己。要知道1980年的哈工大的本科学历得多有前途啊。这些人毁掉自己的力气要是用在正经行当上，远超过一般人的努力，早早可以成为专家了。现在，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进去。也许是因为看不懂的缘故，他们从来不去碰瓷范畴论、同调代数、规范场论、朗兰兹纲领、调和和分析、遍历理论……”。

此文后面跟帖很多，多达25页。其中一位叫

“丹丹”的网友说：“十年前就跟这帮民科过过招，那些明摆着啥都不懂的倒是危害不大，但有一批顶着专家学者头衔的流毒不小，包括但不限于复旦张操、导航所（十二所）的林金、中传媒（和电子所）的黄志洵、北石化的董晋曦、西工大的杨新铁和首都大的耿天明，甚至国家科委前主任宋健院士也起到了非常负面的作用”。但我们这里不想说“民科”、“官科”，只想说张帆教授引出的“握手文化”——众所周知，我国的卫星上天，原子弹、氢弹爆炸，高铁通车等科技成果，是用不着到英文名刊上去“握手”发表说明；外国人也不会怀疑是我国作假。

而且众所周知，拿不到这类项目，你就没有资金、设备工具和人力。所以像我们这种在基层工作的人，即使想过、学过这类工程项目的源头和底层基础理论，却不想“握手”去实干这类项目。但像“考上哈工大的学生刘汉青，大三时选择了去攻克哥德巴赫猜想，挂科、留级、肄业、不工作，蜗居在家闭门造车，靠父母干农活养自己”；或者像考上北航大学，工作在北京航天科工公司的蒋春暄高工，2020年10月10日写的网文《蒋春暄：发诺贝尔奖错在广义相对论错在黑洞不存在》一文中说：“蒋春暄引力公式 $F=mc^2/R$ ，是人类最伟大成果。美国测量引力波后，马上通知蒋春暄。他们也在看我的英文论文，这么多人看我的英文论文。习总书记、李总理，应该支持我的英文论文，将会引起天翻地覆地变化。中国所有报纸、科普杂志，要报道我的英文论文。中国所有院士都能看懂我的英文论文，应该宣传说我的英文论文引力公式，可获诺贝尔物理奖。这更是要中国政府大力宣传和宣传”。我们说：“蒋春暄的问题好解决，他把中文书出版出来，一切都明了”。因为蒋春暄并不一定是爱国，他爱的是英文。

蒋春暄的同事、朋友，北京航天科工高工都世民教授也有证明——他2020年10月11日给我们的信说：“蒋春暄的书，本来就是中文，是经过我院208所一位已去世的老专家翻译成英文。他把原稿拿出来，谁来出版？谁能审查通过？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我曾劝过他：让他在中国知网开户，经过中国知网审查，如果通过是可以出版的，因为我就是这样做的。他把希望寄托在外国人和中国高层领导，这两条路都走不通。他已经八十几岁了，未来的路还有多远？谁也说不清楚。你把问题看得太容易了”。这可见不在出书难，是拜英文的人多。

如2020年12月3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我国科技论文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一文中说：“科技部、财政部于2020年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鼓励科研人员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2019年中国发表

高质量国际论文……在《科学》《自然》和《细胞》共刊登论文6456篇，其中中国论文425篇，排在世界第4位。美国仍然排在首位，英国、德国分列第2位、第3位”。

我们赞同在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发表高质量的论文，但14亿中国人，也许就有13.99900000亿中国人看不到类似国际顶级的《科学》《自然》和《细胞》等科技期刊；能看不到的也许也有13.99900000亿中国人看不懂这类期刊上英语科技的论文。但如果是翻译成的汉语科技的论文，能看懂会很多。如果是这样：中国纳税人供中国科学家研究出来的高质量的科研成果，首先交给的是英语世界的大众，而在国内的大众，只是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才只知道这类高质量科研成果内容的大概。如《二〇二〇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解读》中，说的第六大成果：“微分几何学两大核心猜想20多年后终获证”，教不了中国人。但事情如果真像蒋春暄高工说的：“中国人在国外发表了高质量的英文科研成果，只要中国政府和高层领导大力宣传、支持和认可，就可以获诺贝尔科学奖”。而中国人在国外发表了高质量的英文科研成果，每年中国政府和高层领导都有大力宣传、支持和认可授科技大奖的，却并没有人获诺贝尔科学奖。

由此，2020年12月27日“观察者”网发表的《傅佛果：重塑“汉文化圈”？我不太乐观》一文，这里的“汉文化圈”也涉及“汉字圈”不太乐观。因为研究中国与日本的加拿大研究主席、约克大学的傅佛果教授在文章中说：“在近一百年中，凝聚汉文化圈的元素，比如汉字、儒家思想等都在减弱。在古代，中国的汉字传入了日本，塑造了日本的文化成就与对外交流，并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近150年间，一些现代化的文化趋势（大部分受西方影响）从日本传到了中国。汉字在韩国也用得少了。所以我对‘汉文化’的重塑并不乐观”。

用傅佛果教授的话，看张帆教授为“《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说话“握手”敢于反相反量的人，其实也是像那些想在国际英文科技名刊上发表文章求得国际认可的项目——例如，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办的《格物》杂志，是美国格物杂志社办的，注册是在美国。张亚鹏教授给我们讲他从天津到香港主编的反相反量的《新科技》杂志，注册在法国，出版在香港，在内地招募发行人员——可以说所有反相反量反中医的，都在听令于美国等西方强国。科学第三极没有“反相反量反中医”之说；美苏之间的冷战是把科学两极神离帽合示人。

20世纪开始诞生量子论和相对论两大前沿科学以来，通过120年的实验检验发展，科学真理的全球化愈明。如果说把国学自然和中医药称的“有生于无”、“阴阳五行”、“经络气血”等，看成

科学第三极的“过去时”；那么科学革命则是现代时，“进攻性马”只需“临门一脚”，就能把它们踢进射入当今前沿科学“暗物质、量子起伏、霍金辐射、量子信息编码隐形传输”的“球门”----“有生于无”类似量子起伏、真空能、卡西米尔效应。

“阴阳五行”类似暗物质与显物质，及其自旋算符编码各种基本粒子。“经络气血”类似霍金辐射、量子信息隐形传输和超弦运动----科学第三极没有“反相反量反中医”一说，科研质量在于真实和造福于人类。西方科学有两极，来源于宗教分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划分，基督教又分裂为罗马与东正教。

当然，科学三极也包含有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相得益彰--相安无事等方面的道理。但听令于西方科学两极的“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类似于“环形水跃”----科学的全球化变成“内卷化”、“逆全球”。但20世纪量子论和相对论两大前沿科学实验检验，发展进步出“柯猜弦论”，正在向翻转出现“电信”、“人工智能”等核心关键新技术；虽此极大提前了科学家和大众等群体之间、之内的“握手”能力；科学的要旨在于探索科学真相，但东西方对立“卡脖子”，也笼罩了太多的政治因素：“西方优秀论”在“洋文圈”大行其道，冲击到国内，使一些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好的战略口号，无形变为“洋文圈伟大复兴”、“洋文梦”----吸取“文革”科学革命反主流有教训：数百万“红卫兵”喊着宏大口号，跟的还是类似1952年苏联掀起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运动的影子，直到“四人帮”被打倒。

因为类似2020年12月28日《科技日报》发表的《二〇二〇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解读》中，说的第二大成果“中国史前人群迁徙与族源之谜揭开”，在国内早存在争论。正如原中国工程院徐匡迪院长出席在上海大学举行的“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国际高端论坛、做主旨报告，他无奈感叹：“颠覆性技术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西方优秀论”+“洋文圈”，使祖国人民用钱送出国培养回来的年青的部分优秀科学家，不辨东西。为啥“汉文字圈”，不敌“洋文圈”、“洋文梦”？

2020年9月22日《中国科学报》，发表的《见“微”知著 交叉引领----走进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一文中说：“2019年更是标志性的一年，微尺度国家研究中心共发表10篇《科学》《自然》《细胞》论文，呈全面爆发之势……在《科学》《自然》及其子刊上发表论文310篇”。能够在《科学》《自然》《细胞》三大期刊上发文，是无数科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评选诺贝尔奖、竞选院士、展示大学和科研机构研究实力的重要依据”。

可见在我国主流科学界看来，学《自然》、学《科学》这条路走得对，也是学术特区，显优势的证明和标杆之一。那么2020年“中国史前人群迁徙与族源之谜揭开”第二大成果，又如何呢？

《科技日报》解读说：“八九千年前，活动在中国土地上的人群，与现在的中国人是什么关系？5月《科学》杂志发表的中科院一项论文，利用古代DNA测序，揭开了有关中国南北方史前人群格局、迁移与混合的若干秘密。依靠新发展的DNA捕获与复原技巧，通过测序山东、内蒙古、福建等地11个遗址的25个9500--4200年前的个体，中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在9500年前，一南一北有两个明显不同的族群。至晚在8300年前，南北人群就开始融合了；4800年前趋向强化融合，至今仍在延续。沿着黄河流域直到西伯利亚东部草原的人群，从9500年前起都携有一种古北方成分；而中国大陆沿海及台湾海峡两岸人群，至少从8400年前起携有一种古南方成分，这两种成分截然不同。八千多年以来，南北差异在逐渐缩小。现在任何一地的汉族，都是这两大人群的混血儿。现今广泛分布于台湾海峡、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毗邻，也可以追溯到8400年前。这一人群，按照最新的基因分析，并不是以前一些学者怀疑的几万年前来中国的古人群”。

这帮了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口号的忙了吗？----这批“中国科学家”忘了“一南一北”之间还有中间的青藏高原及珠峰是地球的第三极地球，揭示古智人耐寒，耐氧源于青藏高原之因，与“一南一北有两个明显不同的族群”的起源有关----“沿着黄河流域直到西伯利亚东部草原的人群，从9500年前起都携有一种古北方成分”。“中国大陆沿海及台湾海峡两岸人群，至少从8400年前起携有一种古南方成分。现今广泛分布于台湾海峡、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南岛语系人群，起源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及毗邻”。“至晚在8300年前，南北人群就开始融合了”。这都正确。但2020年11月30日新浪网“何新的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的《可笑装碑！》一文批评：“近几年以来，在某些神秘资本的资助下，包括丝绸之路的西来论，现在的中国人，也都是西方白人传来的。此论现在披靡学界，成为高校讲坛，甚至新开的历史研究院等主流学术的主流论调”。这是事实吗？

2020年我国年青一代优秀的古分子人类学家中，像付巧妹教授、王传超教授和崔银秋教授等引进用古DNA考古被误导----都是受德国马普所等西方古人类考古学家，由于没有到我国西部、西南作具体的汉藏语系等华夏民族人群的基因测序，再与西方控制领土上的古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基因测序的实际对比的影响，而对类似“汉人被尼人和

丹人杂交西来说”，趋之若鹜——马普所等西方古人类考古学家对华人的基因测序，用的多数是在国外生活的华人来代替；这类代替人也许本身就被“维京人”人杂交过。现今广泛分布于台湾海峡、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南岛语系人群，本身也是这种流动、迁徙大的地区。带有过多的古尼人和丹人基因也不奇怪。

2012年由国家基金会提供经费，作川西羌语支人群的遗传结构考察，王传超教授在川西采集的407个健康无关个体的血样；也没发现有古尼人和丹人基因的印迹。而王传超教授还特别提到这样的研究，需要由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与受试者均签署有知情同意书才行。我们说德国马普所等西方古人类考古学家，由于没有到我国西部、西南作过具体的汉藏语系等华夏民族人群的基因测序，原因正是如果得到过我国生命科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通过的证书，以及得到过与我国西部、西南汉藏语系等受试者均签署了的知情同意书，请他们公布出来。没有，只能说是行为不端。其次，他们和我国的合作者没用做过依靠新发展的DNA捕获与复原技巧，测序过1万年以前我国青藏高原周围西南面遗址的元谋人、资阳人、蓝田人等个体的古DNA，证明先被古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杂交了。

2020年6月3日“中国新闻网”发表的《中国科学家通过古人基因组数据探寻中国文明源流》一文，报道由吉林大学崔银秋团队，联合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大学、厦门大学、辽宁省文物与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与考古研究所、漯河市文物与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作市文物与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扎赉诺尔博物馆、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韩国首尔大学等国内外多家单位，共同完成《二〇二〇年国内十大科技新闻解读》中说的第二大成果。

崔银秋教授等人支持近年来学界有人认为是汉藏语系起源于中国北方，帮德国马普所等西方潮流作宣传“维京人”优秀——中国分子人类被尼人和丹人杂交学派认为，尼人和丹人比“北京人”厉害——汉藏语系人群的基因突变非常有可能是尼人和丹人给藏族人的。藏族人走上青藏高原的时，发现他们已直接和丹尼索瓦人进行了基因的交流。于是藏族人身上了丹尼索瓦人的这样一个基因突变，让他们可以非常快速地、不用经过严酷的自然选择，就可以在高原上面生活下来等——但这遭到中国分子人类学泛第三极学派坚持顽强抵抗。

例如，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邓涛教授团队，2007年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

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的考古和基因提取研究，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他们发现冰期动物是在青藏高原受到耐寒的训练，随着冰期到来，它们走出高原，向北扩散。这解释了因能适应寒冷环境的这一现象，不是以前科学界推断的应当起源于高纬度的北极圈地区；之后才沿着距今260万至1万年前往南迁徙，并散布到北半球的广阔区域的。

又如，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院士团队，2007年以来关于从夏河人论证丹尼索瓦人与尼安德特人缘起考古，发现青藏高原东北部甘肃省夏河县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最新确认其为距今16万年的青藏高原丹尼索瓦人古人类，在第四纪最为寒冷的倒数第二次冰期生活于青藏高原，才是神秘古人类丹尼索瓦人的原住地之一。

再如，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陈列馆研究员韩同林教授，2004年出版的《发现冰白》一书，以及出版的《西藏活动构造》、《西藏大冰盖》等书和发表的近百篇论文认为，由于第四纪冰川期间世界成了冰球，只有非洲赤道附近可避严寒，所以欧亚等大洲的古猿人才来到这里，形成人类起源、文明的第一孵抱期。

还有，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的“珠峰映射原理”研究，论证世界人类古文明起源的泛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有“类珠峰辐射”——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这联系解放后1951年修筑成渝铁路发现3万年前的“资阳人”化石，已涉及新时代关注人类文明于起源世界第三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明“中国梦”等大问题。

周忠和院士，1965年生，江苏扬州人。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99年获美国堪萨斯大学博士学位。2010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当年8月就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1年12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8年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2007年《华夏地理》第一期杂志上，周忠和教授发表了一篇《DNA解读人类起源》的科普文章，说帕博的故事让他看到了古DNA研究的巨大潜力。我们不是说帕博教授的业务不精，而是说他的古DNA测序对比，没有到过青藏高原泛第三极远古第二个孵抱期地区作考察，而与此作正面交代——有没有我国生命科学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通过的证书？

帕博教授，即德国马普学会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斯万特·帕博。他为“西方优秀说”争光，据《进击的古基因组研究》说：是1997年帕博团队获得了第一个远古人类尼安德特人的mtDNA；2010年帕博教授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个尼安德特基因组草

图，第一次直接比较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组与现今欧洲人类的基因组，使得有关人类“非洲起源说”大打折扣---这项研究发现，除非洲人以外，当今欧洲人的基因组里全都包含有 1%-4%的尼安德特人的遗传成分，这种古老型人类从未被完全替代。也许这似乎给我国部分主张“多地区起源说”的古人类考古学家帮了忙。但这个忙帮得太大，是帕博教授再接再厉---2014 年帕博团队又成功从西伯利亚距今约 4.5 万年的人类股骨中，获得高质量的基因组序列，发现其约在 70 万年前与丹尼索瓦人具有共同的祖先，“西方优秀说”铁上钉钉，“北京人”和“资阳人”等不是被“欧洲人”杂交，就是一同完蛋---这项研究不仅首次提出了现代人祖先进入亚洲的路线并非只有单一的南线，还确定了现代人祖先与已灭绝的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时间，为“西方优秀说”丰富了古 DNA 数据库，给出了“全新”的解释。

不可否认，西方古 DNA 测序的生物属性具有化石证据无法达到的量化精度，而管控了国际古 DNA 研究的话语权。但所谓主张“多地区起源说”的古人类考古学人才，可以和马普所等国外一线研究机构“并跑”，实为“西方优秀说”的“跟跑”。因为发现远古人类骨化石的地方，多为今天荒凉、偏僻或落后的地区，但这并不一定就是远古人类最早起源的地方---远古人类并不都是“傻子”，喜欢在今天荒凉、偏僻或落后的地区生存，而不喜欢人类生活条件适合的地区。

在今天生活条件适合的地区很难发现远古人类的骨化石，是被自古以来的现代人类占领开发，已经破坏殆尽。亚洲先民演化历史故事的序幕，追溯到一个所有现代人类共同的母亲“夏娃”，她来自非洲偏僻、落后的地区。这与中国地质科学院韩同林教授出版《发现冰白》一书说的：由于第四纪冰川期间世界成了冰球，只有非洲赤道附近可避严寒，所以欧亚等大洲的古猿人来才到这里，形成人类起源、文明的第一孵抱期有关。这不是说尼安德特人和欧亚同时期的古人类，被来源于非洲的现代人类完全替代，对现代人起源没有丝毫贡献。

非洲是现代人的唯一起源地，这正好论证了“珠峰映射原理”研究的，世界人类古文明起源的泛第三极第二个孵抱期有“类珠峰辐射”---第二个孵抱期的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及“远古联合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世界上许多研究机构纷纷建起了古 DNA 实验室，本来是一件喜事。可因卷入东西方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社会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就会有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建构意识形态，并力图夺取主导地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 20 年间，因古 DNA 的保存年限和实验污染问题严重，阻碍它的发展；

最终力挽狂澜的，是后来成为德国马普学会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的斯万特·帕博。古脊椎动物与人类演化的研究领域，一直是理论、科学、文化等属于重大科学基础的“毛坯房”。

卷入东西方对立争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西方优秀说”，打出“光吃老本是不行的”旗号，很清楚是在号召“跟跑”---古生物学这个传统学科，已经在交叉中衍生出新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不紧跟“西方优秀说”国际学术前沿，发展新的学科生长点，如果等到中国的“珠峰映射原理”研究成熟，再布局就失去意义---这里要说为啥古智人耐寒、耐氧，源于青藏高原？是因，这都需要有内行的专家，亲身到青藏高原及原巴蜀古盆塞海地区作艰苦的考古工作，就像在青藏高原中部“高山谷地”考古的科学家那样，才有所发现。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的古生物科考队，从青藏高原的高寒腹地班戈盆地，发现大量古生物化石---班戈盆地化石植物群有 70 余个种类，是目前已知的青藏高原新生代物种最为丰富的化石植物群，距今约 4700 万年。研究发现，这个植物群中不少种类是该类群在亚洲乃至全球最早的化石记录。大多数最近亲缘类群分布于现在的亚热带、甚至是热带地区，说明青藏高原中部在 4700 万年前存在繁盛的亚热带森林植被。

此外，这个植物群和北美、欧洲的同时代植物群相似。这表明，青藏高原不仅是亚洲现代植物多样性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且在古近纪北半球的植物区系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结合其他已有证据，青藏高原中部的“高山谷地”地貌存在至少 2500 万年。基于班戈盆地化石植物群，该科考专家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院所，结合模型定量重建当时的古气候和古海拔。结果证明：在 4700 万年前，青藏高原中部为海拔 1500 米、东西走向的中央谷地，具有温暖湿润的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 19 摄氏度，森林茂密，水草丰美，堪称远古的“香格里拉”。

这一研究，为认识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演化历史，和地形地貌协同演化的过程提供了全新的证据---距今约 4700 万年类似青藏高原西藏中部有一个亚热带性质的植物地区，以后高原低地逐步隆起。而在约 4000 万年前的渐新世，灵长类中产生了猴类和古猿类。到约 1200 万年的前上新世时，古猿逐渐向人转化。新生代的第四纪约 300 万年前至今，是人类的时代。人类在成为完全形成的人之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早期猿人，也称能人，出现在 300 万年至 200 万年前之间。正是在 4000 多万年的地质气候环境变化，以及生物基因 DNA 的适应进化等过程中，青藏高原远古类人猿物种，也就产生出耐寒耐氧基因 DNA 之故。其次理解远古盆塞

海文明失落的证据是：

四川盆地几经盆塞海、几经干涸，由此人类早期起源地的青藏高原，四周河流，江水入川，围绕古四川盆塞海形成过山寨城邦海洋文明，是先于农耕文明的。此期的迁徙实为围绕青藏高原与盆塞海的起落，周期流转，与后来盆塞海彻底干涸后的迁徙也有区别。

这个“远古联合国时期”存在的事实，解决了“多地区起源”和“非洲起源”的争论，也解决了现代人种与中国类人猿不分的错误——20000-8000年前的第四纪大冰川末期气候变暖，使得全世界的冰川绝大多数都出现融化现象，其面积和厚度都在缩小，这不仅改变了当地高原地区的地貌，而且加上8级以上的一些不同时期的大地震，极有可能诱发长江和黄河上游西北、西南高山及丘陵地区的洪水和滑坡，形成远古堰塞湖到远古盆塞海的间断变化的景观——青藏高原这个研究地球环境演变和生命协调演化的天然实验室里，必定还会有更加激动人心的未知世界，等着我们去发现。

科研需要“外围脑”，这也如同张帆教授说的“主流不同他握手”，是不行的。而且我们还认为，集思广益，不与非主流“握手”也是不行的。这类似“环形水跃现象”，这个“圈子”是多大呢？在《三旋理论初探》一书 621-658 页第十五章第一节《高思维与外围脑》中，说所谓的“外围脑”概念，是一种类比——电脑有内存和外存的区别，如软盘就是电脑外存的一种方式。类比延伸到人脑，也有脑内贮存和脑外贮存的区别。例如，书本一类的记录，就可以看成是脑外贮存。但脑外贮存更广泛的意义是外围脑……科技的发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一切的概括，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是称之为“高科技和高思维”。在“科学网”王飞跃教授的博客 2019 年 8 月 13 日发表的《C2M 和 5G: 新时代的智能指挥与控制》一文中，类似提出超级智能与外围脑 C2M-5G 度量的宽窄科学。他们类似说：外围脑超级智能通信技术，每次突破必将引发指挥与控制从形式到内容产生相应的重大变革。例如，人工智能手机和刀片基站 5G 通信技术，已成为美军等关注的焦点。这提出了“外围脑”与“超级智能”的关联。

2019 年 7 月由中信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北京交通大学刘锋教授的《崛起的超级智能：互联网大脑如何影响科技未来》一书，更是指出“外围脑”就类似“互联网大脑”，就是“超级智能”。

2007 年他通过深入研究互联网结构的重大变化，提出并建立了“互联网大脑模型”，对包括城市大脑、行业大脑、前沿科技涌现和相互关系的研究，产生有重要影响。刘锋教授 2019 年 7 月 30 日在《社会科学报》发表《人类正在进入超级智能时

代，论一种新超级智能的崛起》的文章中，开篇就说：“一些人在谈论超级智能时，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到更高程度，产生意识，全面超越人类，可以威胁人类甚至控制人类时，就变成了超级智能。这种对超级智能的认知是人工智能威胁论的变种，其拥簇者包括霍金、马斯克、孙正义等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等”。其实刘锋教授说的这种“新超级智能”的人工智能互联网，也仍然类似一个生物人的大脑之外，还有世界其他人的大脑，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着互联互通。特别是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概念，更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超级智能脑，是全人类之间的一个统一的“外围脑”。

人类作为更有智慧的生物，如果有一种技术和机制使人类联合在一起形成群体智能，那将是一种巨大类似的“外围脑”的智慧能量——人工智能互联网的出现，是这种模型的理想得以实现——互联网正在从网状的信息高速公路，进化成为可捉摸的类似“外围脑”的超级智能系统——1969-1974 年互联网的诞生+协议、1989 年万维网等奠定基础后，人工智能互联网加速向与大脑高度相似的方向发育。各种科技、人文、哲学类似的“外围脑”也不断涌现。

1964 年麦克卢汉从媒介的角度提出了“社会神经网络”；1983 年英国哲学家彼得·罗素提出了全球脑或地球脑；21 世纪与智慧城市结合产生城市大脑、城市云脑、城市神经网络；与类似的“外围脑”概念结合产生了智慧社会、社会大脑，等等。预测互联网大脑的未来趋势，或许还会产生宇宙大脑、智慧宇宙等。类似的“外围脑”的互联网大脑形成的超级智能，对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科技创新、哲学思考产生的影响，刘锋教授因此对新超级智能的定义：就是“数十亿人类群体智慧与数百亿设备的机器智能，通过互联网大脑结构联合，形成自然界前所未有的新智能形式，即新超级智能”。

2020 年 12 月 29 日“科学网”个人博客专栏，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博士后研究员、西南大学陶勇教授发表的《介绍一个新领域：人类群体智能与社会脑》一文中，又提出了张帆教授说的“握手文化”，类似“环形水跃”现象“圈子”的“社会脑”的范围数学公式：

$T = -\ln P(x)$ 。其中的 $P(x)$ 就是人类群体决策 x 发生的概率。

陶勇教授说：“群体智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生物现象，常见的如蚂蚁和鱼群等。一只蚂蚁没有太多的智能，但是一群蚂蚁却可以做高度复杂的智能行为。以此类推，人类作为一种生物，也应该存在着某种群体智能行为”。这是从理论发现的在市场交易的模式下，人类社会的收入结构会呈现指数收入分布规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这个

规律背后的数学特征,可能与人类的群体智能有关。比如,利用指数收入分布可以算出人类社会 GDP 贡献中,有一个技术因子 T,它的形式恰好就是信息量: $T = -\ln P(x)$ 。

陶勇教授还说:“将指数收入分布的出现,建议为人类的群体智能现象,而这个现象的背后是社会的技术进步。2018 年时笔者把这个研究命名为‘人类群体智能’。大约 2019 年时笔者证明:如果人类社会服从指数收入分布,那么人类社会的群体决策,就是一个玻尔兹曼机。笔者将其命名为‘自指玻尔兹曼机’。自指玻尔兹曼机的发现,让笔者觉得人类群体智能这个领域有了一个基础的模型,所以写了一篇新的论文《涌现社会脑》,正式提出‘社会脑’的概念”。

其实陶勇教授的“社会脑”的范围数学公式,是计算不出具体的一个数值的。现在会使用智能手机“微信”的人,加入“微信”群,或邀约兴趣、目的相同和熟悉的人开办“微信”群,不用数学公式,就能知道入群的人数和信息量情况。这种类似各种各色的“环形水跃”,类比“武统”圈、“文统”圈,“当朝群”、“随朝群”等较量,相互学习,互相对等反制,持久类似的“握手”挥舞高科技---技术进步的“电信”、“人工智能”等持续演变成“天眼工程”、跟踪软件等监控,全球化还类似出现“反向环形水跃”的逆全球化、非传统世界大战。

对这类“握手”引起关注,是 2014 年马航 MH370 失踪起。就牵动人心---“握手”是一种尖端科技竞争,也是一种高科技原则,是在马航 MH370 失联客机搜寻的事件中公开出来的---这虽然是指国际卫星监视客机,组织主动出击发跟踪遥感信息,并接收反馈信号以存档备查,而与对方并无“握手”。而且这和公众安全场所和重要道路等,安装天眼工程也相似---这一原则已普及应用。而马航 MH370 航班失踪至今未查明,与当事国家的“握手”不完整的也有关---MH370 飞机的发动机,是英国罗罗公司制造的,安装有跟踪遥感芯片;飞机整体是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也安装有跟踪遥感芯片。

2014 年 4 月 18 日《中国科学报》发表的《MH370 启示:不再让一架飞机消失》文章中说:“罗罗公司的一份资料显示,利用机载传感器和实时卫星传送,该公司的发动机健康管理能够跟踪全球数千台现役发动机的健康状况。罗罗公司透露飞机发动机发送过数据。波音飞机的机翼上有一根天线,即使关闭应答机,天线仍然每间隔一小时向海事卫星进行电子通讯握手,即发送发出砰的声响信号。MH370 在与空管失去联系后以及在 8 点 11 分最后一次与卫星‘握手’前,至少还飞行了 7 个小时,

与卫星进行了 5 次或 6 次‘握手’、不过,这些‘握手’信号只能证明飞机还在运作,并不能如应答机一样完整地提供飞机位置、高度、速度等更具体的信息。通过‘握手’信号的分析,调查人员只能获得飞机与卫星之间的距离。民航领域的确还没有相对成熟的实时监控系统。最大的问题主要是航空公司对卫星、地面站、机载设备、监控人员工资等成本的负担。航空运输是一种商业行为,目的是营利;安全是要付出代价的,绝对安全几乎不可能”。

而引申到科研上,“握手”是主动对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在公众交流平台上的科学思想、发现、信息作搜索---类似美国波音公司 777 机型的飞机引擎,有不为外界所知的先进的精密科技,那就是安置了自动的飞机卫星飞行连接系统。只要飞机在飞行中,每五分钟就会向人造卫星发出脉冲信号,报告飞机的位置。而监测的人造卫星,也通过飞机上的飞行定位仪,向飞行中的飞机报告飞机的位置。这个飞机与人造卫星的信号互换“对话”,在航天技术上俗称为电子信号“握手”。而这种技术对话或者握手,就是我们所简单了解的全球定位系统(GPS)导航飞机自动飞行系统。这种新型而独特的所谓“隐形通讯”技术,在通讯过程所发出的所有信号、讯号、电码、频率输送等电波,可以隐形而无法被侦查到。

未来某一天,当我们回首人工智能、互联网、GPS 会发现,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GPS 称为“整套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控制中心”。上海“观察者”网发表李娇翻译美国专栏作家扎卡里亚的文章:《脸书、谷歌,你们的统治很快就会结束》中说:人们的印象,以为科技公司,是在毫无干涉的情况下,从自由市场中涌现出来的。其实这不太准确。今天的数字经济主要基于三大技术:电脑芯片、互联网和 GPS。而它们之所以能来到这个世上,完全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授意。主导了美国科技经济的几家巨无霸式的公司,建立起高高的进入壁垒,挡住后来者。在硅谷,新创公司已放弃了保持独立的念头---它们的整个商业计划,是尽早被谷歌、脸书、亚马逊、微软,或苹果收购。

美国做贼心虚,它的“隐形通讯”技术监控别人,也怕别人监控自己。我国华为的“新一代刀片式基站”最先进,2019 年 1 月 9 日被公布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自主研发业界领先的基带、中频和处理器芯片技术,率先在基站芯片内支持可信计算、产业化新型氮化镓功放,独创分布式电源技术,实现了基站高效节能,实现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保障了我国在移动通信领域核心设备基站的竞争力持续领先,从而使得整套基站都能在室外挂杆安装,不需要机房,可应用于物业协调难度大、无机房、需快速开站等场景。所以美

国等外国，对华为式电信企业等进行打压，反说我国对它们打压。

2020年9月7日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教授，在“观察者”网发表的《对东西方来说，新冠疫情改变了什么？》一文中说：

“我在全国各地演讲和交流时，遇到最多的是中国……为什么要禁止脸书、推特和谷歌，网络也没有开放？”宋鲁郑教授的解释是：新冠疫情沉重打击欧美西方软硬实力，大幅提升中国在全球地位作用极为突出。西方媒体多是民营，但由于知识精英群体对体制的高度认同，他们相当多的都是自发自觉的捍卫体制，捍卫自己国家的价值观，也自觉扮演维护社会稳定的角色。由于在价值观上“西强我弱”，在信息管理上，就不得不采用封闭、建墙等消极措施。这就如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制造业能力差，不得不进行贸易保护一样，但却引发从业者的不满和逆反心理。宋鲁郑教授的解释，与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解答为啥要说官话道理相同。

2020年8月24日潘维教授在“观察者”网，发表的《美国打压中国其实在加速霸权崩溃，这是美国的致命误判》一文中说：中国的主体民族不使用字母文字，这是世界的唯一。中国不变成英汉双语国家，没法称霸世界。中国人写文章，用字母文字的人看不懂。用字母文字的人写文章，中国人也看不懂。哪怕像我这种在美国读了近10年博士的学人，回国后也逐渐不习惯看英文作品，更别说花好多倍的功夫用英文写作了。14亿普通中国百姓如何？这语言障碍是天然的、巨大的。让中国成为汉英双语国家？到本世纪末恐怕也做不到。

那么科研不用英文，不像蒋春暄教授2007年在成都第二次全国民科大会上对我们说：“不懂英文，就不要学数学”——仅以中文出书和发表论文，科研“握手”就能很好解决吗？例子如张颖清教授的“生物全息”和吴学谋教授的“泛系方法论”，出了很多中文书和论文，但他们去世之后几乎销声匿迹。为啥？在“握手文化”有缺陷。

我们与张颖清教授和吴学谋教授有过亲身接触。1983年就建议他们“握手”合作，他们不同意，认为“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他们个人都是“第一”。张颖清教授的生物全息，是抓住与激光摄影的全息效应“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相似”的联系；到1985年发展出“全息胚”概念，想代替生物学中的“细胞”和“基因”概念。

1985年我们到济南山东大学参加第三次全国生物全息研讨会，当面向张颖清教授汇报：“全息学在国外出现抓住激光摄影把3维物体变为2维胶片，而可以用激光随时复现该3维图景的联系苗头”，我们应该“握手”研究，发挥和应用这类全息图的

全息原理。此时他已经不像1983年和1984年两次接触那么亲切，变得封闭。而吴学谋教授的“泛系方法论”与张颖清教授狭窄相反，七山八河联系太广。1996年5月我们在成都参加第四届全国系统科学学术研讨会，见到大学读书时的保卫处干部余老师，他已调湖北省教育厅任职，是吴学谋教授的追随者。久别重逢很亲切。为便于接近吴学谋教授，余老师亲自带我们去拜见此次研讨会的主讲人之一的吴学谋教授，但他一脸的不高兴，说他的理论不能随便议论，他指向哪就只能跟到哪。

由此，张帆教授在《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中类似提到的“握手文化”，其实很有讲究。张帆教授说我们的学术研究：“是非主流的，他自己却认为是主流的”。他的其他《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系列文章中还说我们：“在文章中，尽是一些东扯西拉、牵强附会。不仅如此，还攀龙附凤，什么时髦就攀什么”。看来“《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平台上，发表的反相反量等言论，也是反相反量人士主动出击行为在“握手”，给我们也提供了“握手”的目标和观察社会态势的考量。说来也是双赢和推动科学进步的时代潮流，无可厚非。但科研发展到“握手文化”，我们赞同这已经是一种“应用大生态”。

2021年1月1日“观察者”网发表的《任正非：要建应用大生态，没有应用华为云就可能死掉》一文中，任正非总裁说：“移动互联网应用、企业应用、政府应用、煤矿应用、机场应用、平安应用等，都是我们生态发展的机会窗。华为的优势在硬件，我们要加强软件、应用生态，不应放弃硬件给华为云带来的优势。保存底层架构的稳定性与高效率，发挥联接+计算的综合优势，并牵引计算、存储、网络等层面向云场景的进一步创新”。任正非总裁的话，对非主流的和主流的使用中文研究科学者，在有生之年如何把关“握手”都有参考。

F、回复《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袁隆平之争”

张帆教授在他的《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的文章中，说我们认为“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是主流科学的成果”；他猜想我们大概是“根据‘院士’这个头衔，就把袁隆平的成果归于主流的。那就完全错了！众所周知，袁隆平的革命性恰恰就在于他推翻了主流学说”。

张帆教授为论证他的“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连我国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也被利用，这不“帮忙”，这和现在网上有篇公号文章：《请暂时遗忘袁隆平，我们应该认识一下这些给我们米饭吃的人们》的奇文一样，是“异曲同工”——该文说的是：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名不副实；“给我们米饭吃”的人，除了袁隆平还大有人在；袁隆平的成就被“过度放大”，应该被“暂时遗忘”，把“舞

台”留给其他科学家。而张帆教授说“袁隆平推翻了主流学说”，是不懂杂交水稻属于国际生物学主流基因学说原理的应用，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站出来说明：不仅“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还有“科学有第一，也有第二”的主流科学家，而且用事实说明了的科学家。

因为袁隆平院士虽然不是基因学说原理的提出者，但他在这方面的“组织应用和收获的实在”，即使不说是“科商”，那么他在对“基因学说原理”的理解，敏锐的洞察，超强组织和坚定执行上，有没有过人的“科商”，让业界对袁隆平佩服的人呢？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李平教授说：受历史环境因素影响，我国当时与国际科技界基本为“零交流”。袁隆平院士的原创性发现，在于开创了杂交水稻学科和杂交水稻产业。扬州大学潘学彪教授说：“1971年找到雄性不育系，1974年找到三系配套模式，此后成立‘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1976年我国就实现了三系配套大规模制种。不到六年时间，在国际上都尤为惊人”。安徽农科院研究员朱启升教授说：“袁先生是杂交稻研究领域的‘旗手’和战略家。在他思想指引下，科研工作者才知道怎么去寻找和创造不育、保持、恢复系等材料，进而培育杂交稻组合”。

以上专家虽然肯定了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学科和杂交水稻产业上的功绩，但并没有说明袁隆平在“基因学说原理”的“科商”高过他们---其实“科商”定义已经挑明存在“意识形态划线等暴力相威胁”。“以苏解马”以“东西方对立”为“科商”，并没有获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存在“虚数”物质超前认识的“科商”，而是拱手把一些自己同胞的前沿科技原理的发现，送给西方，这是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例如，米丘林学说部分的“组织应用和收获的实在”---短期环境改造能改变物种的“李森科发挥”，能否打倒代替西方的“基因学说”，并没有通过“东西方交流”的“进攻性马”类似华为的实践，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强行推开，后来以失败告终；在我国至今在存在反相反量反中医的极端“科商”者，而不重视类似“柯猜弦论”的引力量子学创新等，也正因为是“以苏解马”遗留下的惯性。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是百多年西南大学最杰出的校友，为中国和世界的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的、实实在在的贡献。他的“科商”过人在哪里？实际就在对基因学说的理解上。袁隆平懂英文，他在大学的外文书刊中自学知道摩尔根的理论，遗传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很稳定。但麦克林托1947年提出的基因可移动的“转座因子”理论，是1932年发现类似我国农村说的“花包谷”---某些玉米的颜色会跳跃一样改变位置，而麦克林托已潜心

观察了15年。

西南农学院一位姓蒋的教授，1930年代留学日本掌握家蚕基因育种，回国后在西南农学院讲授遗传基因困难重重，直到1957年被错化“右派”放去“劳教”。1980年代蒋教授获“平反”已经残废。1950年代初蚕茧有两种颜色：黄色和白色。而野外蝴蝶的颜色更是多彩。这对大学时代袁隆平的“科商”是一次激发。2016年袁隆平院士谈过“转基因”，有人说他想搞“转基因食品”。其实，“转基因”分为“人工基因剪接”和生物间自身选择。上世纪70年代袁隆平开创发现一株野生的雄性稗育稻，是属于“后者”；至于人工基因剪接的“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问题？不是袁隆平的科商主攻的对象。

都世民教授对我们说：“科商概念在百度网没有这个关键词，一个科学家能否被社会承认？是天时地利人和所决定，不是贡献所决定。事后讨论科学家的科商概念，很难说清楚”。都世民教授说对了一部分---百度网不是科学编写的垄断，况且百度网本身就有一种封闭性之嫌。其次科商的定义，本身就强调后天的学习，事后讨论科学家的科商，更具有天时地利人和复杂分化的说服力，而不是“学霸”论天下。例如，西南大学公布的袁隆平的学籍卡和大学成绩单，袁隆平1950年入读西南农学院（后并入西南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1953年毕业。他在大学4年8个学期的平均成绩（百分制）是：76.5、70.8、74.9、71.3、72.1、76.4、73.8、75.5。重要的专业课成绩是：植物学（一上）65，（一下）75；农场实习（一上）67，（一下）75；作物栽培学（二下）75；新遗传学（二上）63，（二下）63；遗传育种学（三上）72。为啥袁隆平不是“学霸”？“科商”有眼。

1953年大学毕业时，袁隆平被分到了湖南安江农校。在当年大学生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这算不上一个好单位。如果他是“学霸”，那么也许会与他同届毕业的学霸们一样，很可能留在大学担任老师。袁隆平没成“学霸”却“科商”有眼。西南大学教授、国际著名蚕学专家向仲怀教授说：“成绩并不代表实际能力”。但卢晓东博士不赞同向仲怀教授的解释，他说：“我们不能说学霸们的实际能力不高。这个简单的评论并没有抓住科商要害”---“米丘林学说”是遗传学中的“范式陷阱”---卢晓东博士对“以苏解马”一针见血。

卢晓东博士说：“1949年后，米丘林学说很快成为中国国家公认、唯一正确的遗传学理论，立即进入了农学、植物学、生物学等高校教学中，成为相关学科的主要范式”---米丘林学说构建的“范式陷阱”危害是：“学生在既有的旧知识范式之中学习，他们学习越好、掌握知识更精确、考试成绩越高，不断在旧范式中取得成功的同时，很可能在认

知基础上陷入旧范式越深，越难以跳出旧范式而有所创造”。

但对袁隆平来说，这个范式陷阱渗透在“新遗传学”等农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中，很多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在认知方面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非常幸运的是，袁隆平没有陷进去。“米丘林学说”的范式陷阱，让中国和苏联的农学、生物学等相关专业，20几届的学生都受到影响。那些基础扎实、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更容易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他们可能精力充沛、能力高强，但却因为少了对教材、教学和理论的怀疑，而在基本方向上形成了错误认知，因而难以在后期研究、实践中，轻易地改变方向。这就是范式陷阱，对创造性的制约——但“学霸”不会认账；袁隆平一旦引路，他们跟上后就争功劳。

3、回复《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摘抄第二篇

A、《杨振宁先生期望的答案》原文部分摘抄以供分析

张帆：《杨振宁先生期望的答案——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之七》——杨振宁先生在《美与物理学》的演讲中，对于数学和物理的关系，说了如下的话：

“我曾经把二者的关系表示为两片在茎处重叠的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为甚么会殊途同归呢？大家今天没有很好的答案，恐怕永远不会有，因为答案必须牵扯到宇宙观、知识论和宗教信仰等难题……我虽然不同意“三旋圈量子”是物质的终极结构，但从数学上破解它的自恰性与自足性，同样是一个难题。同样，当今林林种种的“大一统理论”，几乎都是自恰自足的，不可能大家都正确。那么答案在哪里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佛学的认识论中，佛学认为，人所认知的事物，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自心在事物上的投射。在禅宗佛教中那个著名的“风动还是幡动”故事中，六祖惠能对辩论的僧人们说，风也未动，幡也未动，乃是你们的心动罢了。这个故事就是禅宗认识论的通俗版本。

总之，无论是佛学的认识论，还是库萨或者康德的认知论，他们共同想说明的是，人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反映着世界，恰恰相反，人是以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人造的世界中，事物不是它自身，而是人思维模式的投射……如果把它们比喻为电脑运行的不同软件，那么牛顿力学、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非阿贝尔规范物理学，就相当于电脑运行不同软件的时候，物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的不同图象。总之，无论我们研究物理还是数学，都要凭借我们自身的思维模式。进一步说，我们研究物理和数学，只是利用物理和数学的平台，张扬的却是自己思维模式。

更进一步说，对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归根结底

是研究人自己。这就是禅宗佛教的核心观念——“即心是佛”。或许这就是杨振宁先生所期望的答案，物理和数学就是因为这个答案而“殊途同归”。这也是林林种种的“大一统理论”，为什么都可以自恰自足的答案。

B、回复《杨振宁先生期望的答案》是“佛学”吗

张帆教授在《杨振宁先生期望的答案》的文章中说：“杨振宁先生对于数学和物理的关系，为甚么会殊途同归呢？答案必须牵扯到宇宙观、知识论和宗教信仰等难题；答案就在佛学的认识论中。佛学认为，人所认知的事物，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自心在事物上的投射”。“电脑运行，不同软件，物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的不同图象。总之，无论我们研究物理还是数学，都要凭借我们自身的思维模式，张扬的却是自己思维模式……对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归根结底是研究人自己。这就是禅宗佛教的核心观念——‘即心是佛’”。

杨振宁院士信不信宗教？信不信佛学？我们不了解。读2020年《环球科学》杂志12月号80-85页的《被误解的“自然魔法”》一文，它一开头就说：“对于近代早期的人而言，并没有什么严格的壁垒，使科学、人文学科和神学彼此隔绝”。到结尾它说的是：“科学革命的实质是，一个处处关联的、充满意义的世界被瓦解，具有宽广视野的自然哲学家，被专业化的技术科学家取代”。《环球科学》杂志，是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独家授权的杂志。杨振宁院士是最早20世纪70年代初就向周恩来总理推荐翻译办《科学美国人》中文版杂志的著名科学家；我们想杨振宁院士也许，也是赞成：“神学”（佛学）和“科学”彼此“从对早期的人，没有严格的壁垒隔绝；到科学革命被瓦解、被专业化的技术科学家取代”的这种分析的。

杨振宁院士重视专业化的技术科学应用的一个证明是：2009年10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为庆祝前校长高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举行庆祝会，中大博文讲座教授、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到会，讲话说：“诺贝尔奖金委员会越来越重视应用科学。早年的诺贝尔奖，一直到很近的过去，主要做的都是基础科学。而今，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以及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趋势，都越来越重视应用。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这个方向值得年轻人特别注意”。

那么张帆教授把杨振宁院士和“佛学”联系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杨振宁院士重视科学实验吗？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张帆教授把杨振宁院士和“佛学”联系在一起，是指他有“佛心”，即俗话说有“善心”——杨振宁院士心里想着中国的老百姓还不富裕，改革开放初他反对国内做花钱大的高能物理实验——上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等国家领导人，

支持在北京郊区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使中国在“陶-粲”物理上,一直保持着国际领先的纪录。40多年过去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已经穷尽该能区的物理学,做出很多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以后杨振宁院士心里又想着国内高能物理实验部门以外的大多数科学家,做实验也要花钱;国家的钱,大家要分着花用。著名的争论是杨振宁院士和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院士,关于国内建造下一代“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超级质子对撞机”的分歧——杨振宁院士的担心和反对,一是怕建巨型对撞机,导致科研经费流向高能物理;二是还没有完全建立起超越粒子标准模型的理论,造巨型对撞机,好像盲人摸象、瞎猫碰死耗子,万一没有新发现怎么办?2019年11月3日王贻芳院士接受媒体采访,他坚持要建造超大型对撞机。

2020年6月19日世界粒子物理中心“欧洲核子中心理事会”,全票通过未来粒子研究发展的《欧洲粒子物理2020战略》,消息传回国内,又引发第二轮争议。杨振宁院士认为,中国没必要建造这个昂贵的东西,而且结果还是未知,应该把钱用在其他高回报的科研领域。杨振宁院士说的还有很现实的问题,例如全国抗击新冠疫情也需要钱;美国打压我国,搞高科技要“脱钩”,也会使外国的投资减少。

2020年12月19日《中国科学报》,发表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装置正式退役》一文中说:

“大亚湾实验由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主持,是中美两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中方承担全部实验室建设和一半的探测器研制,美方承担约一半的探测器研制,俄罗斯、捷克,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对实验建设和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自2003年开始,经过4年酝酿、4年建设和9年运行取数的中微子实验装置,实现了原定科学目标,完成了科学使命,正式退役。大亚湾实验美方发言人陆锦标教授,总结了实验取得的多个重要科学成果。王贻芳按下了停止运行的按钮。退役仪式结束后,按计划进行设备拆卸撤场工作,预计在半年内完成。之后,实验场地将正式移交给中微子实验所在的中广核集团,由中广核集团进行后续的开发利用”。

王贻芳院士是中国高能物理的领军人物,他在大亚湾发现了第三种中微子振荡方式,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果入选《科学》年度十大突破,发现前两种中微子振荡方式的科学家都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

“中微子”与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的意义有多大?中微子是个非常神秘的基本粒子,它能穿透地球上的任何东西。中微子实验并不是直接观察到了中微子粒子本身,而是一种间接的观察实验计算分析。

联系张帆教授在2009年8月26日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等文章中说:“佛学说人类以眼、耳、鼻、舌、身、意所感知的都是‘幻相’。我套用这个说法,称用数学方法推知的‘时光倒流’、‘空间弯曲’、‘虫洞’、‘宇宙大爆炸’为‘数学相’,那么未经实验证实的‘夸克’、‘希格斯粒子’都是‘数学相’。特别有趣的是,夸克是盖尔曼于1964年提出来的,这也是他获得1969年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然而在30年后,即1994年,盖尔曼又写了一本《夸克与美洲豹》的书。他在书中说,他提出的SU(3)中的U(3)实际上是一个数学符号,并不代表‘实在的’夸克这东西,物理学家们把它误解了。他最后宣称:‘我不相信夸克是有的’”。由此张帆教授也可以说“中微子振荡”是一种“幻相”,或者类比夸克,都是“数学相”。

张帆教授说:“哲学主要研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这种研究可以用数学为材料,也可以不用数学为材料,所以哲学不存在数学贫困的问题。反之,哲学则可以对科学理论进行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从而发现‘科学理论’的错误。拙文《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就是指出了‘时光倒流’、‘空间弯曲’、‘虫洞’、‘宇宙大爆炸’等‘科学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错误……如果说古代神话是拜神教的产物,那么当今的数学神话则是拜数学教的产物。如果说科学能破除神话,那么科学也会滋生神话。数学决定论让我们看到一个极好的、物极必反的例证”。

张帆教授还说:“所以不存在任何物质的‘终极结构’,不管它是‘点量子’,还是什么‘圈量子’。对于人类的狂妄,爱因斯坦似乎也有所感悟,所以他又说道:‘物理学家必须极其严格地控制他的主题范围,必须满足于描述我们经验领域里的最简单事件。对于一切更为复杂的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逻辑上的完备性把它们重演出来,这就超出了人类理智所能及的范围’”。

那么我国高能物理的领军人物王贻芳院士,应怎么回答呢?也许他只能说自己没有“私心”,去对应“佛心”。这类似2019年11月7日《中国科学报》,发表的《王贻芳:建造大型对撞机“没有最坏结果”》一文的报道:“王贻芳今年56岁,而中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规划时间,一期工程计划到2030年完成,实验运行取数10年,二期工程(如果决定建设)计划2040年启动”——所以不存在通过建造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谋取私利的问题。

有报道,王贻芳在某次演讲中直言:建造大型对撞机最坏的结果,也可以帮助我们吧对希格斯粒子性质的了解,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经过他仔细计算,建造大型对撞机的先期投入只需要360亿

元，并非 1000 亿元。如果取得了重大的科研成果，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扩建，做质子对撞机。有人说，杨振宁和王贻芳两人属于科学之上的论战，是学术之争；至于谁对谁错只有等修建了才能知道。

如果不修建的话，省下来的是钱。但是中国高能物理研究，可能会再次落后西方。修建的话，虽然花费了很多钱，但是如果真的有重大科学成果，那不就赚到了吗？就像有位科学家说的那样：18 世纪英国是世界科学中心，19 世纪德国是世界科学中心，20 世纪美国是世界科学中心，21 世纪中国要不要争取一下？

三、数学决定论在 21 世纪的科学发展的

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搞科研

A、从沙寅岳到严家新与张永振

本文读深圳中航集团张帆高工，曾发表在《研究挑战相对论的博客》网上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系列文章，涉及谈如何搞科研？沙寅岳教授看到部分内容后来信说：“科学是讲证据，说这么多空话有何用？”另一位严金中高工，是我们大学母校“文革”后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矿山工作，他来信支持张帆高工说：“科学革命就是反主流。的确如此！对饭桶主流不要客气！”这令我们高兴——总算有反应。

众所周知：“科研是一个不断试错、调整、提升的过程，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科研成果，和不劳而获的学术成就。即便是最优秀的科研人员，也可能需要面对 99% 失败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研精神，才熠熠生辉，激励一代又一代学者锐意进取”——这是 2020 年 12 月 15 日《光明日报》，发表重庆大学曾润喜教授的文章《“学术临时工”是如何产生的》中说的话。曾润喜教授针对的是那些拿“项目”，搞科研的说的话。当然也适合我们想说的那些，没有拿过自主“项目”搞科研的人。

曾润喜教授还说：“‘学术临时工’自我认识到并不适合科研，及早退出科研领域，并非资源浪费，而是正常的优胜劣汰，是对教育科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个人职业规划的合理调整。最重要的是要激发年轻科研工作者，对科研的真理想、真兴趣、真使命。科研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而是承载着攀登世界学术前沿、实现科技强国的重要使命；科研理想不是头脑发热，而是对科研工作的执着热爱、对技术创新的不懈坚持，需要科研人员充满激情、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笑对失败”。曾润喜教授说得完全正确。但像我们这种一生在科学殿堂外，坚持四、五十年业余探讨基础科学理论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天然“学术临时工”，无所谓“自我认识适不适合搞科研，退不退出科研领域”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想去争个人的“名或利”，内心

只想“真诚、真心、真实”地去解决一个基础问题；完成了一个，又去解决下一个。这些问题有的来自书本知识，有的来自个人的实践偶遇。

沙寅岳教授是个“学霸”。工作单位是：“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东灵工程技术中心”；这是 2011 年 6 月 6 日他在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主办的《志杰海明的博客》网上，发表的《论中子、质子、电子和原子核的半径》论文中的标注，却难找“讲证据”。此文中提出“中子会自发地发生衰变转变成为质子，同时释放出电子和部分中性物质。根据力的平衡关系，中子在衰变之前，有如下公式成立： $F = K \times Q_p \times Q_e / (R_n \times R_n) = (M_n - M_p) \times C \times C / R_n$ 。式中 K 为电磁常数； Q_p 为质子的电量； Q_e 为电子的电量； M_n 为中子的质量； M_p 为质子的质量； R_n 为中子的半径；C 为光速”。不知他计算出的“中子、质子、电子和原子核的半径”的数值，有没有“证据”？

因为据百度搜索：沙寅岳，1962 年生，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人。1979 年考取安徽工学院。1981 年提出“新以太模型”。1983 年肉眼观测到一颗高速飞行的恒星，在另一颗静止恒星附近发生转弯，使静止恒星产生高速运动。1984 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浙江省金华市试验机总厂工作。1985-1986 年开始研究数学。2000 年调宁波东灵水暖空调配件中心；该公司是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的研发、实习基地。2002 年解决了千禧年难题之四和难题之五；解决了希尔伯特的第六个问题和第八个问题；超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现代宇宙学、天文学及高能物理学等。因为不是拿项目的人，不知有没有“证据”？

项目的人，也有难处。2020 年 12 月 28 日“科学网”个人博客专栏，发表的《挑战狂犬病的十日观察法：中美顶尖科学家的一次较量与合作》一文，是退休多年的老科学家、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严家新教授写的。他高度评价“全球发现新病毒最多的奇人”——复旦大学的张永振教授，说他认为：“张永振教授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不下于钟南山院士”。但张永振教授却不是院士，这引起我们对如何搞科研的关注？科技“项目”，有没有不成文的注意事项——如 2020 年 3 月前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 的持续流行，已经引起全球的极大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已扩散至 201 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确诊病例累计超过超 51 万例。各国研究人员及相关机构正在加速推进治疗方法的开发及临床试验的进行。严家新教授却说：“张永振教授在最近十余年来一口气发现了二千多种新病毒，被誉为世界顶尖‘病毒猎手’，又是在全球首先公布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作出精准判断的人。此举为全球抗疫奠定了基础，为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张永振教授今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 100

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也是国际权威学术杂志《Nature（自然）》于本月 16 日最新公布的 2020 年全球十大年度科学人物之一”。

更奇的是，严家新教授把张永振教授说成类似华为任正非总裁式的是一个主张“进攻性马”----“东西方科学合作”的科学家。他说：在国际科学界，各国科学家们似乎不约而同地都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通过实验数据来验证或否定初步实验的结果是最可靠、最有说服力的----在本世纪初，张永振是中国疾控中心（CDC）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全职研究员，曾主管过一段时间中国 CDC 的狂犬病监测工作。他原来是研究其他病毒的专家，在新进入狂犬病的研究领域后，也接受了中国当时在该领域广泛流行的若干错误观点，对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十日观察法”和“健康犬不传播狂犬病”的观点，都表示怀疑，并向美国 CDC 的顶级狂犬病专家提出挑战。

但中美顶尖科学家的这次“较量”，最后转化成一次成功的合作：用新的证据，重复证明了十日观察法的科学性。在整个病毒学研究领域，张永振教授是一个在科学问题上敢于藐视权威的勇士，甚至敢于向 WHO 的权威挑战；并在事实最终证明自己挑战失败后，勇于纠正错误，可称得上是双料勇士。这种敢于挑战权威，同时又知错即改的科学精神，值得所有的科学工作者学习。特别是那些至今还保留着与张教授当初相似错误观点的人，更应当知错即改，从善如流。

当时他不光是怀疑，还开展了相关实验，希望用确凿的证据来证明 WHO 的某些观点，确实是错误的。他当时的雄心还不小：找到一个突破口，让中国人也能在国际学术界露露脸，证明中国人在狂犬病的科学研究方面不是吃素的，中国人也有挑战国际大腕、甚至挑战国际最权威的官方机构的能力和水平。正是秉承着这种精神，张永振教授尽管在狂犬病的十日观察法等问题的挑战上失败了，但他在其他病毒发现和分类领域的挑战，却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将病毒学领域的许多美国同行们，远远抛在后面。

B、张永振的数学成功与项目有别

张永振教授到底是个什么人？是像新时期培养出的沙寅岳教授、张帆教授、严金中高工等“战狼式”的科技人才吗？2020 年 8 月 16 日《上海科技报》，发表的《风驰电掣捉魑魅 丹心一片为苍生----记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张永振》一文，提供了研究他成长轨迹的资料。张永振博士生导师，是复旦大学教授；塞尔维贝尔格莱德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

张永振，1964 年生在新疆西北地区，父母是当年到新疆支边的江苏青年。1982 年考入新疆石河子农学院。1986 年他报考研究生，那个从来不考数学的专业在那一年突然加考数学，他落榜了；毕业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外资项目管理办公室。他工作一干就是 6 年，没忘记补习数学这科软肋----从南开大学数学系微积分、武汉大学线性代数，到同济大学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他挤出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弥补数学，1992 年张永振终于考取了华南农大动物科学专业研究生。

他的导师又他送到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免疫学教研室去做课题，他爱上了免疫学这门学科。1995 年他到中科院昆明动物所攻读免疫学博士，2001 年毕业后开始在传染病所工作。张永振有一种像华为职工中那种“拼命三郎”的工作精神----在传染病所，他自学病理、生理、传染病、流病、内科等医学院的教材。但搞病毒研究项目，类似武器军事研究，有敏感问题，可能他那时就没注意：以为病毒命名，在国际病毒学舞台上，发出的是中国声音；这些病毒也许一百年、一千年以后还存在；不管谁再发现，它的名字都镌刻着中国符号、民族印记。所以在张永振团队，发现的千种病毒命名，都有着浓厚的中国色彩。比如楚病毒、秦病毒、燕病毒、赵病毒，还有荆门病毒、温州病毒、龙泉病毒、梁河病毒等。

2017 年张永振教授正式到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工作。根据国际媒体报道，西班牙科学家在 2019 年 3 月 12 日采集的废水中，就发现了新冠病毒的踪迹。法国东北部科尔马市阿尔贝·施魏策尔医院的米歇尔·施米特博士，与张永振团队的研究团队，检查了 2019 年底拍摄的数千张胸部 X 光片，发现 11 月拍摄的 2 张影像与如今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肺部影像症状一致。而美国很多网民披露，在 2019 年就可能感染新冠病毒。那么能命名为西班牙新冠病毒、法国新冠病毒、美国新冠病毒吗？不能，国际卫生组织有统一规定。

为啥中国科学家能率先揭示出新冠病毒的科学特性呢？张永振教授告诉记者，这主要得益于上海市卫生系统和复旦大学对建立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高度重视。事情是 2020 年 1 月初的一天，张永振教授进入实验室按照以往的工作流程，整理从全国合作单位送来的环境及临床样本，对从临床或环境标本中发现的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和分析研究。突然间张永振的心一阵颤抖，一种从未见过的冠状病毒进入了他的视野----张永振格外紧张，2003 年 SARS 侵袭全球，他那时胆战心惊的感觉依稀还在眼前。他招呼团队成员集合开会，开始全力以赴解开这种新型病毒的秘密。经过 40 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努力，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图谱，展现在张永振的面

前。他和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领导班子，第一时间向相关上级单位汇报。

但张永振教授犯了一个所有精英中国科学家的共同毛病：有了重大基础科学的发现，首先是在国际著名平台发表，大道理说是张扬中国的声音---虽然是经过相关部门的同意；但因为是英文洋文，国内看到看懂的人少---国家应该有法律：拿国家的钱做出的科技成果，在国外名刊能发表的，必须在国内中文刊物及时发表，而不算一稿两投，以彰显中国是站起来的，是让中国人民也同时受益，不是屈辱。因为像张永振教授这次的毛病，就引出了麻烦。

2020年1月11日上午，张永振等是向国际生物基因数据库--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提交了序列；这个网站，是一个病毒学、传染病学学的公开论坛。武汉生物制品所严家新教授说：张永振团队在国外英文《自然》杂志上，也刊发了相关学术文章，向全世界公布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他的研究成果为新冠病毒快速鉴定、抗病毒药物的快速筛选和新冠疫苗的快速研发奠定了基础，为全球的抗疫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而张永振教授及合作者以“基因组学观点探讨新冠病毒起源”的论文，还涉及“2019新型冠状病毒与蝙蝠体内发现的SARS样冠状病毒的核苷酸相似性为89.1%，但还需要更多研究确认病毒来源---2019新型冠状病毒和细胞结合的蛋白质与SARS冠状病毒高度相似，因此推测其感染人的机制与SARS冠状病毒相似。在新冠病毒的S蛋白上，有另一个特殊的氨基酸序列插入，见于2019年从云南蝙蝠中发现的另一株冠状病毒，但在整个S蛋白的序列上，这株蝙蝠冠状病毒与SARS-CoV-2的相似度并不高，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自然界中冠状病毒正在进行的趋同演化”。

因2020年1月23日“观察者”网，发表的《疫情下的高校百态，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因疫情引发的学术争议》一文报道：“复旦大学张永振教授团队迅速地分析了武汉新型病毒的基因数据，为的是把破解出来的信息共享。然而南开大学高山教授团队，却在没有和张永振教授团队沟通的情况下，提前利用复旦大学在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国际生物基因数据库网上共享的数据，抢先发表科研论文感到非常的愤怒。置信南开大学，要求高山教授团队撤稿，并且通知了南开大学王磊校长。然而南开大学高山团队却以‘数据是你们自己公开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使用？你也是为公立大学服务的，受到国家科研资金资助，数据不是你们个人的，应该是属于国家的’”。

2020年2月27日“观察者”网还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张永振所在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P3实验室，在1月12日便迎来有关部门的调查，

并在1月13日关停整顿。该实验室在提交了整改报告之后，未得到明确答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一切都发生在基因序列公开之后的第二天。重新申请活病毒的培养等相关的研究，也无法得到审批。’一位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工作人员说”。

可见我国的科技立法的不完善。还有我国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是一项方便中国人也方便外国人的重大科技成果，应该凡是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在一般情况下使用中文，都应使用新中国颁布的简化字，而不使用旧中国的繁体字。一些网友对“观察者”网等报道的跟帖。有说“17年前的SARS疫情防控，可为此次疫情控制提供参考。但前提是需要更多的病毒基因组研究、序列发布，以便科学家对比这两种病毒。这有国家实验室在做，而且一开头就是国家队在做，由国家队按程序向相关国际组织提供。你们各个实验室私自去做，在论坛里乱发，出了问题还要国家去擦屁股，肯定要封！院士这点规矩是知道的，只是为名利而不顾了”。“政府之间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比如美国疾控中心如果需要，可以透过官方管道，或者国际卫生组织的途径来获取。科学无国界，疫情无国界，但人民有国界，医生有国界”。“整顿的好！这涉及国家安全，这是国家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无组织无纪律，拿国家的钱赚自己的名，这是卖国！”

张永振教授说：“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人类未来既要考虑自身的发展，需要建立新的未知病毒筛查发现体系，以及系统的监测网络，查清病毒等微生物体在自然界中的本底。及其进化传播规律。我们希望，未来报道病毒的出现与暴发流行，能像现在的天气预报那样，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解析、早预警’，从而实现新发突发传染病的主动防治。这个监控体系的建立，并不只是区域性的，而应该是全球性覆盖，并且需要全球联网共同携手”。

2、互联网社会主义时代如何搞科研

A、啥是“互联网社会主义时代”？

2021年1月6日“观察者”网，2021年1月6日“观察者”网，发表的《陈经：反垄断之外，也要想想怎么让互联网社会主义纵横天下》一文，使我们眼前一亮：“互联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拥抱互联网，用更多选择走向高级阶段乃至共产主义”。那么让“科学”拥抱“互联网社会主义”，有没有“互联网社会主义科学”？能不能也“让互联网社会主义科学纵横天下”？为啥我们对“互联网社会主义科学”关切？说来话长。

深圳中航集团张帆高工的《数学决定论的哲学贫困》文章批评我们说：“乍看《纪念“三旋理论”诞生50周年》，还以为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由于是‘江湖科学家’写的，50

年来不能做实验，就只能在人家的实验中去寻找‘三旋’的影子，所以在文章中，尽是一些东扯西拉、牵强附会。不仅如此，还攀龙附凤，什么时髦就攀什么，比如庞加莱猜想热闹，就攀庞加莱猜想；地震预测热闹，就攀地震预测；如今低碳经济热闹了又攀低碳经济。仿佛天下没有什么事情不在他的‘大一统理论’之中”。张帆高工说的“事实”，是跟“互联网社会主义时代”有关---业余科学爱好者，也就是张帆等人说的“江湖科学家”，没有拿到“项目”，也就没有专题的科研经费，与正规的专家、教授，以及在正规大学里的学生、研究生也知道如何搞科研相比，21世纪前的“纸质版”时代，人们也知道如何搞科研的---写了文章到杂志、报刊、出版社，去投稿、出版发表。

但在21世纪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已经和“纸质版”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如何搞科研有很大的选择性---正规的专家、教授，正规大学里的学生、研究生，要想发表认可的科研成果，仍要在国家、主流认可的“纸质版”或互联网论文数据中心的地方发表，而且要交一定费用---即使是单位代缴，或私人自费；不交钱，总之审稿、发表的时间，拖得也长。我们认为“互联网社会主义”好；而且14亿中国人中，除开正规的专家、教授，正规大学里的学生、研究生和拿有“项目”的人外，喜欢业余搞科研爱好的人不多，但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江湖科学家”、“民科”，至少也许多到100万人，引导得好就能发挥“余热”---只要做到坚持众所周知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及有过打好基础知识经历的人站出来，以“真诚、真心、真实”的态度对待基础科学前沿理论、原理方面的有所发明发现，在“互联网社会主义”平台上发表己见，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4亿人的国度的中文写作，还是会有所发现，不会永久让英文世界一家垄断我们的话语权---互联网的英语世界2020-2021年的现实，已开始揭示。

2021年1月10日“观察者”网发表的《特朗普推特被永久关停，意味着什么?》一文说：“美国耶鲁大学的雅各布·哈克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保罗·皮尔森教授，合写了一本书《推特治国》。美国大选前夕，此书的简体中文版推出。在书中作者讲述了美国总统权力的三个来源：美国总统具有宪法框架明确赋予的正式性权力；具有作为政党领袖的党派性权力；以及如果他操作得法，可以直接由公众意见获得权力来源。推特和特朗普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特朗普推特现在有8730万人常年追踪订阅，拜登推特只有1140万人，希拉里推特只有2890万人，试问谁对推特公司的业务贡献更大？本书作者一再强调，即使2020年大选特朗普输了，这种格局仍将持续下去”。

那么国际三大《自然》、《科学》、《细胞》等科技名刊，真像我国科技精英发表英语论文趋之如鹜，是院士、名校、诺贝尔奖的“定海神针”，无偏见吗？据新华社2021年1月8日报道，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因被英国《自然》杂志评为“2020年度十大科学人物”，致函该杂志并发表声明。

李兰娟在声明中指出，武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后，自己作为传染病学专家，加入高级别专家组，参加了武汉的流行病学调查以及病人救治等工作。英国《自然》杂志在介绍材料里称自己为“封城设计师”，并基于此将自己评为“2020年度十大科学人物”，李兰娟认为不符合事实，希望予以更正。有“跟贴”说：“李兰娟女士这个声明非常及时，不给西方任何挑拨离间的余地！”还有“跟贴”说“老太太是最早坚持封城的人，这点没错。但是下决心的是中央人民政府，下决心封城绝不是随口荡荡，它意味着要抱着对一千多万武汉人民和十四亿中国人民负责的态度，卡断交通容易，确保全城一千多万老百姓的物资供应不容易，全国调集医疗资源支援武汉更不容易，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做到了应收尽收难于上青天。这一切的一切，不是一个人一己之力能完成的。李院士是不想贪天功为己有”。

那么再说“互联网资本主义”的权利有多大？能搞“政变”，也能封“总统”的口。2021年1月9日“观察者”网发表的《推特“重拳”挥向特朗普，苹果谷歌又断他后路》一文，针对1月6日特朗普粉丝围攻国会大厦的事情说：1月8日晚推特公司以“推文存在煽动暴力风险”为由，将特朗普的个人账号永久封禁。就在此时苹果和谷歌也开始行动，把特朗普的大批支持者的应用软件商店“说话(Parler)”软件下架。另有文章说，脸书、亚马逊等十几家网络平台也连续发难，冻结特朗普的脸书和账号。美国金融服务公司条纹(Stripe)，也停止处理特朗普竞选网站的支付事宜。

2021年1月9日“观察者”网发表的《特朗普，你号没了》一文，作者雷斯林说：“换位思想一想，如果我被腾讯、阿里、今日头条、百度同时封杀，那我其实就等于和这个互联网时代完全脱钩了，如果今天我无法登陆我的微信，我甚至会失去自己90%的朋友，因为我连他们的手机号都没有，也不知道他们具体住哪。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啊”。他还说：“要知道现在爆火的游戏《赛博朋克2077》世界观中，美国早就解体了，统治世界的不是各国政府，而是一个一个大公司……这其实也不是双标，这世界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谁掌握了话语权，谁说了就算。都为了自己国家，自己公司在做事。全世界都在用美国人做的互联网服务，自然是他们

明里暗里做什么，封谁，引导谁的舆论，只能他们说了算。还能怎么办呢？2016年大选的时候特朗普那时候除了右派的少数几家媒体，绝大多数媒体上每天都是关于特朗普的负面信息，而他最后在这样的情况击败了希拉里，很多人总结说‘媒体不如社交媒体了’、‘这是社交媒体的胜利’。然而，如果社交媒体也封禁你，又该怎么办呢？”

2021年1月9日“观察者”网发表“闲吟客的随想录”的《推特封特朗普，是给特朗普帮了大忙》一文说：“推特直接封号，这种赤裸裸侵犯言论自由的行为，正好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逼到保守派的社交媒体平台---由于媒体普遍被自由派控制，社交媒体上活跃的也大多是支持自由派的年轻人，保守派在这一领域处于绝对劣势。保守派想逆转这一不利处境，只能彻底釜底抽薪，另起炉灶---原先特朗普和保守派在自由派控制的推特等平台，不得不遵守推特限制，推特也可以对其进行言论审查。换了保守派平台之后，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特朗普有7500万选民支持，其中有相当数量都是类似于饭圈的脑残粉，比如这次国会暴动者。这个群众基础，再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绰绰有余”。也许“闲吟客的随想录”，是言过其实---特朗普毕竟是一个快下台的总统，他虽认为选票清点有问题，但不是“闹而优则仕”能解决的---因为最后还有“国会”和法院认票两道关。特朗普这两道关都求证过了，连任成功没门。特朗普也算是“先礼后兵”，但美国的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科技巨头“封杀特朗普”，同样也算是“先礼后兵”---“国会”和法院认票两道关都表示了判决，特朗普的推文还煽动“川粉”1月6日冲击美国国会大厦，所以美国3大互联网巨头等联手扼住特朗普和“川粉”的“咽喉”，也算“先礼后兵”。

科技讲“礼”说，也许闻所未闻。但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讲理”+“讲礼”并不少见---即使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后，出现反封建“礼教”的持久风暴，但中国人“讲礼貌”，仍然是今天保持的优良传统---如尊敬师长、上级。美国不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国家。中国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副会长陈经教授，在《反垄断之外，也要想想怎么让互联网社会主义纵横天下》一文中说：“党在公司并不直接占有股权，为什么能在公司治理上有发言权？这不能生拉硬扯，而是需要深刻的理论思考。公司治理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社会规范，党对社会规范有发言权就是自然的”。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寒竹教授，在“观察者”网发表的《全球化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中国来了》一文中说：“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通过加入由资本主义国家创建的经济体系而实现了经济起飞，

并有望在未来不久的将来，超过资本主义的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本身就令人感到惊愕。更重要的，中国有可能会对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对缓解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作出特别的贡献。中国在全球化进程取得的巨大成功，给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这就是社会制度不同，并不影响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相互合作，相互依赖。人类社会在全球经济事务中，完全可以避免制度之争”。

即使“观察者”网发表的《欧盟警惕：美国做法有问题》一文中说：“推特决定冻结特朗普账号后，默克尔等欧洲领导人纷纷开始强调监管社交媒体公司的必要性”。也有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学系在读博士周德宇，发表的《“占领国会山”后，美国政治学者在做什么？写公开信》一文中说：“深度参与政治并非美国政治科学家的主流，特别是在美国政治科学极力向自然科学靠拢的今天……正是受困于自己的阶级和立场，学者们对美国现实的接触，很容易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还有“观察者”网发表的《特朗普推特账号被封后，印度媒体发现自家总理拿了个“第一”》一文中说：“印度媒体《今日新闻》在其网站上刊发报道，称特朗普的推特账号因‘煽动暴力、违反社区规定’而被封禁后，在这一平台上拥有6470多万粉丝的莫迪总理取而代之，成为了‘现在最受关注的在职政府领导人’……民众对于社交平台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政府部门和企业亦是如此，但是站在这些社交平台背后的互联网企业，正在有极大的可能成为‘新的寡头’。部分印度网民则是发出呼吁，要求印度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持续加大对境外互联网企业的约束力度，避免印度的民主体制遭到挑战；同时也希望印度企业，可以推出属于印度人自己的社交平台”。

2021年1月11日“观察者”网发表的《刘宗义：抹黑中国，印度还有哪些新动向？》一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教授就说：“近些年来，印度人专门注册邮箱，发邮件过来骂我们。一方面是他们能比较熟练地运用英语，和比较便利地运用西方的舆论工具。另外，他们自己国内的媒体也非常多。特别是现在印人党上台之后，经常利用旗下的网站、电视台，散播一些对中国不利的负面消息。比如这次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很多负面消息也是首先从印度传出来的。比如说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物武器，然后宣称要向中国索赔，等等。目前，我们确实在国际舆论场当中缺乏话语权。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鼓励学者多发表一些英文的文章，把这种国际话语权夺过来，以正视听，让国际社会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这些都可见部分印度网民的不

“讲礼”。

但刘宗义教授对我们的“中文”，也多么不自信：认为夺话语权应用“英文”。那么在世界上，“互联网社会主义”也有超强的应用程序（APP）平台吗？有。2021年1月9日“观察者”网，发表的《特朗普封杀的这款中国APP，全球下载量超5亿》一文，作者周远方教授说：“2021年1月5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扫描全能王、支付宝、QQ钱包、茄子快传、腾讯QQ、VMate、微信支付和WPS Office等8款中国应用软件列入“黑名单”。许多人才注意到‘扫描全能王’这款低调而全球流行的中国工具APP。《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提到，去年美国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中，扫描全能王的下载量为440万次，而支付宝的下载量仅为20.7万次。实际上，这款工具APP在海外有大量用户，截至2020年9月末，扫描全能王在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的全球用户首次下载量约5亿。截至2020年9月30日，扫描全能王免费版曾在应用商店上131个国家和地区（含中国）的效率类免费应用下载量排行榜位列第一。但在国内，这款问世已经10年的应用的知名度可能并没有那么高，甚至从未听说。可能的原因是这款应用的开发者相当低调，把绝大多数精力花在提升技术方面——全球用户过亿也几乎没打过一分钱的广告”。

据介绍，“扫描全能王”专注于模式识别OCR（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在OCR、人工智能、手写识别、图像处理及自动图像增强等领域精耕十多年。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镇立新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获得中科院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博士学位。后赴上海工作，曾就职于摩托罗拉全球实验室。作为世界顶尖的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技术科学家，他拥有超过30项全球专利，也是全球首位将光学字符识别、名片识别及智能手写识别技术运用到智能手机上的科学家。公司成立于2006年，属于上海合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应用公司。旗下C端产品名片全能王、扫描全能王等共累计用户超10亿，“启信宝”平台整合全国2.3亿家企业743个维度的600亿条企业征信大数据。这款应用是由合合信息2010年发布的，当时智能手机刚刚兴起，而2006年成立的合合信息已经在图像处理和文字识别这些技术上有许多年的积累，尝试利用智能手机上的摄像头，把手机变成一台便携扫描仪，实现扫描、复印、传真等功能。

当时整个应用市场中的应用特别少，大多还是天气类或小游戏类的产品，而扫描全能王从一开始就能够精确调用智能手机的摄像头和数据处理能力，匹配用户的日常工作需求，是苹果和谷歌的平台为数不多的优质应用。所以扫描全能王的用户80%仍来自海外。公司长期以来更多依靠技术优势和口碑

传播，并未侧重经营某些市场，在全球各个地区的用户都呈“自然生长”状态，也因此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人口大国，用户比重相当高。不过，在2020年7月印度已经将包括扫描全能王、钉钉、全球速卖通等在内的59款中国应用禁用。扫描全能王能对自己的技术自信，是从产品本身每一个功能背后，都有很深的技术门槛，所以看起来其他软件可能也有这个功能，但是实际上的应用体验会相差不少。比如在扫描的时候，扫描全能王不只可以把文件边角找出，拉平弧度，还能够把阴影去除，每一个功能背后都有数个专利支撑。

“互联网社会主义”与“互联网资本主义”的这场世界如何“博弈”，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2021年1月3日“观察者”网发表的《中美可以避免爆发新冷战》一文，作者小约瑟夫·奈是世界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曾是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该文说：“全球相互依存这一政治观点既包括天下为公，也涉及以势压人。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被锁定到了与中国的‘合作竞争’中，在这场竞争中我们需要一项战略，该战略要能够同时完成两件相互对立的事。要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等生态问题，需要中美互助共存，物理学和生物学定律使脱钩变得全不可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跨国问题。如果美国以冻结中国资产或启用《与敌贸易法》作回应，那这个世界可能会很快陷入真正的冷战，甚至是一场热战。拜登政府需要准备一项宏观战略来应对中国挑战，该战略必须包括回避事故、管控危机和确保高层稳定沟通的程序。否则，对中国、美国和世界而言，后果可能都是灾难性的。应对中国的挑战将需要一项更为复杂的战略，即利用美国在国内外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来保卫自己，并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如果美国将盟国视为资产而不是负债，那西方民主国家的财富总和仍将在本世纪远远超过中国”。

但2020年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完成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其中采用的着眼于制度型开放，“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对接的准入承诺模式，就是一个成功应对“小约瑟夫·奈挑战”的利好消息——但这仅是国家层面的“上层设计”。对于今天从“赛博朋克”到“互联网朋克”演变——全世界互联互通，21世纪初那头几年，国内都可以看到欧洲、澳洲、美国等国外办的很多互联网中文网站论坛，可以注册后上网发表文章，类似全球“环形水跃”。但“环形水跃”也有反向“环形水跃”、内卷化——风光了几年“负面清单”出现，几乎都关闭了；连国内的中文网站论坛也不断减少。内卷化，“内循环”+“双循环”，保留或新建的网站论坛，一元多体，多元一体，其实各自为阵。由此关切内在的“互联网社会主义科学”朋克内容——

“用自己的声音说自己的话”这至高无上的“信条”，洗礼着每一个“科学朋克”爱好者如何利好？是2019年6月8日我们发表了《深切悼念上海复旦大学费伦教授逝世----经络分形与身体信息量子隐形传输》一文之后，从费伦到高也陶与化名“53度”的人之事，才发觉“互联网朋克”科研，有讲“礼”的国学需要。

B、科研讲“礼”从费伦到高也陶与化名“53度”

因为“讲礼”一定有不“讲礼”之人，或者“讲礼”能化解一些一时难处理的“人民内部矛盾”----国学中有“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教育，但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也曾被批判为“封资修”、“封建礼教”的东西。但即使这样，也有类似《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故事，讲述“将相和”、廉颇“负荆请罪”，以及蔺相如出身贫寒，当初仅是宦官缪贤的门下的一名门客，只因赵国派蔺相如出使秦国，大智大勇完璧归赵、渑池会取得对秦外交胜利等功劳，被封为上卿，位在大将廉颇之上。这样一文一武本来都是为国效力的，但二人却开始关系不是很好。而蔺相如则处处让廉颇，蔺相如的解释是：“我蔺相如虽然无能，难道会怕廉将军吗？但是我想，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攻打赵国，就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在呀，如今两虎相斗，势必不能共存。我所以这样忍让，就是为了要把国家的急难摆在前面，而把个人的私怨放在后面”。廉颇听了这些话，背着荆条到蔺相如的门前请罪；二人终于和好成为生死与共的好友。

这个故事几千年家喻户晓，众所周知：“知书达礼，学以致用”，习礼崇文，学礼养德，以礼促学，尚礼、知礼、守礼，礼貌，礼让，“明礼”，“礼之用，和为贵”，等等。其价值取向为“和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20个字”公民道德规范，已成为今天面世对中华美德的新承接。但无可讳言，这还不见于“互联网社会主义科学”朋克的宣传，和共识之中。

例如，像85岁的北京航天科高工蒋春暄教授，10多年来告状不止----他被“科学朋克”的分群挑拨了：本来他已经获得国外“特勒肖-伽利略科学院2009年度金奖”；他写的书《桑蒂利 iso 数论基础》2002年在美国出版，并且在2004年国外的《数学评论》中，蒋春暄的名字和他的著作的书名，排在“数论”类第一位----被“科学朋克”的反主流数学群“承认”，但“中科院不承认这个金奖”，这也正常。蒋春暄教授不满足，还要国内的主流数学群承认----他认为“蒋春暄成果”，没有参考前人的工作，都是他提出新理论，都是原创性和颠覆性的创新，蒋春暄是当代牛顿和高斯，21世纪数学应该从蒋春暄研究开始。这个“挑动”，是1997年美国“脱

钩”主流科学群的桑蒂利教授，访问中科院数学所，游说介绍他建立 ISO 数学。蒋春暄会见了桑蒂利，答应建立 ISO 数论基础。作为回报，桑蒂利出版蒋春暄书和所有论文。《科技日报》、《南方周末》等一些国内主流报纸，不明真相，也不懂前沿数学，报道了“蒋春暄划时代成果”。

因为我们问过：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宋正海教授一起，在《南方周末》写文章为“蒋鸣不平”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张浩教授：“你懂不懂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证明？”，他实话实说告诉我们，他看不懂，他是被蒋春暄教授的“悲情”所打动----蒋春暄一生不结婚，把精力都用在争“科学研究中的发现和发明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太动人了。这也是事实：新中国科学70年以来，产生了“三大猜想”，它们是：柯召--魏时珍--赵华明猜想（即“柯猜弦论”）：求证“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这类似新冠疫情大流行是“联合国历史上最大的全球性挑战之一”，开展国际合作，践行多边主义，团结互助，是全世界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等全球危机的唯一途径。但“柯猜弦论”要得到承认，需要在一个又一个类似于疫情考验上的真正扭转。这是中文世界科学进一步发展，最终整体超越英文世界才表现，所以1963年他们审时度势，“讲礼”按下“暂停键”。其次是周光召--吴岳良猜想：“理论物理只有世界第一，没有第二”。这是“撕破”选择。再次是丘成桐--田刚猜想：“含有大量洞和孔组合卷曲成多形状尖端的翻转，可以用‘炸开’变换操作”。这也是“撕破”选择。这“三大猜想”中，只有后两大猜想得到主流科学群的认可----当然这后两大猜想也没有错，但也有“苦头”。

例如，蒋春暄教授把退休后一年日日夜夜的时间，都用在互联网发告状信上，一天10多次不停发这类材料值吗？如他的《中科院数学所郭雷、杨乐、马志明疯狂打击蒋春暄获诺贝尔奖(数学诺贝尔奖)成果. 这是犯罪》、《吴岳良、吴文瑞中国科学领导者----中国科技领导者和院士，这么落后反动卖国，他们乐于卖国，这样可保持他的科学地位，不允许别人超越他。中国是机器人，中科院一个指令全国都执行》。他告的不只是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郭雷院士，而是涉及国内外大多数著名的华人数学家：王元、杨乐、马志明、李大潜、谷超豪、丘成桐、陈省身、吴文俊、潘承洞、蔡天新、段学复、怀进鹏等教授。

蒋春暄教授说的逻辑，一是：“世界数学大厦本来就建立在沙滩基础上，不很牢固，再来沉重一击，后果可以想像。当然前提是蒋的成果如果是真的。我们不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像大多数历史上的科学家一样，他们生前不被认识，不受关注，

死后却备受关注，影响巨大。这是悲剧，但这是常见的现象。也许蒋先生也会成为这样的历史人物”。二是：“科学研究中的发现和发明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谁先取得发现并公开发表成果，谁就获得发现权，谁就为国家和民族争得荣誉。蒋春暄七篇论文是‘国际顶尖划时代的论文’，因为蒋春暄成果已满足2018年阿贝尔奖标准，中科院和母校北航支持美国，不支持蒋春暄的工作。希望中国政府支持蒋春暄工作，打倒美国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等等。也许等“死后却备受关注”，也是讲礼吧。

其实，如果要反主流科学，我们也赞成四川景盛集团董事长罗正大高工，业余搞科研的“讲礼”模式---2005年10月15日傍晚时分，罗正大高工和他的助手张慧星先生，一起从宜宾市开轿车来到绵阳市我们的家门口楼下，要请我们到外面街上吃饭，边交流，说当晚他们还要回宜宾去。亲见其人，看来罗正大高工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这位“川南竹海之王”长得身材魁伟高大，外穿着一件工作服式的长大衣，显得很朴素，使我们顿生敬意。罗正大高工无疑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和“讲礼”的业余科学爱好者，在他亲自与我们交谈中，他提到自己曾在攀枝花矿务局和攀枝花钢铁公司研究院工作过。1983年照顾夫妻分居，调到宜宾市汽车运输公司工作。1984年“下海”，转行经商创办宜宾市布艺有限公司开始，短短11年时间就获得了七项国家专利和商贸部“发展中国室内装饰事业特殊贡献功臣”等多项荣誉称号，以及省人大代表等多项社会兼职。20多年间的发展，他的四川景盛集团有限公司已有十个子公司，对国家每年的贡献，他的民营企业不仅是宜宾市的纳税大户之一，且是著名的宜宾五粮液酒厂的参股大户，也是四川的纳税大户之一。

2002年1月他的第一本书在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之后，他在“川南竹海”已建起了一处书房，经商和科研两不误。他的第二、第三本有关“量子外力”的专著，就是在川南竹海中他修建的书房内，由他个人亲笔完成。所以当罗正大高工毫不顾忌谈到他父亲，解放前是一位国民党中将，解放后成为“战犯”被收容，他1952年出生类似“监狱之花”时，我们立马问：那时搞阶级斗争，你读书和很早到矿山工作，有没有受到过冲击？罗正大高工说，他父亲很早就“特赦”，他读书和参加工作都没有受到过冲击。罗正大高工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具有传奇色彩自然流于言表。

直到后来我们才看到《宜宾日报》采访报道，说他父亲早年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在南京工作。罗正大高工在科学上是一个具有法律意识的人，很懂专利保护的价值。他的《不可视觉物质---暗能量和量子外力》第一本书出版，书中就有18张插图申请了国家专利，《统一的宇宙》一

书就有40幅插图申请了国家专利。这种硬功夫，在国内是很少见到的。罗正大高工对我们还说：他的科学观点讨论可以，恶意攻击不行；如果有人恶意攻击，他可以拿出钱来打官司。我们笑了，说科学观点的“战争”，很难在法庭上解决。不是有人定义：“科学是自己拿钱，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本身收入不高，很难承担这种自己拿钱满足自己好奇心的官司。

罗正大高工也笑着说，他曾把这种决斗，明确告诉过成都的几位大学教授后，他们也退却了。我们知道我们写的评论《解读罗正大的量子外力论》观点没变，是很难与他合作的。于是我们就把推荐给中科院高能所的吴水清教授。2006年7月吴水清教授组织邀请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白景芝等北京相对论研究会联谊会的37位专家，召开了“罗正大量子外力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的论文集由2006年第3期的《格物》杂志发表。这期杂志的出版费用，也是罗正大高工支付的。因为这本杂志虽收进了我们2005年7月写的《解读罗正大的量子外力论》评论，但我们没有交任何版面费。只是我们文章的一些字里行间，有多处罗正大高工批注说明的文字。其次，这本杂志中对有不同意见的知名的任振球、曹盛林教授等少数专家的文章，也有他加批注的说明文字。要知这种特权，不是谁都能办到的。罗正大高工从2002年到2019年，在四川科技出版社一共独自出版了9本科学专著（包括其中3本是修改本），获得北京相对论研究会联谊会终身成就奖，被聘为联谊会科学家联盟教授，在非主流群实至名归。

2019年末的一天晚上，罗正大教授给我们打来电话问候，并告诉他的身体，正在成都修养。罗正大教授一生为科学奋斗不止，用劳动所得的钱来支撑心爱的科学研究，不像蒋春暄教授到处告状，要主流承认。罗正大教授在他书中虽然对主流科学所有批评，但更多的是展现自己的推理所思。罗正大教授认识我们，而且2005年他的新著《不可视觉物质---暗能量和量子外力》由四川科技出版社第一次出版后，很快送到我们手中。那时他和我们根本不相识，从《不可视觉物质---暗能量和量子外力》一书责任编辑是陈敦和主任，可知也许陈敦和告诉的。因为2002年5月由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我们的70万字的《三旋理论初探》一书责任编辑，也正是陈敦和主任。19年来，我们一直在认真研读和思考罗正大教授的新论，直到2021年1月12日和14日读到“科学网”个人博客专栏，张天蓉发表的《量子英雄传-26-凝聚态中的对称破缺》，和程鄂教授发表的《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30)：冯·诺伊曼的证明》等两篇文章，才算懂得罗正大教授的“引力蘑菇汤”之谜---说的是引力子凝聚态论。

程鸮教授说：“冯·诺伊曼提出量子力学是普适的。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世界，它们都应该遵从同样的物理定律。1932年冯·诺伊曼的《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教科书出版，由此，测量作为一个分离且奇特的物理过程第一次正式出现在量子力学教科书中，无论是爱因斯坦的鬼场，还是德布罗意的导航波、薛定谔的波函数，处理波粒二象性时都会遭遇到原来在空间中广为弥漫的波必须在某个时刻、某个地点突然聚集，即坍缩成为粒子。被测量的系统会发生瞬时、不具备因果确定性的突然变化，也就是坍缩。这个瞬时的过程没有数学、逻辑的描述，而冯·诺伊曼在书中则宣布，他这个滴水不漏的数学体系可以严格证明量子力学在测量时所呈现的随机性是理论的内在必然”。

张天蓉教授说：“凝聚态以量子理论为基础，在量子场论建立之后，理论物理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粒子物理和凝聚态物理。公众的眼光大多数投向传统的、以还原论思想为指导的高能粒子物理，以为那才是物理的正统方向。然而实际上当今的物理学家中，70%以上是在做凝聚态物理的相关研究，包括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凝聚态物理的理论部分，与粒子物理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近百年来从固体到凝聚态的研究，在实用上促进了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带给人们一次又一次的惊喜。凝聚态物理在理论上也独树一帜，其中有关对称和对称破缺的研究，对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哲学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前苏联知名物理学家朗道（1908-1968）的费米液体及相变等理论，奠定了整个凝聚态物理的基础。费米液体理论，让我们可以在处理多粒子的凝聚态物理中继续使用单粒子图像，因为基态的低能激发可以看做是近自由的准粒子，通过准粒子的相互作用对基态进行微扰，可以获得金属、绝缘体，以及超流性、超导性等诸多不同的物态。此外，朗道提出的相变理论与对称性破缺理论相关，让我们能够用序参量来描述凝聚态系统的宏观态，使用对称性来给不同物相进行分类”。

罗正大教授的9本中文专著，是用他自学的科普知识和自己的思考，表达了上述类似企图。而蒋春暄教授没有出版过一本中文专著，他寄来想出书的文章，主要部分只说主流认可的成果证明，落后他证明的时间，和指责国内外华人主流科学家同行如何打击他，国内外都是卖国假洋鬼子打击他，却并没有像罗正大教授那样认真说明自己创新的证明方法，以及和别人创新的证明方法的区别、优劣，出版社怎么好出版？蒋春暄高工缺什么？和普通的中国公民相比，他有高工资、高职称、好位子和好环境；获得过“特勒肖-伽利略科学院2009年度金奖”；在“列为国际顶尖第二位的杂志”《代数、群、几何》杂志上，发表过论文；美国强子物理学

家桑蒂利教授为他出版了《桑蒂利 iso 数论基础》一书。他有名、有利、有地位，他只缺“讲礼”宣传自己的成果。这种人是如何教育出来的？在著名大学、研究院的教授、专家中，有高工资、高职称、好位子和好环境，也有缺“讲礼”的。

这种人，如化名“53度”，在互联网平台出现，才使我们对费伦教授，科研“讲礼”的精神，有了进一步认识。这还是2019年6月8日我们悼念费伦教授的文章，在电子邮箱和“四川省嫫祖文化促进会”官网和“巴蜀”网上发出后，接到很多电子邮件和座机电话，对费伦教授逝世表示悼念有同感。特别是杭州一家医疗研究单位的一位同志打来的座机电话，说他曾是费伦教授的学生和太赫兹电磁波“红太灸疗仪”研制及“灸疗八法”实验的合作者与助手，对费伦教授的逝世非常悲痛和感到惋惜；对上海方面没悼念报道有遗憾。我们问他怎么知道我们的座机电话号码的？他说是打电话问高也陶教授才知道的。6月9日高也陶教授给我们也发来电子邮件，问我们的这篇悼念文章，“是否可以转发给费教授的女儿。我与费教授有微信，但发现这个微信号已经改成他女儿的名字。我想如果您同意转发，您的文章是对费教授最好的悼念”。而我们认识费伦教授和高也陶教授，也正得力于我们处身在21世纪的“互联网社会主义时代”。

张帆高工不是批评我们：“攀龙附凤，什么时髦就攀什么，比如庞加莱猜想热闹，就攀庞加莱猜想；地震预测热闹，就攀地震预测”吗？这是他不懂得“业余爱好科研”的实际情况。当然，以前四川大学的李后强教授也问我们：他说他在川大读研究生时，帮助《大自然探索》杂志审阅读者来稿，发现我们投的稿子内容，与国内很多科技杂志登的热点跟得紧，他怀疑我们只顾看杂志，没有把时间放在钻研书本上。我们的回答是：“李老师，哪里不看书啊。1977年我们还在重庆工作，《爱因斯坦文集第二卷》刚在市中心书店买，我们工资还低，但看到这一卷选择爱因斯坦有代表性的34篇科学论文，我们就买下了。调回家乡盐亭县工作后，很多想看的科学专著买不到。调到绵阳市工作后，每周星期天才到市图书馆找前沿的科技杂志看”。

我们热爱科学，不是“科学网”雒运强博客专栏发表的《我看反“五唯”》一文后，曾杰教授的跟帖说的：“一个社会：三维，之一是公务员（文官）唯科举；之二是论文唯学术；之三是专利唯技术”。曾杰教授类似说：升学是为好工作；发论文是为学术地位；有专利因有技术成果就有收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急着追逐个人和集团利益的时候，心很难纯净，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而逐步克服。而2019年得知费伦教授去世，是高也陶教授发给我们的电子邮件。我们和费伦教

授与高也陶教授认识，是2009年1月4-5日被邀请参加2009年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但在会上都没有和他们说过话。而能到上海参加这次开会，正是2008年“汶川8级大地震”，遇难失踪近10万人，受灾达5000万人，绵阳市北川县是重灾区。做为绵阳热爱科学人，我们义不容辞地开始了新的探索，以平武、北川这个地震历史久远的特殊模型为观察点，提出了“拟大型强子对撞机”假说，把大地震的结构信息原理与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交换信息原理对应联系，融合了电磁成因说与板块断裂说；试图定性解释大陆内的一个地区为什么能释放如此巨大的能量？为什么持续时间长以及“点源论”无法说明的长长的地裂带？

由此也激发我们关注理论研究地震区，高能粒子运动状态等变化，及微型黑洞的形成条件与地震的关系；并从人文关怀角度，高度关注地震给北川、平武极重灾区人们留下的未消除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巴蜀网等互联网平台上发出了：《汶川大地震量子信息与健康初探》、《从四川大地震看地震力学初探》、《从四川大地震看建筑学改革等初探》、《地震与言论自由模式的比较学初探》等帖子。这使得那时关心四川抗震救灾的上海师大陶康华教授的注意，他给我们来信说他想当志愿者，来绵阳北川帮助了解地质环境破坏和保护情况。后来因国家分给上海抗震救灾的任务，是负责都江堰市，他才没有来成。

陶康华教授1941年生。1963年于北京地质学院区域调查专业毕业。曾经担任上海师大地理系副主任，教授，兼职博士生导师。当时任上海师范大学城市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负责指导环境科学硕士点和地理信息工程专业。主讲《环境学通论》、《环境遥感》、《城市生态信息工程》等课程。长期从事城市遥感信息与生态信息工程研究，开拓红外技术在城市各领域的应用。曾以上海市城市科学学会学术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代表上海市科协参加第三届世界绿色计划会议和环太平洋都市发展会议，发起组织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生态、文化、经济）国内、国际研讨会；多年来组织城市小组、高校绿色营活动，屡受团市委和政府部门表彰。

我们后来被邀请参加2009年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据陶康华教授给我们讲：中医科学的健康观及其量子信息科学的应用在于找“平衡”，我们2007年出版的《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专著，他也知道，认为能为参加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的专家们提供一种理论发展的参考。我们真感谢那时已经67岁的陶康华教授给予我们的热情接待。但2009年1月4日至5日，我们参加在上海师范大学会议中心召开的第二次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

论坛学术研讨会，与费伦教授萍水相逢；以前并不是他的学生，也不是他的同事。在参加会议期间我们没有和他交谈，只是听他讲经络与“太赫兹（Tera Hz）波段的电磁波”的关系，因为太专业，加之我们要在大会交流“量子色动化学”，很紧张，也就没有重视向费伦教授请教。

会后知道这是一个遗憾，虽然写出《费伦教授与量子色动化学》的论文，用电子邮件交给他作为弥补，但也没有收到他的回信。直到2012年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主任宋正海研究员主办的《天地生人学术论坛》网，因2007年11月26-29日在都江堰市召开的第二届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上认识的宋正海教授，他邀请我们参加“天地生人学术讲座”，所以才在《天地生人学术论坛》网上发了《费伦教授与量子色动化学》的帖子。宋正海教授1990年开始在北京创办纯公益的“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并多年在全国推动民间科学综合研究发展确实很有影响，《费伦教授与量子色动化学》发帖后，跟帖很多。原因是我们的帖子涉及经络的争论，并推崇费伦教授执著的经络科学实验精神，还没有在意他有没有科研“讲礼”的精神。

因为在发《费伦教授与量子色动化学》的帖子之前，我们对费伦教授的社会关系一概不知。在《天地生人学术论坛》网上，《费伦教授与量子色动化学》帖子的跟帖，很多网友也是“就事论事”，谈点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但不久出现一个网名化名“53度”的人的跟帖，他的言论使我们大惑不解---他离开经络医学本质的争论，大谈“费伦是费孝通的侄子。费孝通是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费伦利用这层关系，获得国家的经络科研经费，而费伦并无实验经络科研的能力”云云。我们在“53度”类似的多次跟帖后提醒，不谈这类“攻击”的言论。但“53度”不听，反而转头发帖说我们在“XX县科协工作，因宣传费伦，已被单位批评”云云---这种无中生有的言行，使笔者感到“53度”对费伦教授的“攻击”也会有不实之辞。

这里我们再抄录化名“53度”的人，发在天地生人学术论坛网 <http://tdsr.cn/bbs/viewthread.php?tid=7872> & fpage=153度的3条高级用户的原文帖子，供读者鉴定：“（1）亡得快、一条筋、么鸡……先生：怎么还再抱费伦的鸡脚杆！你真不知道复旦人痛斥费伦是学术骗子的事？你省去费伦给你写信的时间，是有意而为，想达到什么目的？（2）费伦说他在核物理方面基本是个文盲，但在医学方面呢？对中医对经络就不文盲了？那才真叫狗屁不通。他混迹在医学领域，就像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举手投足都是洋相是笑料。（3）复旦大学测试中心的退休的化学

工程师费伦是个不折不扣的科研骗子、货真价实的学术流氓、强盗土匪人渣。请么鸡将我评估费伦的话转给他”。

因为我们写《费伦教授与量子色动化学》用的是笔名“叶眺新”；“X X 县科协”曾是我们工作过的老单位，而且我们在后来的单位已退休，对费伦教授的宣传，纯粹出于对费伦教授执著的经络科学实验精神的敬佩。看“53 度”的“攻击”言论，觉得他与费伦教授很熟。于是我们给费伦教授寄电子邮件，把“53 度”在《天地生人学术论坛》网上的事情告诉，并问他知不知道“53 度”是什么人？

费伦教授的回信十分平静，他轻描淡写地说：“承蒙多次寄来精彩文章，但本人核物理方面基本是个文盲，虽然感到有不少亮点，但总体来说，看不太懂，如要看懂它，要耗费太多时间。近些年来，我正致力与撰写经络方面的总结性文章，不能分心。总之，最近很忙。你寄来的文章我都下载，存贮在一个专门的文件夹内，等空是细细品味。我现在极其低调。十多年来，我的很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思想，都只在极小范围内交谈，即使这样，也有若干人因为不懂（因为超出他熟悉的学术领域）出于谨慎，不敢表态；或是出于妒忌，不肯表态。对于前者，应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对于后者，中国这种人太多了，不值得花精力、时间与他们计较。所以我几乎极少上网，捧我，骂我，我都不在乎，我不想做什么英雄，把名利看得很淡薄。所以我心态很好，有一些想法，只在极少知我者中间交谈而已。那个‘53 度’的人我知道是谁，我曾有大恩于他，帮他调入复旦，帮他升正教授，他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很多原始思想都是我的，现在他已升博导，但因为我曾帮他视为仇人的人说了几句公道话，他就把我也一起咬了，可能发现你写的文章里捧了我几句，把你也咬了。此种人不择手段向上爬，心理极其阴暗，不会长寿的，不值得理睬。我已虚度 79，还是做自己认为开心的事要紧。我现在活得很好，很健康（附一张照片）。我劝你不要理睬他。这个人现在已处于困境，精神有点失常，像疯狗，你与他骂，有失你的身份。谢谢。费伦”。

后来的事情说明，费伦教授执著的经络科学实验精神，也许他对人的宽恕精神和他有科研“讲礼”的精神，也是其中的精神支柱---我们再次把费伦教授的信贴到在《天地生人学术论坛》网上后，发现我们再也不能在《天地生人学术论坛》网上发帖了---一上该论坛，就被屏蔽。我们写信给宋正海教授，因为他是“天地生人学术论坛”网的版主，以为是他干的。但宋正海教授回信说，不是他干的，是个别网友干的，他也没办法。就这样，我们无法在《天地生人学术论坛》网上发帖有两三年时间，直到 2015 年 12 月 12-13 日到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自然国

学学术研讨会后，我们才又能在《天地生人学术论坛》网上发帖，但不久《天地生人学术论坛》网也停办了。

我们与高也陶教授相识，也是 2009 年 1 月 4--5 日在第二次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见面的，但也没有作多交流。因为大会发的打印论文集《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他的论文《五脏相音--闻诊：传统中医的数字化》，标注他的工作单位是“澳门协和医学诊疗中心”，论文写得短少精干，据他说正在研究“五脏相音闻诊仪”。我们也感兴趣，但他说话不多，只说他是山西人，在医科大专毕业后，又到第二军医大学深造和从事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多年，后来才应聘到澳门科技大学协和医学诊疗中心的。我们本以为和他的联系就此断了，但 2010 年他突然给我们邮寄来他新出版的《黄帝内经人体解剖学》一书，以后又寄来《本末出候望诊》和《秦太医署<黄帝内经>》两本他新出版的书籍后，我们才知道他是个勤奋又高产的医学科研工作者。到 2020 年 11 月他已出版专著 40 多部，发表论文 80 余篇，是用西医等解读中医文献和《黄帝内经》的专家。

搜索他的简介：高也陶，博士，1955 年生，江苏籍。曾任职于第二军医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从事临床、教学及科研，担任教授和硕士生导师。是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医诊疗仪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医学与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他和我们接近的原因，据他的《秦太医署<黄帝内经>》一书 342 页上说：据我们的考证，“岐伯出生四川盐亭县茶亭乡，这里至今保留许多文物古迹，纪念医学始祖岐伯。传说岐伯是黄帝夫人嫫祖的舅父，年老后到南方寻找人才接替传承，发现年少的轩辕，带回西陵培养，北方有熊氏族部落，将轩辕和岐伯一起挟持到北方有熊氏族部落。后来轩辕成为有熊氏族部落的黄帝。岐伯力荐黄帝与嫫祖联姻，助黄帝一统中原，后被名命封为歧舌国君。石云龙先生引经据典力证岐伯为故里，为现盐亭县柏梓镇特别是茶亭一带，为古时名为歧舌国的区域。这个地理位置也在成都平原，距广汉三星堆直线距离约 150 公里”。

高也陶教授说的是事实，我们的考证文章，是公开发表在一些互联网论坛上的。石云龙先生是我们家乡盐亭县玉龙镇粮站站长，1965 年我们考上大学，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要卖细粮，家里谷子交不够，只能用红苕干顶替遇到麻烦。石云龙站长并不认识我们，但他看到卖粮的我们父子，是穷家庭、穷学生，出面担责同意不够部分用红苕干顶替。这事使我们牢记在心。大学毕业 10 多年后调回盐亭县科协工作，业余我们不只是以传说、文献，而主要是以地形地貌、古迹遗存等探索中华远古史和嫫祖、

岐伯、盘古的历史。石云龙站长是 1949 年刚解放就参加工作，认识还在世的盐亭嫫祖研究学者何拔儒这个四川省文史馆员。而且石云龙站长的长辈，还与中国最早收集甲骨文学者、天津的王襄先生，因曾在四川川北潼川府（今三台县）盐务局任职有交集，退休后也在研讨嫫祖、岐伯。

王襄 1910 年在北京农工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矿科毕业，1913 年又毕业于天津民国法政讲习所政治经济科。之后曾在天津、福建、广东、四川、浙江、湖北等省盐务稽核所任职多年——也曾在四川川北潼川府（今三台县）盐务局任职。据石云龙站长讲：

“盐亭出土上古蛮碑其信息，均来源于石家幺妹虞氏，及石家石文凡、石玉田三位先辈老人的口碑相传。如石碑刻划符号拓片，是我国最早收集甲骨文学者王襄老师从四川盐亭得来的等语，就均来自以上三位先辈老人传授给王襄老师的”——1995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第(四)段，在文字的原始阶段一节里，对刻划符号，有这样一段论述：“四川盐亭县曾发现一个完整的界碑，上面刻有五十多个文字符号与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属于四五千年前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1866 年盐亭县赵蕤故里北岩村，今高团村西部花都葱柏嶺，是有名的古墓群，人们寻觅上古遗迹挖古墓，挖出一块四五千年前黄帝时期的石碑，人们称为蛮碑。

石云龙站长说：“碑上刻有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无法认识。当地有位苦读儒书的少年，名叫石文星，是我本家堂祖父。他对出土的蛮碑，如获至宝，秘密收藏。王襄既是盐务局稽查官员，经常前往葱柏嶺盐务公园，是分内之事，故此才有‘《大观》石碑刻划符号拓片，是我国最早收集甲骨文学者，王襄老先生从四川盐亭县得来的’等语。”

高也陶教授得到这个信息，是在费伦教授 2019 年 5 月 23 日去世，5 月 28 日开追悼会之后。高也陶教授是个认真的学者，他要带几位专家从上海到盐亭去亲自考察。据 2019 年 6 月 18 日“美篇”网和谐人生专栏发表的《澳门医学博士寻根中华医圣岐伯故里盐亭》一文报道：“6 月 17 日绵阳社会组织扶贫促进会王贤君副会长，陪同高也陶博士、南京雨花区钱副区长、南京中医院唐副院长和深圳龙岗医院刘主任等一行调研岐伯故里。高也陶教授赠送自己的著作给绵阳和谐人生文化科技何君梅董事长”。同时他们还拜访了石云龙站长和到盐亭县嫫祖镇瞻仰嫫祖墓。6 月 18 日中午他们路过绵阳，接待高也陶教授一行人的时候，我们悄悄问高也陶教授：“你知道费伦教授生前说的那个‘53 度’的人是什么人吗？”高也陶教授也小声回答：“是校长助理”。我们没有再问下去。

高也陶教授和费伦教授熟悉是很自然的事。他

不同于我们，他们都是正规搞科研的人，也许 2009 年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学术研讨会后，因都有中医针灸实验与理论方面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走到一起了。但光靠写书和发表论文是挣不到钱的，我们是讲实际的人，猜想高也陶教授之所以到处受聘，主要是应聘是去教学和帮助指导研究生。因为他刚到绵阳我们就问他：“五脏相音闻诊仪在使用了吗？”，他说只是专利申请成功了还摆在那儿。又问退休了吗？他说退休了。再问哪里发退休金？他说还是原单位军校军医院。那为何住在上海？他说爱人是在上海工作。但直到写这篇文章时需要谈互联网论坛要“讲礼”，我们才去搜索为何费伦教授退休前，有高级职称（复旦大学物理化学教授）、高位子（历任复旦大学物理化学实验室主任、化学系副系主任、复旦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主任）、高工资；1997 年从核磁共振研究室退休后去搞新科研还甘愿受气？才搜索到“新浪网冰封博客专栏”发表的 10 多篇类似与“53 度”说辞相同的帖子。

这里摘录其中一篇《费伦教授扮演的角色——田舜莲论文造假始末之五》部分内容，供参考分析：

“李为民教授通过冰封转发对事件经过的系列描述。费伦退休后选定了他的接班人丁光宏。从此丁光宏从一个力学专家，一跃成为针灸经络专家。慢慢地把他的恩人给冷落了。田舜莲论文事发后，丁光宏这时想到了费伦，请他出面把事情搞定。2008 年 10 月 20 日费伦胸有成竹地来到我家，让我不要再在田舜莲论文上‘闹下去了’。我据理力争，而且我把田舜莲论文事发后，丁光宏的前后言行的不一致也告诉了他。费伦当时大骂丁光宏不对。费伦临走前给我承诺：‘论文’中一些数据可能存在不准确性或虚假性或抄袭，但为了避免涉及造假和抄袭后对丁光宏、复旦大学和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中心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仅将田舜莲行为定为侵权行为，由他出面，向力学系党政领导和田舜莲所在的博士后流动站党政领导作出上述说明。那天的交谈，费伦给了我一个假象，他是一个能够主持公道的老科学家。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费伦并未履行原先的承诺。我回复是：‘我和田舜莲在许多场合的沟通是单独进行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认为我是她的导师，从没想过说话时要有证人在场’。当时的确我实验室还有其他人员包括王晓艳、杨旭和留学生等工作，或许他们有时会听到我们交谈，但是他们已经离开实验室或上海，在 1-2 天内找证人证明是不可能的。事后看来这是一件有预谋的事件，丁光宏和费伦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这事发生在 2009 年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研讨会前后，但那时我们不知道这个“田舜莲论文造假事件”，以后 10 多年里也不清楚。现在知道后认为，我们是坚决反对论文造假和科研腐败的；事

情如有发生，应向合法的部门投诉，等待处理。这事也说明在高工资、高职称、好位子和好环境的专家、教授中，也有“讲礼”补课的需要。

参考文献

- 1 王德奎，三旋理论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5月；
- 2 孔少峰、王德奎，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9月；
- 3 王德奎，解读《时间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
- 4 陈超，量子引力研究简史，环球科学，2012年第7期；
- 5 王德奎、林艺彬、孙双喜，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独家出版社，2020年1月；
- 6 刘月生、王德奎等，“信息范型与观控相对界”研究专集，河池学院学报2008年增刊第一期，2008年5月；
- 7 亚力克西·杜歇纳，环形水跃：一段跳跃的故事，环球科学，2020年12月号。

2/28/2021